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52期 | VOL.47 NO.4



4·2025

TAIZHOU XUEYUAN XUEBAO

台州学院商学院旅游管理硕士学位点

学位点情况



商学院院长为行业导师颁发聘书

学位点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服务全国，掌握坚实的旅游管理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旅游管理实践问题的应用研究或旅游企业的管理实践工作的能力，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开拓的创新精神、优秀的领导力与决策力，能胜任旅游行业管理部门、旅游教育、旅游目的地及企业运行与管理的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

学位点培养方向：1.旅游目的地营销与管理。本方向领域包括旅游目的地公共治理、文化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目的地新媒体营销等。2.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本方向领域包括乡村文旅资源开发与规划、乡村旅游运营与治理、文旅产品业态创新和旅游创业、民营景区旅游运营等。

师资力量

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21人，行业导师10人。专任教师中，教授7人，副教授8人，博士学位教师占比76.2%。学位点聘请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教授、长江学者保继刚教授等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乌镇旅游集团总裁陈向宏、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等知名企业家与行业精英担任行业导师。

教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项目20多项，承担社会服务课题100余项，课题经费1000多万元；在《旅游学刊》、*Tourism Management* 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文化和旅游部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10余项调研报告获省委书记、省长等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多项成果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内参。



“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论证暨实践基地建设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论证会

04
Vol.47 No.4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52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IISCD)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李钧敏
Editor-in-chief Li Junmi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317000
Postcode

网址 <https://journal.tzc.edu.cn>
The URL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 (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xbb@tzc.edu.cn
E-mail

电话 0576-85137169
Tel.

目次

科学技术史

主角如何变成了配角？

——以此纪念玻恩学派创建量子力学100周年厚宇德 | 01

论中英庚款退还及其对战时科学家的资助王 坚, 李瑶瑶 | 12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群体特征计量研究阿西伍惹 | 18

天台山文化

“越变至鲁”：试析宋代台州的世居士人及其家族路遇明 | 24

戴复古的题画诗初探姜泽华 | 32

文 学

翦论九绝天人苏东坡之天人合一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洪 迪 | 37

论柳宗元酬赠诗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何方形 | 43

语 言

汉韩维度形容词“大/小”语义扩散路径比较张则顺 | 48

“菌桂”再辨刘心悦 | 56

传 播

视像化阅读：“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创新实践梅 咏 | 63

从数字哀悼到数字永生

——智媒时代的情感传播实践考察 雒有谋，孙宇航，吴梦凡 | 69

拟剧理论视域下青少年网络社交的数字身份建构与伦理挑战

.....张丽丽 | 76

大陈岛垦荒精神

古代大陈岛垦荒活动述论安贵臣 | 83

大陈岛垦荒精神传承的价值意蕴及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探析

.....张天华，祝家欢 | 89

CONTENTS

How did the Protagonist Become One of the Supporting Roles?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Cre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by the Born School
.....Hou Yude | 01

On the Refund of the Anglo-Chinese Boxer Indemnity and its Support of Scientis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Wang Jian, Li Yaoyao | 12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Nobel Laureates in Natural Sciences
.....Axi Wure | 18

"Yue into Lu": An Examination of Taizhou's Indigenous Schola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Song Dynasty
.....Lu Yuming | 24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Dai Fugu's Poems Inscribed on PaintingsJiang Zehua | 32

Treatise on Su Dongpo's Ninefold Celestial Mastery and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Swept by Tides of Time in the Winds of Emotional ProfundityHong Di | 37

On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iu Zongyuan's Reciprocating PoemsHe Fangxing | 43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Semantic Diffusion of Dimensional Adjective "big(大)/small(小)"
.....Zhang Zeshun | 48

Re-identification of "Jun Gui"Liu Xinyue | 56

Visualized Reading: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Publishing with "Short Videos + Textbooks"
.....Mei Yong | 63

From Digital Mourning to Digital Immortality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Luo Youmou, Sun Yuhang, Wu Mengfan | 69

The Digit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Challenges of Adolescents'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turgical TheoryZhang Lili | 76

A Discussion on the Reclamation of Dacheng Island in Ancient TimesAn Guichen | 83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Inheriting Dachen Island Reclamation Spirit
.....Zhang Tianhua, Zhu Jiahuan | 89

主角如何变成了配角？

——以此纪念玻恩学派创建量子力学100周年

厚宇德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在几乎所有量子力学史类著作中,玻尔都被描写成建立量子力学的领袖、核心人物。然而,大量证据表明,量子力学是玻恩带领学生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才于1925年得以建立的。量子力学错误历史的出现并对学界形成催眠之势,与当事人的性格、人品有关,也是这两者在特殊历史时期与社会因素耦合的结果。具体而言,玻尔强势、霸道,玻恩内敛、低调,海森堡工于心计、为成功不择手段。在特定历史时期这几个不同性格特征者相互关联,使一段极为重要的科学史的真相被扭曲。在错误的史学叙事下,玻尔的影响长期如日中天,海森堡较早奠定了稳固的科学地位,玻恩却在事业高峰期后旋即进入苦涩、昏暗、被忽视的后半生,直到今天他的真正科学地位也未彻底得到世人的客观评价与公正对待。

关键词:玻恩;玻尔;量子力学史;后真相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1

一、引言：玻恩是建立量子力学的 导演兼主角

25年前笔者因为偶然翻阅玻恩的一本小书而开始对他产生兴趣,通过点滴积累资料而对他的了解逐渐走向深入。随即发现此前学者对量子力学发展史的描述存在严重问题——多数情况下对玻恩的决定性作用和重要贡献认可有限,甚至有的著述^[1-2]根本不把他列入该领域的功勋科学家之列。如《物理学世界大国的统治者》一书在量子力学史部分,为索末菲、泡利、海森堡等单列章节,但是玻恩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笔者持续地在国内外图书馆和档案中心浏览、爬梳文献资料,搜集玻恩的学生、合作者、部分知情者散落于著述、书信以及访谈中的,关于玻恩、玻恩学派以及量子力学的真实建立过程的文献或

只言片语。在过往的量子力学历史著述中,几乎都将玻尔描写成建立量子力学的领袖、总指挥。在这样的著述中,很容易发现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一方面说玻尔是缔造量子力学的领袖、总指挥,但另一方面却称量子力学的第一个体系为玻恩的哥廷根矩阵力学,而不是玻尔的哥本哈根矩阵力学;也偶见有人质疑玻尔的贡献是否属实,但遗憾的是未见同时对玻恩贡献的肯定;还有人出于对玻尔及其学派的反感而肯定玻恩的作用,但是却没有展示出充分的文献证据。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基于可靠文献资料,在《科学文化评论》《自然辩证法研究》^[3]《科学与社会》^[4]《物理》^[5]《大学物理》^①等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出版了两本专著^[6-7]。笔者的研究结论是:玻恩是建立量子力学最重要的领袖,是他带领助手和学生积年探索、跋涉,才引领海森堡、约当等人逐渐走上了建立量子力学

① 2015年至2016年,《大学物理》曾连载笔者研究玻恩学派的16篇文章。

的正确道路^[8]。在这个过程中,玻恩不仅凭学术直觉引领和主导哥廷根物理学派的研究方向,而且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强力开拓者、建设者。早在1924年,玻恩就已经为量子力学这一概念量身命名,此时量子力学理论尚未诞生。海森堡关于矩阵力学的“一人文章”里所用的两个基本思想方法,均源自玻恩强调多年的研究理念^[9-11];建立矩阵力学所用的数学工具,完全来自玻恩在哥廷根大学所习得的内容,以及他对彭加勒处理行星系统数学方法的借鉴和改造。正如大卫·C. 卡西第所说,1925年之前,玻恩为建立量子力学所做的准备:“一切事物似乎都已严丝合缝。”^{[12]233}虽然这时完整的量子力学还没出现,“但是玻恩的新法则却是沿着那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而且对一年后实际的量子力学的表述来说是不可缺少的”^{[12]234}。如果将建立量子力学的过程比喻成一场大戏,那么玻恩是长期策划并不断探索的导演兼主角;海森堡当时只是以最差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为玻恩做助手的一个刚20岁出头的小伙子,虽然有能力和还处于不断向玻恩学习物理学和数学的阶段。有人称海森堡为哥廷根物理学派领袖完全是不顾基本事实的无知;至于玻尔,则可谓建立量子力学的局外人^[13-14]。

除了作为学派领袖为建立量子力学所做的多年关键的准备工作外,玻恩在矩阵力学的具体建设过程中的贡献也是主导性的。玻尔曾回忆说,在玻恩带领约当撰写矩阵力学的“二人文章”时,海森堡还不知道矩阵为何物^[15]。因此说海森堡在建立矩阵力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笔者早就指出了物理学家们的一个共识:海森堡的“一人文章”里还没用矩阵,因此还不是矩阵力学^{[9]46}。玻恩首先认识到可以借助于矩阵表达量子力学,并带领约当、海森堡建立了矩阵力学的理论体系。物理学史家海耳布朗对玻恩贡献的一个小结虽然简略,但大体有理:“玻恩将玻尔理论中的一些动力学物理量,翻译成量子力学方程中的实在量,比如频率、跃迁几率等等。沿着这一道路,海森堡创造了一种称为‘运动学重新解释’的标准理论。玻恩意识到海森堡的研究结果是矩阵代数并提炼出 $pq - qp = \frac{h}{2\pi i}$;然后与海森堡、约当合作,建立了矩阵理论学的理论体系。”^{[16]741}说海耳布朗的说法简略,是因为事实上玻恩把建立量子力学所需要的物理量“翻译”成后期海森堡所用的

形式,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是玻恩耗时多年才取得的突破;说这个说法大体有理在于,玻恩不是直接将玻尔理论中的物理量一一对应地“翻译”成建立量子力学的可用量,而是经过探索放弃玻尔理论中不适用、不合理的物理量之后,再尝试性探讨出来其他物理量。玻恩晚年一改此前的谦逊与低调,1962年当托马斯·库恩问量子力学从哪而起时,他说:“那肯定不是始于哥本哈根(And that was certainly not in Copenhagen)。”而谈到玻尔对于量子力学是否做了什么时,玻恩的回答更为干脆:“And Bohr never claimed anything。”^[17]玻恩晚年的这个说法比他早年的某些客套更加符合事实。

截至目前,在国内外物理学史界,笔者仍然是明确提出玻恩为建立量子力学的真正领袖这一观点,并基于文献对此作出系统论述的唯一研究者。与玻恩在量子力学建立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相反,在玻恩带领弟子们为建立量子力学在哲学与物理思想、数学方法等方面做艰难的探索时,在玻恩带领助手和学生建立量子力学时,在玻恩为量子力学做出关键性的统计解释时,玻尔均不是正确方向上的同行者,甚至均不在场,因而毫无贡献。这其中的每个环节,今天基于文献可以一一认定,不存在含糊其辞或任何模棱两可。

二、玻尔无功而坦然占据量子力学建立者之C位

物理学家阿尔明·赫尔曼说过:“伟大的物理学家都有许多传奇。这些传奇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困难:为了弄清真实历史,历史学家必须撇开这些传奇。”^{[2]46}遗憾的是,量子力学发展史的研究者们没有仔细辨别,流传的故事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的传奇。玻尔身上的传奇委实颇多,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说:“我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对玻尔谈得很少……因为我不愿意把他可能并不持有的观点强加于他。”^[18]波普尔的言外之意是,他发现有人将一些不属于玻尔的思想观点放在了玻尔的身上。关于玻尔的动人故事实在太多,玻尔的光辉形象就是这些故事“造神”的结果。

杨福家院士称玻尔是建立量子力学的“核心人物”^[19]。还有人为玻尔辩护:“玻尔本人‘没有来得及’发表他的论文,没能像海森堡那样具体地提出一套矩阵力学的理论,但是他的作用却无论如

何不可低估。”^{[20]73}甚至认为,玻尔对于量子力学的贡献,“绝不次于其他任何一位量子力学创始人”^{[20]72}。这么说的理由和借口是:在量子力学兴起的时期,“若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找一个最活跃的核心,恐怕必须要推玻尔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20]73}。“恐怕”一词说明了一切,这实质上是对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没做具体考察的主观臆测。笔者早已基于文献论证,在玻恩走在建立量子力学的正确方向上时,根据海森堡的回忆、根据玻尔身边人的回忆,玻尔对玻恩的正确而有效的做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还在设法挽救他自己的原子理论,而做不到弃之重来。因而玻尔根本不可能走在建立量子力学的正确道路上,也就根本没有什么“不可低估的”贡献^[13-14]。

量子力学也不是在玻尔学派或玻尔研究所建立的。且不谈玻尔的研究是不是真的活跃,即使它活跃,这活跃与建立量子力学有何干系?对此玻尔研究者是有辩解的:“在这种理论的三位创始人中,有两位(玻恩和约当)是以哥廷根为基地的,而另一位(海森堡)当时则往来于丹麦和德国之间。但是……他们的思考路线和努力方向都主要来自哥本哈根;那里是他们的司令部,而尼尔斯·玻尔就是他们的很得军心的‘司令’。”^{[21]265}玻恩是一个重要学派的领袖,他的努力完全受自己学术眼光所指引,没有受玻尔的影响。而当时约当是玻恩的博士生,对玻恩亦步亦趋,也还没有接触过玻尔。那么,如果玻尔对量子力学有贡献,只有一种可能,也许他对海森堡有过关键影响。

海森堡第一次访问哥本哈根是在1924年3月15日至27日,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当时玻尔正在与克拉默斯、斯拉特一起研究BKS理论(这就是后来斯拉特回忆的一生中最痛苦的被玻尔精神虐待时期),在短暂的时间里连玻尔与海森堡产生什么火花的虚构故事都不存在。海森堡第二次访问玻尔研究所始于1924年9月17日。在哥本哈根期间海森堡与玻尔的助手克拉默斯合作完成了《关于源自对辐射的散射》一文。关于两人的这次合作,有学者的研究已经十分清楚:“在论文初稿中海森堡与克拉默斯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海森堡采用典型的哥廷根方式(或玻恩方式),也就是用完全的、彻头彻尾的数学手段来着手色散问题;而克拉默斯则采用典型的哥本哈根方式(或玻尔方式),也就是时时处处都不忘记直观的物理模型,即需要依赖于物理类比。最后由玻尔作出裁决,海

森堡成为赢家。”^[22]这种解释合情合理。海森堡在玻恩手下几年,已经成熟地掌握了玻恩学派的基本风格,他与受玻尔影响的克拉默斯发生学术冲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一期间,玻恩学派的工作方法在海森堡的学术世界已经稳固地在发挥作用。事实虽然如此,海森堡与克拉默斯的“合作”,在玻尔研究者的著述中却变成了海森堡是玻尔理论直系后裔的依据:“海森堡在哥本哈根受到‘大师兄’克拉默斯的指教,他二人利用玻尔的对应原理研究了光的散射问题。回国以后,海森堡就于1925年夏天写了矩阵力学的第一篇文章……”^{[23]106}这种史学叙事完全属于没有史料依据的主观臆测。事实上,从海森堡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直接应用的不是玻尔的对应原理,而是玻恩的对应法则。彭桓武先生在著作中,介绍玻尔的对应原理后指出:“玻恩(1924)给出了振动系统受微扰的普遍方法(也包含克拉默斯色散关系),并第一次用量子力学作为文章的标题。他指出,对于物理量 Φ ,经典 $\rightarrow$ 量子的关系普遍为:

$$\tau \frac{\partial \Phi}{\partial J} = \frac{1}{h} \tau \frac{\partial \Phi}{\partial n} \rightarrow \frac{1}{h} [\Phi(n + \tau)] - \Phi(n)$$

或者: $\tau \frac{\partial \Phi}{\partial J} \rightarrow (n + \tau) - \Phi(n)$ 。

其中 J 是作用量, h 是作用量子(普朗克常量)。”^[24]并据此指出,海森堡正是借此将对应观念引入矩阵力学之中的。笔者还曾论证,在海森堡撰写“一人文章”中,他竭力强调的另一重要思想(可观察性原则)与玻尔理论完全相悖,而是直接来自玻恩的影响^[11]。

玻尔的信徒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具体而关键的学术史细节,即认为玻尔、克拉默斯的“指教”是海森堡写出“一人文章”的直接原因,然而事实比臆测更能说明问题。1925年7月初,海森堡把写好的“一人文章”文稿送给玻恩(而不是玻尔),让玻恩决定是否值得发表。玻恩看后把文稿推荐给《物理学杂志》的编者,1925年7月29日《物理学杂志》收到了海森堡的文稿,9月此文得以发表。著名物理学家、科技史家派斯客观地指出:“注意到一点是有趣的,那就是他(指海森堡)从6月初到8月底根本没有通知玻尔!……海森堡第一次就他的工作给玻尔写信,实际上是在8月31日,而且那也是写得很隐晦的……”^[25]这就是说在海森堡撰写“一人文章”过程中,甚至文稿写好后,他都没有与玻尔、克拉默斯做过任何相关讨论,但将文稿委托玻恩

全权处理。因此,要论证玻尔、克拉默斯两人对海森堡这篇文章的诞生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实属牵强。如果这两人对海森堡的研究确实有启发和直接影响,按照西方的学术惯例,海森堡的做法是反常的。苏联作者撰写的《玻尔传》指出:“1925年8月30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六次斯堪的纳维亚数学代表大会上,熟悉了海森堡、玻恩和约当工作的玻尔在报告中表示出对刚刚萌芽的量子力学问题的兴趣。”^{[26]293}这一说法与派斯的研究可以互相印证,派斯与苏联研究者的说法都说明,海森堡撰写“一人文章”过程以及直到投稿和接近发表,玻尔都一无所知、毫不知情,事后才有所了解。除此,不要忘记笔者前文刚刚提过:海森堡文章里的主要思想方法不是来源于玻尔或克拉默斯,而是来自于玻恩。因此,玻尔研究者认为海森堡的“一人文章”深受玻尔甚至克拉默斯影响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纯主观臆测。

再看玻尔学派。卢鹤绂院士认为“发展量子论的先行者,主要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带头成员”^[27],并将玻恩列为其中的第四号人物;但是作为哥廷根物理学派的领袖,玻恩从来不是,他也从来未曾承认自己是玻尔学派的一员。玻尔学派还被中国学界视为20世纪物理界领头羊:“玻尔学派(也称哥本哈根学派)就是崛起于这个关键时期(指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著名学派之一……玻尔学派始终居于物理学发展前沿……”^[28]事实如何呢?著名物理学教授关洪认真研究玻尔学派后发现,哥本哈根学派只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神话”:它有机构、有足够的财政和物质支持,但“这个集体既没有形成一种研究纲领,也没有制订出什么具体(研究)计划”^[29]。

玻尔研究者知道,国外了解真相的少数一流物理学家不认可玻尔:“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曾经评论说(大意),有人认为没有玻尔,人类也能摸清原子结构。”^{[23]8}玻尔的粉丝、美国氢弹之父特勒对这个观点也有过类似的明晰表达:“特勒认为:有玻尔也好,没有玻尔也好,原子理论是照样会得到发展的。”^{[30]49}然而,总体而言,对20世纪这段极为重要的科学史的歪曲仍在继续,不求甚解而对玻尔盲目歌功颂德的著述仍然在不懈地发酵,玻尔至今仍然牢牢占据建立量子力学物理学家群体之C位。比如一本2016年再版的书籍,赫然名为《玻尔:量子力学领袖》^[31],全书不列一条参考文献,内容只是对此前歌颂玻尔伟大功绩那类虚

假神话的简单汇集。不仅我国如此,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大体如此。有位日本作者撰写的一本面向儿童的《漫画量子力学》,书中有一个话题是:“玻尔为什么被称为‘量子力学之父’?”^{[32]136}这本书错误地强调指出:“能够被称为‘量子力学之父’的只有尼尔斯·玻尔。”^{[32]138}这类著述不求甚解即草率地向儿童传输歪曲史实的科技史,使下一代先入为主地形成难以纠正的错误史观。诸如此类的著述令了解真相的人愈加感到有责任纠正这一错误。分析并揭示未为量子力学做贡献的玻尔是怎样被称为量子力学之父的,即为本文的核心主旨。

三、主角玻恩为何不在C位?

量子力学发展史之错乱,在笔者看来出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其一,对事实不了解因而违背事实的肤浅宣传较多;其二,有些物理学家为了抱住1922年获得诺贝尔奖且手里拥有其他物理学家无法比拟的学术资源的玻尔教授“粗壮的大腿”,通过夸张地称赞玻尔的影响及贡献而向玻尔示好;其三,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一些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在缺乏充分依据的前提下,轻信基于这些虚构而塑造的量子力学发展史,并进一步以讹传讹;其四,玻恩早期为了推出自己的弟子而将建立矩阵力学的功劳主要归之于海森堡,海森堡坦然受用,却从未向外界说明他们在玻恩教授指导下,学习数学与物理,才成功建立了矩阵力学。

(一)玻恩为海森堡邀功,海森堡夸大玻尔对他的影响

量子力学发展史被歪曲,最大的受害者是玻恩,然而玻恩是为自己挖坑的第一人。玻恩有个习惯,喜欢突出甚至夸大其合作者的作用。笔者曾以玻恩与黄昆的合作为例指出,如果合作者都是谦谦君子,玻恩这样做不会受害^[17];但是如果合作者是像海森堡这样的人,工于心计、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戈革教授描写海森堡语^{[12]166}),那么玻恩这样做的灾难性后果就无法避免。从一开始,玻恩就将建立量子力学的工作单纯归功于海森堡。如1926年玻恩在牛津英国学术协会宣读的报告中称海森堡一个人为“新理论的奠基者”^{[33]6}。1927年在意大利科摩举行的纪念伏打逝世一百周年的国际物理学会议上,玻恩在发言中,还是称量子力学源自海

森堡的原创思想^[33]¹⁴。刚刚建立了矩阵力学后去美国讲学的玻恩,在美国多所大学做学术报告时也都如此表述——矩阵力学属于海森堡。回到哥廷根还是一样,1928年玻恩在哥廷根大学作学术报告时再次肯定地说:“新量子力学是由两种不同形式演化来的,其一是在海森堡的基本观念之上。”^[33]³⁰

与玻恩的做法相反,从1925年矩阵力学问世到1950年代,海森堡从来没有向外界公开讲述玻恩对他的巨大影响,以及玻恩在建立量子力学过程中的重要导师作用。相反,他强调玻尔甚至爱因斯坦对他的影响。以1933年12月11日海森堡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为例,海森堡的整个演讲,提到玻尔不少于13次,提到玻恩,却只有2次。提到玻尔,海森堡满怀感激:“感谢玻尔,因为他对量子力学的概念性原理做了最清楚的分析……”在提到玻恩的2次中,1次海森堡应该特别指出玻恩的突出作用,但他却没这么做;1次海森堡说得更加含糊、模棱两可。展望量子力学的未来,海森堡更是彻底忽视了建立量子力学过程中实际上他后来承认对他帮助最大的玻恩:“不用说,研究工作应该以德布罗意、薛定谔、玻尔、约当和狄拉克的研究为基础。”^[34]海森堡不仅早期很少提到玻恩在建立量子力学过程中的巨大贡献,而且对于玻恩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即波函数的统计解释,也不予客观评价。这曾引起科学史家派斯的不解:“有点奇怪的是——这使玻恩有一些懊恼——他的论几率概念的论文在早期总是不能被充分认可。海森堡在自己对几率的解释——1926年11月写于哥本哈根——就没有提到玻恩。”^[35]

海森堡在公开场合总是弱化甚至无视玻恩的影响和作用,但是私下他却不然。就在他做诺贝尔奖获奖报告前不久,1933年11月25日他在写给玻恩的信中却是另外一种说辞。他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的工作,由于其他人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只有他一个人获奖,他为此沮丧而惭愧;他相信:“所有优秀的物理学家都了解您和约当对量子力学结构的贡献有多么伟大。”^[36]²²⁰因此,说海森堡工于心计确有依据。

从客观结果看,玻恩与海森堡两人截然相反的做法使很多人,即使是物理学界的人,甚至是玻恩的朋友和学生,也都无法客观认识到玻恩在建立量子力学中的实际作用。拉登伯格是玻恩的老朋友,魏格纳深受玻恩影响并高度评价玻恩,但是

即使是20世纪物理界这样重量级的与玻恩较为亲近的人物,也被混淆视听。1934年他们曾撰文指出:“海森堡的(量子)力学思想诞生于哥本哈根他敬爱的老师玻尔周围小圈子的刺激。”^[37]没办法,玻恩将量子力学归功于海森堡,海森堡则热情地感谢玻尔对他的影响,别人无法甄别这些说法的真假,甚至都不会产生怀疑这些说法的意识。玻恩对于自己早年的做法,晚年有过懊悔的回忆:1925—1926年在美国讲学时,“我在讲演中谨小慎微地把量子力学的发现归功于海森堡,结果在后一段时期,美国文献中几乎都不曾提到过我和约当在这方面的贡献”^[36]²²⁰。不提他与约当的贡献的,又何止在美国?玻恩掉入为自己挖掘的大坑而难以自救,可谓追悔莫及。

无法论证海森堡是不是清楚一个事实:爱因斯坦和玻尔这两个人都不是建立量子力学的直接参与者,无论海森堡如何强调爱因斯坦和玻尔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影响他自己的学术地位;但是玻恩是建立量子力学的真正领袖,却自己主动躲到了幕后,如果海森堡强调指出玻恩对于量子力学的决定性贡献,那么将直接威胁海森堡的学术贡献。事实上海森堡的做法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完全利于他自己的。那么海森堡对此是心里糊涂吗?非也。他一直清楚得很,1933年他写给玻恩的“忏悔信”说明他当时就清楚玻恩没获诺贝尔奖不公平。1962年玻恩迎来80寿辰,这一年海森堡发表名为《贺马克斯·玻恩80寿诞》的文章。在文中海森堡说:“一批堪称精英的年轻学生与研究人员,包括泡利、费米、约当、Karekjarto、洪德,以及其后的狄拉克、奥本海默、韦斯科普夫等人,他们经常聚集在玻恩身边参与讨论。讨论经常是晚上在玻恩家里宽敞的音乐室里举行,玻恩夫人摆上水果和点心,使讨论更加美好。”^[38]在为《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所做的序中,海森堡说:“玻恩与爱因斯坦不同,在哥廷根建立了一个理论物理学派。他教授正规课程、组织讨论会,很快就成功地在他周围聚集起了一批杰出青年物理学家……哥廷根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39]1971年N.Kemmer和R.Schlapp发表了一篇关于玻恩的文章,他们说在撰写的过程中,晚年的海森堡告诉他们:“正是哥廷根的特殊精神,正是玻恩以自洽的新量子力学为基础研究目标的信仰,才使他收获丰硕的成果。”^[40]虽然这些表述中都没提玻恩对他的具体影响,但是毕竟他已经高

度肯定玻恩对他的影响。可见,在他的心里,玻恩作为导师和领路人的角色定位一直未变,只是他早年长期对此不作公开说明罢了。

玻恩在哥廷根物理学派的黄金搭档、实验物理学家弗兰克是玻尔的铁杆粉丝。玻恩回忆说:“当弗兰克发现,难题最后不是哥本哈根解决的,而是他隔壁房间的人(指玻恩自己)时,他有些被震惊了。”^{[36]211}玻恩带领学生建立了矩阵力学的结果令弗兰克震惊。所以,弗兰克深刻了解玻恩所做的贡献。在祝贺玻恩70寿辰的信中,弗兰克如此安慰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的玻恩:“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的价值。这样你就不必担心收不到(诺贝尔)官方(获奖)函。”^{[41]294}

玻恩一生都是海森堡“控”,但是他也曾对海森堡极为失望。1949年11月,玻恩曾明确向玻尔表达自己对海森堡的不满:“在纳粹时代,我不能期望他讲出真话,但是战后至今,他仍然一声不响,这令我十分失望!”^{[41]284}可见,玻恩一直在等待着海森堡向世人昭示他这位老师的科学贡献。

作为被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称为可以获得几次诺贝尔奖的玻恩,多名助手和学生都先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自己却要在作出重要的贡献后,被冷落几十年,直到70余岁,才与他人一道分享诺贝尔奖。笔者曾指出,玻恩的如此遭遇,他最该“感谢”的就是他最欣赏的、最溺爱的弟子海森堡^[10,42]。但是首先矮化玻恩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海森堡不过是“将错就错”,从而“更好”地成就了自己而已。

(二)玻尔令其他量子物理学家生活于他的影子世界

杨振宁基于费米等人的耳闻目睹,以及自己的研究,曾向笔者提出一个猜测:玻恩的学术命运可能是玻尔故意促成的,并建议笔者尝试考证^[43]。笔者没有找到这方面直接的证据,但是认为玻恩与玻尔生于同时代,不同的性格导致即使不是玻尔出于主观故意,他的行为也客观地对玻恩造成了伤害。大卫·C.卡西第说:“安静的、克制的玻恩”,常常“显得是苍白的”^{[12]187}。海耳布朗认为玻恩“胆怯、暗淡多病,并对自己的判断不自信”^{[16]740}。汤川秀树认为玻恩的性格是软的:“学者有不同的类型,他们可以被区分为‘硬’和‘软’的两类,马克斯·玻恩显然属于‘软’的成分较多的那种类型。”^[44]

按照汤川秀树的物理学家“软硬二分法”,玻

尔毫无疑问属于“硬”派人物。有研究者指出:“玻尔天性勇猛顽强。”^{[26]87}玻尔是玻尔研究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者,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尽展理论物理代言人的做派与强大气场。这正如马丁·克莱因所说,玻尔“无论在哪里理论物理之父的名号都非他莫属”^[45]。具有如此性格的玻尔,善于运作、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并且一向行事高调、具有主导一切事务的统治力。自我克制、苍白、软弱的玻恩,遇到天性勇猛、当仁不让的玻尔,不难想象将会发生些什么。

笔者从1920年玻恩已经思考寻找玻尔理论替代物这个时间点开始,汇总了玻尔的主要学术与社会活动大事记:

1920年邀请爱因斯坦、卢瑟福来哥本哈根访问;1921年成立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玻尔任所长,得以邀请其他科学家来研究所交流;1921年10月在哥本哈根物理学核化学学会联合会议上作长篇演讲;1922年获得诺贝尔奖;1923年7月再次邀请爱因斯坦来哥本哈根;1925年8月30日在斯堪的纳维亚数学会议上,玻尔做“量子论和力学”的学术报告;1926年先后邀请狄拉克、薛定谔等来玻尔研究所;1927年9月在意大利科莫举行的国际物理学会议上提出互补原理,10月参加第五届索尔维物理学会议,因为与爱因斯坦交锋而名声大噪;1929年召开第一届哥本哈根物理学会议,是年在斯堪的纳维亚自然科学家会议上演讲;1930年于第六届索尔维会议上,再次与爱因斯坦交锋,成为国际物理学界的焦点;1931年与苏联物理学家朗道就电磁场的客观测量问题展开辩论;1932年在国际光疗会议开幕式上演讲,是年发表纪念法拉第长篇演讲;1933年,玻尔成为丹麦支援流亡知识分子委员会理事,得到了经费,可以使年轻的流亡物理学家留在他的研究所;1934年玻尔访问苏联,在苏联发表一系列演讲;1935年爱因斯坦与玻尔继续通过发表论文而展开论战,同年玻尔当选为丹麦防癌委员会主席;1936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关于科学统一性国际会议上演讲;1937年玻尔到美国、日本、中国和苏联讲学,10月在波罗那召开的物理学与生物学会议上发表演讲;1938年玻尔研究所成立加速器部,同年8月在人类学及人种学国际会议上演讲,论述互补性与人类文化;1939年玻尔当选丹麦科学院院长,任职直到其逝世;1940年玻尔捐出诺贝尔奖章,支援芬兰抗德;1941年应丹

麦学会邀请为《丹麦文化》撰写前言;1943年英国政府秘密邀请玻尔去英国,与丘吉尔有过会谈;1944年玻尔到美国,会晤罗斯福总统;1945年玻尔来往英美政要间,8月返回丹麦的玻尔研究所,受到热烈欢迎;1946年玻尔赴美,参加美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的当前趋势和国际问题”讨论会,发表演讲;1948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继续与爱因斯坦争论;1949年在哥本哈根丹麦医学学会集会上演讲;1950年发表《致联合国的公开信》,支持募集“以色列基金”;1951年在玻尔研究所做历时2个小时的报告;1952年欧洲十四国代表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商议建立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玻尔任主席;1953年玻尔访问以色列;1954年玻尔被邀请在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集会上发表演讲;1955年玻尔出任丹麦设立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还出任北欧理论原子物理学研究所管理委员会主席,8月在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开幕式上演讲,10月在哥本哈根丹麦皇家科学院演讲;1958年在伦敦物理学会集会上演讲;1959年9月在英国布利斯特仿生学会议上演讲;1960年8月在哥本哈根国际制药科学会议上演讲;1960年10月应欧洲文化基金会邀请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演讲;1961年在第十二届索尔维会议上演讲;1962年6月在科伦实验遗传学研究所开幕式上演讲……

可以看出,玻尔以及玻尔研究所,有丹麦政府的支持;在丹麦,玻尔是科学技术的代言人、偶像。在不限于物理学的国际学术界,玻尔始终具有话语权、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客观上为科学、为丹麦、为欧洲、为人类,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他的影响已经超越科学界,他是一位掌握着足够资源、有巨大影响力的科学政治人物。超乎科学界同仁之上的国际地位,使得他永远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是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的代言人。即使在其他同僚千方百计淘汰他的理论的时期,他依然觉得自己是科学界的王者。因此,虽然量子力学会取代他的旧原子理论,虽然他对建立量子力学不见寸功,但是他却作为量子力学代表人物与爱因斯坦长期角斗。他们两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一个认为量子力学是完备的理论,一个不认为如此。而更进一步,爱因斯坦反对和不接受的是把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作为终极解释。这样一来,爱因斯坦质问的对象应该是玻恩而不是玻尔。事实上也如此,1926年12月4日爱因斯坦在写给玻恩夫妇的一封信

短函中第一次指出:“无论如何,我都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46]105}这发生在所谓玻尔—爱因斯坦论战之前。1944年10月7日,爱因斯坦在写给玻恩的一封信的尾部,再次提及:“在我们的科学期望方面,我们变得正好相反。你相信掷骰子的上帝,而我相信客观存在的世界中的完备的定律和秩序……甚至量子论起初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能使我相信基本的掷骰子游戏。”^{[46]174}此时是在爱因斯坦与玻尔的索维尔会议争论之后。可见,在爱因斯坦看来,关于量子力学,他无法接受的核心内容的“始作俑者”,是玻恩而不是玻尔。有权威著作毫不考证就将“掷骰子”的著名表述说成源于爱因斯坦与玻尔两人之间的争论,那是不折不扣的无稽之谈。搞清了这些背景,再看玻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所谓世纪大战,是不是有些尴尬甚而滑稽?玻尔在做什么?他在为别人创造的取代了他的理论的新理论而辩护!一个被革命者却以新理论代言人的姿态,为了维护取代他的理论的理论,激烈地与另一个对新理论有所质疑的科学大佬喋喋不休地辩论——这堪称科学史上一幅少见的画面。而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人,除了玻尔,其他人很难作出如此行为。

既然如此,那么玻尔的光芒万丈使其他人,如低调的量子力学实干家玻恩,变得黯淡无光,真正的科研统帅变成了玻尔影子里一枚无足轻重的灰色存在,主角变成无足轻重的配角之一,就是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了。

(三)玻恩孤寂品味世态炎凉

与玻尔在量子力学建立后声名日盛相反,玻恩在建立量子力学后,连年霉运当头、祸不单行。首先玻恩发现妻子在自己忙于建立量子力学期间移情别恋,这对他的身心造成巨大打击,加以前积年的过度劳累,使得他身心崩溃,以致于有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丧失了教学和科研的能力,更加淡出物理学界。之后情况趋于正常,但是随着纳粹上台,德国形势迅速变化,在海森堡等人去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1933年,玻恩背井离乡被迫离开德国,在意大利山村小镇逗留一段时间后,去英国剑桥,在这里他得到了为期两年的(后来又被告知缩短期限)临时讲师职位。1935年秋季,玻恩携家人赴印度并期待在那里获得固定职位未果,1936年春天返回剑桥。在彷徨无着之际,机会降临,他被聘为爱丁堡大学教授,从而开始直到71岁退休的稳定工作与生活。在这期间,玻尔是海森堡的恩

师、海森堡是量子力学建立者的认识在学界已经根深蒂固。其后直到1950年之前,玻恩在建立量子力学过程中是真正的领袖和核心建设者的事实,无人肯定、无人宣传。

玻尔研究者强调的玻尔与海森堡在1922年哥廷根“玻尔节”上一见即缔结了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之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这一说法,1922年玻尔与还要一年多才博士毕业的海森堡一见如故,并向海森堡发出了当年秋季去哥本哈根访问、博士毕业后去那里长期工作的邀请^{[21]235}。这种说法是否属实,玻尔是客套还是真的慧眼识珠,已经无从考证。可知的史实是:海森堡在哥廷根与玻恩、约当完成矩阵力学三篇经典文章之前,玻恩的赏识和极大帮助才是海森堡成为一位物理学家的基本保障。首先,是玻恩说服海森堡的父亲同意海森堡继续以研究物理学为职业,玻恩更是给了海森堡雪中送炭般的巨大帮助:当海森堡勉强通过博士答辩后,可怜兮兮地问玻恩是否还会让他继续做助手时,玻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如果玻尔与海森堡1922年6月的约定言之凿凿,此时海森堡为什么 not 向玻尔这位“伯乐”求救而是回到玻恩身边?须知此时正是德国经济危机最困难时期,玻恩除了给他的私人助教解决薪金,还联系德国当时的经济危机时期科学紧急联合会,为海森堡申请研究经费;1925年下半年还曾向德国文化部为海森堡申请了为期两年的讲师生活资助。这一切才使海森堡得以专心科研。关于这一切,戈革先生翻译的《海森堡传》里写得清清楚楚^{[12]204-209}。笔者也曾对此做过认真梳理^[42]。明白事实真相后,再看海森堡长期口口声声称玻尔为恩师却对玻恩只字不提时,难免会让人想起一个词:忘恩负义。

事实上,随着1927年后玻恩个人生活状态以及外界环境的逐步恶化,海森堡才开始真正向玻尔靠拢,把玻尔当成新的靠山。在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玻恩和海森堡共同提交了名为《量子力学》的报告^[47],海森堡此时仍然是玻恩的“跟班”。玻恩的传记作者南希·格林斯潘说,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是哥本哈根解释的起点”^{[41]148}。南希·格林斯潘的说法在时间上与戈革先生的判断是一致的:“大致说来,这一学派从1927年开始出现。当时新量子力学的表述形式已经基本完成。”^{[48]610}戈革对于哥本哈根学派有这样的定性:“一般理解下的‘哥本哈根学派’是指那些主要在科学哲学观点

上和玻尔基本上一致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48]147}这些人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理解和解释量子力学,因此戈革先生的这句话又与南希·格林斯潘把哥本哈根解释的起点确定为1927年彼此协调,不过戈革先生的阐述可以进一步说明哥本哈根学派的本质特征:它是哲学观点相似而不是具有共同研究纲领的物理学研究团体。1927年之后海森堡和泡利对于玻恩物理学的“形式主义倾向”的反感有了非常明确的表现。由于他们对玻恩的批评,使玻恩非常欣赏的年轻物理学家布洛赫,在与玻恩签订了协议的情况下,放弃成为玻恩的助手,转而成为克拉默斯(玻尔的长期助手)的助手^{[41]149}。这一切表明,海森堡和泡利此时已经彻底投身于玻尔麾下。

1950年,玻恩的一位老熟人西蒙曾向玻恩建议,请玻尔发表文章说明真相以改变物理学界的错误认识局面,但是玻恩没有同意:“他(玻恩认为)假设最初关于量子理论授予诺贝尔奖时玻尔已经被咨询过,而现在他的信(又)确认玻恩的贡献,(那将陷玻尔于)自相矛盾之中。”^{[41]285}玻恩一如既往地还在替他人着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蒙写信给玻恩当年的一位助手罗森菲尔德,请他撰文介绍玻恩的工作。罗森菲尔德发表了一篇文章^{[41]286}。从此开始有人公开为玻恩说话。在一篇纪念普朗克提出量子化概念的文章中,海森堡第一次指出:“我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强调玻恩和约当对于建立量子力学的伟大贡献,因为这些伟大贡献在公众的眼里经常得不到充分的承认。”^{[41]286}海森堡不说真话,导致恩师玻恩大半生闷闷不乐,并失去自信,失落地认为自己只是二流物理学家。

(四)为玻尔封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玻尔是20世纪物理教育大师

笔者一直相信,出于特殊原因,科技史界那些无限拥戴玻尔的学者中,有人心里十分清楚玻尔对于量子力学是身无寸功的。所以将玻尔研究所、玻尔学派描写成培育科学人才的圣地,将玻尔渲染成空前绝后的物理教育大师,就成为这些人为玻尔封神的最后一线希望。1977年苏联出版的《玻尔传》即是一例。它说:“尼尔斯·玻尔没有被正式列为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他在这一领域内的著作不多,也不是主要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门科学实际上是在哥本哈根的熔炉里‘锻造’的,而指挥这一锻造过程、鼓舞青年们建立功

业的,不是别人,正是尼尔斯·玻尔。因此,量子力学也是他的产儿。也就是说,应当把玻尔看作为量子世界观的创立者。”^{[26]108}罗伯森在1979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虽然玻尔本人并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对量子力学的建立有直接贡献的文章,但他在指导和鼓舞年轻一代物理学家方面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9]在此之后戈革先生更加彻底地指出在建立量子力学的“激动人心的奋进中,玻尔事实上起了‘总指挥’的作用”^{[48]199},而“特别在新量子力学的诞生阶段,玻尔的研究所简直成了众望所归的‘大本营’和‘司令部’”^{[48]18}。在众多著述^[50-51]中,玻尔的学派和研究所成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圣地,玻尔成了了不起的物理教育大师。

事实上,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和物理学教授,玻尔一辈子没有撰写、出版一本为物理学界所称道的物理教科书或物理学专著,他一生只培养了1位博士生。笔者曾在文中^[14]以可靠文献为依据说明玻尔在研究所常粗暴打压年轻人,斯拉特、费米(诺贝尔奖得主)甚至海森堡等都有受玻尔伤害的切身经历。这样的一位教授被塑造成一位物理教育大师,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在汉语世界除笔者之外^[52-53],似乎还没有人将玻恩称为物理教育大师。然而玻恩一生指导了40余位博士生,在玻恩的助手、博士生、研究所来访者中,有实在证据表明很多人在玻恩的直接影响下,开启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有人作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有:朗德(朗德因子提出者)、斯特恩(1943年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约当(建立矩阵力学第三人)、洪德(洪德规则的提出者)、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玛利亚·格佩特-迈耶(1963年诺贝尔奖得主)、维斯科普夫(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欧洲核子中心主任,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的导师)、艾尔萨色(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得者)、维格纳(在哥廷根玻恩学派期间,开始基于群论研究量子力学的工作)、伽莫夫(提出过宇宙大爆炸学说并在多领域有杰出科学贡献)^[54]、海特勒(量子化学重要开拓者)、特勒(美国氢弹之父)^{[30]25}、福克斯、彭桓武(与玻恩共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黄昆(与玻恩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程开甲(与玻恩一起提

出超导电性双带理论)、杨立铭(在玻恩指导下成功解释了原子核内幻数问题)、沃尔夫(与玻恩合著《光学原理》)、格林(与玻恩一起研究液体理论)……一定有人不愿意打碎玻尔头上20世纪最伟大物理教育家的桂冠。笔者非常欢迎有人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搜集所谓玻尔教育、影响年轻物理学家的可靠证据,而不是虚构与学术无关的故事,在培养人数多少以及培养的学者对20世纪物理学发展所起作用大小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看看在育人贡献方面玻尔是否具有与玻恩的可比性。另外笔者也曾指出,玻恩撰写的《原子物理学》^①、《光学原理》^②、《晶格动力学理论》^③等著作,均为所在领域之经典,是历代物理学子必读之要著^[53];玻尔何时做过相似工作?玻尔与玻恩,究竟哪位才是20世纪物理教育大师?究竟谁的学派才真的是建立量子力学的最伟大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四、余论:“玻恩现象”并不稀奇

笔者曾将玻恩在多个方面遭受科学界不公平对待的现象称为“玻恩现象”^[55]。当笔者在学术会议上谈及或者在著述中尝试揭示并修正被歪曲了的量子力学史时,曾令听众或读者惊讶,甚至引起专家的强烈质疑^[56]。当然,也获得过杨振宁、秦克诚、戴念祖等著名学者的肯定和鼓励^{[13]82}。事实上,“玻恩现象”并不稀奇。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指出:“人类一直活在后真相时代。……事实上,智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地球,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创造并传播虚构故事的独特能力。……只

① 杨振宁先生的博士生、我国台湾物理学会前理事长阎爱德教授曾致函笔者指出:玻恩的《原子物理学》“被认为是经典之作,是我求学时代原子物理、量子力学必读之书”。详见厚宇德:《玻恩如何培育物理英才(下)》,《大学物理》2015年第34卷第10期。

② 笔者在访谈彭堃堦院士、谢常德教授(谢希德物理奖首届获奖者,200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时,两位多次对笔者说:“玻恩的《光学原理》一书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与数学推导时,发现很多情形这本书里已经做了系统的讨论,我们应用中推导出的结论即可解决很多问题。”

③ 朱邦芬院士指出,《晶格动力学理论》是国际上该领域的标准参考文献;冯端院士称这本书为晶格动力学领域的“圣经”。详见厚宇德:《从〈晶格动力学理论〉的诞生看玻恩与黄昆的合作》,《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36卷第1期。

要每个人都相信同样的故事、遵守同样的法律,就能有效地彼此合作。……几千年来,人类社群网络里许多的‘新闻’和‘事实’其实都是虚构的。”^{[57]225}确实是这样,医生的使命是治病救人,按理说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滥竽充数的。然而清代著名中医家王宏翰在编著《古今医史》一书时确立的原则之一是:对于“医庸而名振、胸次一无真学者,不录”^[58]。可见古代的医生中也有名不副实、医庸而名振者。清代另外一位名医徐大椿也说:“今之为名医者,既无学问,又无师授,兼以心术不正,欺世盗名,害人无算。”^[59]再次印证古代无学问的庸医,也有办法被“包装”成名医。如果读者对于玻尔没有投身建立量子力学事业,却被描写成建立量子力学的核心人物这类事实难以接受,那么上述的古代事例对于提高我们这方面的想象力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在后真相时代,科学家与学者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实践正直、严谨、实事求是的精神?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把假新闻视为常态,而该把它看成比原本认为的更严重,我们也该更努力地区分虚构故事与真实的现实。”^{[57]234}“所有人都该负起责任,花些时间和精力找出自己的偏见所在,验证自己的信息来源是否可信。”^{[57]235}

这更应该是在学术上有所追求的科技史工作者必须时刻有意识恪守的基本工作准则。

2025年是玻恩带领海森堡、约当完成矩阵力学理论体系建立100周年,联合国宣布该年是量子科学和技术国际年。谨以此文纪念量子力学的前期探索者、核心建设者、哥廷根物理学派领袖——马克斯·玻恩。

参考文献:

- [1] KLEIN M J. 近代物理学家传记[M]. 欧阳鹤, 金怀诚, 译.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5.
- [2] 赫尔曼. 物理学世界大国的统治者: 从伽利略到海森堡[M]. 朱章才, 译.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2.
- [3] 厚宇德. 哥廷根物理学派及其成功要素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27(11): 98-104.
- [4] 厚宇德. 哥廷根物理学派取得丰硕成果的制度保障[J]. 科学与社会, 2015, 5(4): 12-23.
- [5] 厚宇德. 麦克斯·玻恩: 令人回味的大师[J]. 物理, 2001, 30(1): 47-51.
- [6] 厚宇德. 玻恩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7] 厚宇德. 玻恩与哥廷根物理学派[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17.

- [8] 玻恩. 我的晶格动力学研究回忆[J]. 吴孟, 范柏宜, 译. 科学史译丛, 1989(3/4): 22-26.
- [9] 厚宇德. 玻恩对量子力学的实际贡献初探[J]. 大学物理, 2008, 27(11): 40-49.
- [10] 厚宇德. 玻恩与诺贝尔奖[J]. 大学物理, 2011, 30(1): 48-55.
- [11] 厚宇德. 哪位物理学家首先提出了可观察性原则?[J]. 大学物理, 2016, 35(10): 62-65.
- [12] 卡西第. 海森堡传: 上册[M]. 戈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3] 厚宇德, 马国芳. 玻恩与玻尔: 究竟谁的学派缔造了量子力学?[J]. 科学文化评论, 2015, 12(4): 65-83.
- [14] 厚宇德. 老话重提: 为什么说玻尔与量子力学的建立无关?[J]. 科学文化评论, 2019, 16(3): 71-100.
- [15] 玻尔. 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M]. 郁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91.
- [16] HEILBRON J L. Max Born[J]. Science(New Series), 1979, 204(4394).
- [17] 厚宇德, 邢鸿飞. 玻恩的性格与命运[J]. 科学文化评论, 2013, 10(6): 95.
- [18] 波普尔. 无尽的探索: 卡尔·波普尔自传[M]. 邱仁宗,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102.
- [19] 王福山. 近代物理学史研究: 二[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10.
- [20] 戈革. N. 玻尔学术思想简介[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1, 3(4).
- [21] 戈革. 尼尔斯·玻尔: 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2] 王自华, 桂起权. 海森堡与慕尼黑-哥廷根-哥本哈根三个科学共同体[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3): 9.
- [23] 戈革. 玻尔与原子[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 [24] 彭桓武, 徐锡申. 理论物理基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96-298.
- [25] 派斯. 尼尔斯·玻尔传[M]. 戈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407.
- [26] 克里亚乌斯, 弗朗克福尔特, 弗兰克. 玻尔传[M]. 王玉兰, 李祖扬, 李建珊, 译.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 [27] 卢鹤绂. 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序IV.
- [28] 张家治, 邢润川. 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学派[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144.
- [29] 关洪. 一代神话: 哥本哈根学派[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4-5.
- [30] 布卢姆伯格, 欧文斯. 美国氢弹之父特勒[M]. 北京: 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 1991.
- [31] 王兵. 玻尔: 量子力学领袖[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6.
- [32] 石三宪二. 漫画量子力学[M]. 李梅,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33] BORN M. Physics in my generation[M]. London &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56.

- [34]宋玉升.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讲集:第二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250-259.
- [35]派斯.基本粒子物理学史[M].关洪,杨建邺,王自华,等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326.
- [36]BORN M. My life[M].London:Taylor & Francis Ltd,1978.
- [37]LADENBURG R,WIGNER E.Award of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to Professors Heisenberg,Schroedinger and Dirac[J].The Scientific Monthly,1934,38(1):86-91.
- [38]HEISENBERG W. Max Born zum achtzigsten Geburtstag[J].Die Naturwissenschaften,1962,49:45.
- [39]BORN M.The Born-Einstein letters[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1:Introduction:viii.
- [40]KEMMER N, SCHLAPP R. Max Born(1882-1970)[J].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1971,17:17-52.
- [41]GREENSPAN N.The end of the certain world[M].London:John Wiley & Sons, Ltd.,2005.
- [42]厚宇德,邢鸿飞.玻恩与海森堡关系研究[J].大学物理,2016,35(7):60-65.
- [43]厚宇德.杨振宁与科学技术史研究[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7,38(2):203-213.
- [44]汤川秀树.旅人:一个物理学家的回忆[M].周东林,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66.
- [45]MARTIN J, KLEIN. Max Born on his vocation[J].Science(New Series),1970,169(3943):360.
- [46]玻恩.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M].范岱年,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
- [47]MEHRA J.The Solvay conferences of physics[M].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5:146.
- [48]戈革.史情室文帛[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 [49]罗伯森.玻尔研究所的早年岁月[M].杨福家,卓益忠,曾谨言,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04.
- [50]睦平.哥本哈根学派的创造性人才培养[J].物理通报,2001(2):42-45.
- [51]李尚群.科学探险及其教育意蕴:玻尔研究所如何培养年轻物理学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4):30-33.
- [52]厚宇德.玻恩如何培育物理英才:上[J].大学物理,2015(9):59-65.
- [53]厚宇德.玻恩如何培育物理英才:下[J].大学物理,2015(10):60-65.
- [54]王树军.Gamow对宇宙学的贡献和他的思想[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7:8.
- [55]厚宇德.玻恩的科学贡献与科学思想研究:兼论“玻恩现象”[D].北京:北京科技大学,2010.
- [56]范岱年.戈革如在世,必然会大怒:厚宇德谈戈革文读后[J].科学文化评论,2018,15(2):119-121.
- [57]赫拉利.今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58]王宏翰.古今医史[M].奚飞飞,校注.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4:97.
- [59]徐大椿.医学源流论[M].万芳,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104.

How did the Protagonist Become One of the Supporting Roles?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Cre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by the Born School

Hou Yude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almost all the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quantum mechanics, Bohr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leader and core figur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 However, a lot of evidence shows that quantum mechanics was established in 1925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and exploration led by Born with his students. The occurrence of this kind of error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at almost makes the entire academic world hypnotized is related to th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ir coupling with the social factors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Specifically, Bohr is strong and extroverted; Born is introverted and low-key; Heisenberg is scheming and takes an unscrupulous life style for succes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such a few people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were interconnected, and a false history was naturally born. Under the incorrect historical narrative, Bohr's life was full of glory, and Heisenberg firmly established his scientific status early, while Born was bitter and neglected in his second half of life right after the peak of his career. Even today, the true scientific status of Max Born has not been objectively established.

Keywords: Born; Bohr; history of quantum mechanics; post-truth

论中英庚款退还及其对战时科学家的资助

王 坚, 李瑶瑶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庚子事变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背负了沉重的赔款负担。列强为谋求长期利益,以退还部分赔款为手段,推行文化与经济渗透。20世纪初,美英相继启动庚款退还。退款资金最初用于实业与文教建设,后因全面抗战爆发导致教育与科研体系濒临崩溃,中英庚款董事会迅速调整投资策略,重点资助科学研究,以维系国家学术命脉。通过规范的管理机制与资助实践,中英庚款不仅支持了战时军需、医疗与民生需求的科研突破,同时也为战后科技体系的重建培养了中坚力量。

关键词:中英庚款;退款;科学资助;抗战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2

1937年,卢沟桥事变掀起全面抗战的烽火,中国教育与科研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内地高校南迁,实验室沦为废墟,科学人员在物资匮乏中挣扎。此时的中英庚款资助犹如暗夜中的星光,为流徙各地的科学家照亮了科研之路,支持他们不仅以智慧回应抗战的迫切需求,还为新中国科技腾飞埋下了种子。迄今为止,学界对庚款用途的研究多聚焦于留学领域,深入探讨战时科学家资助的专门论著则相对少见。因此,本文旨在追溯中英庚款退还的背景,剖析其管理机制与资助实践,细述科学家在战时与战后的贡献及其长远影响,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一、庚款退还动因及用途之争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沉重的战争债务。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以“扶清灭洋”为旗号,反对外国传教士及铁路等“洋物”,从而引发列强的干预。八国联军(英、美、法、德、俄、日、意、奥)以保护使馆为名入侵天津、北京,清廷被迫逃往西安。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见图

1),赔款总额4.5亿两白银,竟恰与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相当。这笔“人均一两”的赔款设计,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意味,象征着对中国人民的集体惩罚。为偿还赔款,清廷在加征税赋的同时,还向列强借取高利贷款总计约9.82亿两,债务负担延续至民国以后^[1],不仅掏空了国库,地方财政也因之崩溃,民众苦不堪言,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标志。



图1 十二国代表在《辛丑条约》上签字^[2]

收稿日期:2025-05-18

作者简介:王 坚(1981—),男,山西柳林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史、科技与社会;李瑶瑶(1999—),女,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史。

(一)美英庚款的退还

20世纪初,国际格局的变化为庚款的退还铺平了道路。列强逐渐意识到,过度压榨中国可能引发更大动荡,反不利于各自的长期利益。1904年,美国国会通过退款动议,承认庚款总额过高,并将其用于文化外交。1908年,美国率先退还约1200万美元(占其份额50%),用于资助中国人赴美留学与兴办教育。这一举措既是外交示好,也旨在培养亲美人士,扩大其文化影响力。中美庚款退还的成功,促使其他列强纷纷效仿。

英国的退款决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延迟。19世纪以来,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在中国建立起广泛的经济网络,庚子赔款则进一步巩固了其财政收益。庚子事变时,英国出兵最多,获赔份额也最大(占11.25%),但一战重创英国经济^[3],导致其国力衰退,全球霸权遂受到美国和日本的挑战。在远东,日本自甲午战争崛起后,先吞并朝鲜,又借一战之机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青岛,威胁英国在华贸易利益。战后,英国面临财政压力和地缘竞争,单纯依靠军事和经济压迫已不足以维持霸权地位,遂被迫调整对华政策,寻求软性手段巩固影响力。1930年,《解决中英庚款换文》签订,英方同意将原定于1922年“应付之庚款,全数退还中国政府管理”,并限定其用途为“促进两国相互的利益”^[4]。这一表述暗藏深意:英国意欲通过教育与实业合作,既刺激本国工业出口,又塑造对其友好的中国精英阶层。与美国庚款全用于教育不同,英国退款兼顾实业与文教,体现出其功利性。例如,实业投资多用于购买英国钢材和机械,教育项目也优先资助留学英国,强化文化纽带。所以,庚款退还还可谓英国自鸦片战争后对华战略转型的延续。

(二)庚款用途之争

中英庚款的退还与使用折射出两国关系的复杂博弈。英国虽答应退款,却欲通过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保留话语权,确保资金的流向符合其利益。对中国而言,尽管财政压力暂时得以缓解,但围绕庚款之用途,又在国内引发激烈争论,形成教育兴学派与实业发展派的两极对立。教育派认为,教育是打破传统、吸收先进文化的根本途径,美国退款的成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20世纪20年代,各地教育团体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其中,广东主张“南北平均分配”,认为南方经济发达而北方教育落后,庚款应向北方倾斜;浙江要求按省分配,更多地资助地方大学和中小学;江苏呼吁全民受益,

提出从小学到大学的普及计划;福建建议按人口和教育基础比例分配;北京提议由国立八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分摊,打造高等教育中心;南京主张全面发展教育体系,强调初等教育的重要性。尽管教育派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如各省反对北京的“集中主义”),但总体而言,他们均主张庚款应当优先用于高等教育与科研,培养现代化人才。实业派则认为,交通与工业落后才是国家贫弱之根源,所以应该更多关注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20世纪初期,中国交通设施基础极为薄弱。1927年全国铁路总里程仅1.1万公里,远低于欧美国家(如美国超40万公里),且多为列强掌控的沿海线路。公路更是稀少,全国仅有数千公里且多为土路,物资运输多依赖人力或牲畜,效率低下。所以,实业派主张庚款首先用于铁路和水利等建设,其利息再投教育,实现“路政逐年发展,教育费与年俱增”^[5]。他们认为,缺乏经济支撑的教育是空中楼阁,反驳教育派的主张过于理想化;教育派则指责实业派目光短浅,认为铁路虽能带来短期收益,却无法解决思想落后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教育派强调思想启蒙,实业派看重物质基础。作为庚款退还的决策方,英国始终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最终,在英方主导与中方妥协下,庚款的使用采取了折中方案:一半用于购买实业材料,另一半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直接管理支配,利息收益再用于资助文教事业。这种双重安排既回应了实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为教育保留了发展空间,同时更确保了英方的利益,例如1925—1930年间英国对华出口钢材增长约15%,庚款功不可没。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王树槐所说:“英国庚款虽经教育界争取,但性质与美国庚款不同。退还时正值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建设急需,此款惠及百姓,效用较佳。”^[6]尽管该方案未能完全满足教育界人士的期待,却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经济建设与文化教育的需要,也为后续抗战时期庚款转向科研资助提供了体制基础。

二、管理机制及资助实践

(一)中英庚款董事会与资助制度

中英庚款的实际使用始于制度化管理。1931

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南京成立,标志着庚款从外交协议走向具体实施。根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章程》,董事会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由中英双方人员组成。中方占据主导地位,首任董事长为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副董事长为香港大学副校长贺耐(Wilfred J. Hinton),其他成员还有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教育部次长陈立夫等政府要员^[7]。此外,英国还派驻了包括驻华公使馆参赞和商务专家在内的三名代表。董事会下设教育、财务、技术三个分委员会,分别负责文教项目的规划与评审、支出审计以及实业投资可行性评估事宜。各分委会每年均需向行政院提交报告,以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性。中方的主导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庚款的控制意图,但英国则通过技术委员会保留其影响力。例如,在1932年陇海铁路设备采购中,英国代表力主选用伯明翰产钢轨,占总订单60%。因此,这种中英共管的模式,既是合作,也是博弈。

庚款基金的分配明确区分实业与文教,尽管5%的年息相对较低,却仍为文教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1931年7月,《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将文教投资细化为五类:其一,建设中央图书馆与博物馆;其二,补助高等教育与科研;其三,资助留英学生;其四,奖励教科书与专著编写;其五,建设模范学校^[8]。这些项目旨在提升中国的教育与文化水平,同时服务英国的文化输出战略。抗战前,庚款的文教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校基础设施与设备购置方面。譬如,清华大学曾于1932年利用庚款购置德产光学仪器,建立了物理实验室;中央大学在1933年建成新教学楼;北平协和医学院购置X光设备等。这些关键性投入有效地填补了战前中国高等教育在设施装备等方面的缺口,为之后科研的开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教育与科研皆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北大、清华南迁至昆明,仪器和图书在途中损失大半。上海交通大学主校区遭敌机轰炸,化学实验室变为废墟,科研工作完全停滞。南京中央大学校舍被毁,师生流离失所。到1938年,全国高校数量从1936年的108所锐减至50余所,大部分科研院所与机构被迫停摆,科研人员因之失业,生活无着。高校教师与毕业生就业市场持续恶化,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更对社会的稳定运行构成了实质性威胁。面对这一危机,董事会及时转变资助方向,从硬件建设转向人才支持。

西南联大的简陋教室和重庆的临时实验室中,科学家们以顽强的毅力维系着研究。庚款资助犹如及时雨,成为战时科学的救赎。

(二)战时应对策略与资助实践

1938年8月,中英庚款董事会设立专项科研人员资助计划,颁布《协助科学工作人员办法》,确立分级资助标准,将研究人员月资助金额划分为七个等级(80元至200元,级差20元)^[9]^[52]。这一标准相当于当时大学教师月薪的1.5倍至2倍。该计划共投入165.8万元(法币),收到申请约1600份,经严格评审后最终资助182人,其中包括资深专家、中年骨干和青年新秀三个层次的学术精英^[10]。

为确保资助计划公正合理,董事会特别成立了协助科学工作人员委员会,并聘请傅斯年(人文)、李四光(地质)、燕树棠(法学)、周鲠生(政治)、童冠贤(经济)、陶孟和(社会)等13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组成评审团队^[11]。该委员会在1938年至1944年间持续运作,建立了规范的评审流程,包括审核申请者的学术资历和研究计划、评估其科研潜力与项目价值、确定资助等级和工作地点。受资助者需履行严格的学术义务,按月或季度提交研究进展报告,按年度提交成果报告,并接受定期考核。这种“申请—评审—考核”的全过程管理机制,既保证了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又为受资助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科研环境。

战时资助的实际购买力深受通货膨胀影响。以陪都重庆的粮食价格为参照:1939年7月,160元资助款可购买16.34市石(约400斤)大米,足够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基本生活所需;至1940年末,同等金额仅能购得2.26市石(约50斤)大米,实际购买力下降幅度高达86%,充分反映出战时经济的剧烈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经济环境下,80元至200元的月资助标准仍显著高于当时大学教师的平均薪资水平(60元至100元)。自1941年起,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补充性保障措施,发放每月50斤平价米代金券(折合约30元),这一举措相当于将最高资助标准实际提升至230元,有效缓解了科研人员的生活压力。化学家曹焕文的个案生动展现了该政策的实际效果。作为山西近代工业“母体”——西北实业公司的初创人之一,曹氏在战前已颇具知名度,但在1938年流徙西安期间,他却一度陷入精打细算购买纸张的窘

境——“纸又涨价,先前五张,上月四张,现尚不与三张,今日未购”(曹焕文日记,1938年8月)^[12]。获得200元最高资助后,曹焕文研究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最终完成了《中国火药全史》这一开创性著作。曹氏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申请资助的心路历程(见图2),从“盼眼欲干”的迫切期待(8月22日),到“自信有十分把握”的审慎乐观(10月18日),直至“喜出望外”的最终结果(10月22日)。这些珍贵的记录不仅折射出战时科学家的生存状态,更揭示了科研资助政策对维系学术研究的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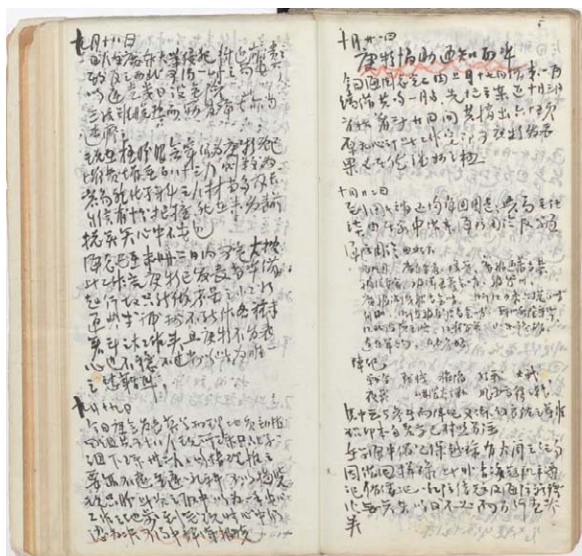


图2 曹焕文日记手稿

该资助计划的实施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交通运输方面,由于日军封锁和战事影响,西南地区的科学家长途跋涉、辗转千里递交申请材料成为常态。一份来自昆明的申请材料需要经过马帮运输、人力挑运等多种方式,耗时长达两个月才能送达重庆的评委会,进而导致评审周期普遍延长3至5个月。资源分配方面,资助名额的稀缺致使竞争异常激烈——获得资助者数量仅占总申请人数的11.4%,其中物理学领域的录取率更低至8.3%。更为严峻的是通胀的持续恶化。1943年后,法币的实际购买力呈现断崖式下跌,200元的最高资助额仅能购买18.7斤大米,不足1939年同等金额购买量的5%。为维持基本生活,多数受资助科学家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如西南联大教授在授课之余摆地摊、撰写科普文章等。针对这些困境,庚款董事会优化了评审机制,包括从1942年起实行“预审—复评”两阶段审核,建立区域代表初审制度,以及对重点研究项目给予额外补贴等。这

些措施虽然无法完全克服战时困难,却能保证核心科研力量的延续。

三、资助成效及长远影响

(一)学科布局与科研成效

中英庚款资助在学科布局上呈现出明确的战时导向特征。受资助人员覆盖10个学科组,其中化学组和社科组各29人(各15.9%)以及农学组20人(11.0%)构成前三大学科领域^{[19]53},这种分布直接回应了抗战的迫切需求。

化学组的资助重点明显向火药研制与药物合成等军工相关领域倾斜。面对战时中国火药原料短缺的困境,曹焕文利用巴蜀井盐副产品提取钾素的创新技术,为军需生产提供了动力。朱任宏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从事中草药化学研究,不仅从野生植物黄藤中提取延胡索乙素开发优良止痛安眠药,而且通过破解新生物碱结构,开发了多种具有镇痛和强心作用的活性成分。张力田专注于淀粉化学研究,194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留美考试,1952年获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学位;于美国联合淀粉精炼公司担任高级化学研究员期间,因在淀粉与淀粉糖领域做出突破性成果,入选美国科学家名人录^[13];回国后,创立《淀粉与淀粉糖》和《淀粉通讯》等学术刊物,推动了食品工业的发展。

农学领域资助体现了“以科技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思维,聚焦粮食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战时的民生与工业需求。鲍履平潜心研究棉花生长规律,为农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孙羲深入探索有机肥改良土壤的机制和作物有机营养理论,科学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汪仲毅专注于害虫防治和昆虫分类研究,有效保障了战时农作物的产量。

物理学领域中,科学家们秉持“科学救国”信念,将前沿理论与战时需要紧密结合,展现了非凡的学术韧性。钱伟长在西南联大潜心研究飞机翼型空气动力学,提出简化计算方法,为战时飞机制造注入理论活力;郭永怀与钱伟长合作研究高速飞行气动阻力问题,为中国早期火箭技术铺设了前路,也间接支撑了导弹与核武器的研制;谢毓章于1938年主导短波通信技术的研发,成功改进军

用无线电设备,显著提升了战场通信效率。

生物与医学领域的资助为战时医疗与防疫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持。童第周随山东大学和中央大学辗转四川万县、重庆等地,在实验设备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依靠简易显微镜继续开展胚胎发育和细胞遗传研究,奠定了中国克隆技术的科学基础,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陈桢于1941年在重庆研究鼠疫传播,提出了利用杀虫剂控制跳蚤的创新方案,成功遏制了四川疫区的疫情扩散,并在西南联大开设医学相关课程,培养了战时急需的生物医学人才;祝维章抗战时期在贵阳医学院提炼中草药内的有效成分,用于疟疾的治疗,有效替代稀缺的进口金鸡纳霜^[14];黄正化专攻毒物微量分析,自德国归国后,在药理学、毒物分析和药品标准制定领域深耕细作,为中国现代药学教育和药品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支撑。这些医学成果挽救了无数生命,为战时后方的稳定构筑了重要保障。

(二)人才培养与长远影响

受资助科学家多为战前已崭露头角的学术人才或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者,他们的成就揭示了中英庚款资助的深远意义。这不仅源于战时的应急措施,更是面向未来的科研人才培养前瞻,其影响从抗战时期的科技支撑延伸至新中国科技体系的建立。

从以下几位科学家的学术历程即能管窥得见科学资助的价值。地质学家苏良赫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很早就对资源勘探与开发在地质学中的基石作用、地质学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有所洞察。1947年,苏氏赴英深造,先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投身地质调查与硅酸盐工业的研究,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农学家徐冠仁是中国核农学领域的先驱,他于1946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留任农学与植物遗传系研究员,积累了辐射诱变育种的宝贵经验。回国后,他参与主持创建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专注于作物遗传育种与核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为核农学学科的开创与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路径。物理学家胡乾善则展现了庚款资助的国际化视野。他早期从事宇宙射线研究,后转向机械振动领域。1934年,胡乾善考取河南省官费留英,进入伦敦大学博克伯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44年,他担任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学术顾

问,积极促成中英间的科学交流,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力学与工程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航天学家李达于20世纪60年代参与了美国“阿波罗计划”,成为杰出华人专家的代表;化学家李景晟被誉为中国有机锡、有机硅和磷腈聚合物研究的开拓者^[15];医学家屠宝琦毕生致力寄生虫医学研究。

这些受资助科学家既弥补了战时的人才损失,还为新中国科技的崛起构筑了坚实根基。他们取得的科学成就宛如一盏盏明灯,映照出庚款资助在战时科研与战后人才储备中的战略价值。

结 语

中英庚款资助在近代中国科学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里,这项资助为科学事业提供了关键支持,维系了学术的持续发展,其价值远超战时的应急举措。它不仅应对了国家危难,更为中国科学的自主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彰显了科学与民族命运的紧密关联。

这项资助的历史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它在战乱中守护了学术的连续性。面对教育与科研体系的崩溃,资助为学者提供了研究条件,防止了知识与人才的断裂,为战后科技复兴保留了根基。其次,它促进了多学科的创新与融合。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困境下,推动了科学与社会需求的结合,涵盖技术研发到社会治理的广泛领域,支撑了国家的生存与稳定。更深远的是,它为中国科学的未来培养了中坚力量。许多受资助的学者在战后成为学术领袖,他们的重建与创新工作,为国家科技体系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资助规模受限于战时通胀,实际作用有限,科学家们仍以坚韧的毅力在逆境中坚持研究,展现了科学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庚款科学资助精神层面的价值超越了物质支持,它是一场关于责任与信念的传承。这项举措揭示了外部资源在危机时刻的独特作用,同时也说明,科学的繁荣最终依赖于自主创新的决心。反思这段历史,追溯中国科学在近代的曲折道路,可从中汲取到宝贵启示:科学是国家强盛的基石,开放合作与自立自强相辅相成。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科学

应以史为鉴,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同时扎根自主研发,勇担推动民族复兴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贾士毅. 民国财政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8:120.
- [2] VON MUMM A.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M]. Berlin: Graphische Gesellschaft, 1902:267.
- [3] WALKER E 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M]. Vol. 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300-305.
- [4] 周琇环. 中英庚款史料汇编:上册[M]. 台北:国史馆, 1992:40-42.
- [5] 吴佩孚. 致道路协会电 力陈庚款筑路兴学之主张[N]. 申报, 1924-08-17(14).
- [6] 王树槐. 庚子赔款[M].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1974:345-349.
- [7] 孟凡明. 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述略[J]. 传承, 2015(6):137-139.
- [8] 中英庚款董事会. 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J]. 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年刊, 1934(6):11-14.
- [9] 韩德溥. 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非常时期科学工作人员[J]. 教与学, 1938, 3(9).
- [10] 中英庚款董事会. 协助科学工作人员拨款二十六万三千元人员审查完毕已发表[N]. 申报, 1938-11-26(8).
- [11] 康兆庆. 抗战时期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 2016:39-40.
- [12] 王坚. 曹焕文科技史研究[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100-105.
- [13] 常青. 师范群英 光耀中华:第二十一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172.
- [14] 国民政府教育部. 奖励祝维章研究治疟特效药[J]. 教育通讯(汉口), 1942, 5(28):4.
- [15] 白春礼.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化学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3:77.

On the Refund of the Anglo-Chinese Boxer Indemnity and Its Support of Scientis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ng Jian, Li Yaoyao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relentless foreign aggression culminated in the Boxer Rebellion, forcing the signing of the Boxer Protocol and imposing a heavy indemnity burden. To secure long-term interests, foreign powers used partial indemnity refunds as a means to advance cultural and economic penetr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initiated indemnity refund programs. The refund was initially allocated to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owev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aused the near-collapse of the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prompting the Anglo-Chinese Indemnity Board to shift focus on suppor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ustain the nation's academic lifeline. Through structured management and funding practices, the Anglo-Chinese indemnity supported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in wartime military, medical, and civilian needs while cultivating key talents for post-war scientific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Anglo-Chinese Boxer Indemnity; refund; support of science; Anti-Japanese War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群体特征计量研究

阿西伍惹^{1,2}

(1.成都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2.四川STEAM科创教育科普基地,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使用SPSS 27.0数理统计软件对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群体的获奖年份、获奖学科、获奖年龄、获奖者学历、获奖时任职机构以及国籍等分布特征进行计量研究,并引入汤川秀树、仁科芳雄、田中耕一、真锅淑郎等科学家的个案研究对统计结果进行深入解读与剖析,从而得出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结论:日本科学家之间具有清晰的师承脉络和学术发展谱系,从中可以窥探日本在21世纪涌现出大量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获奖年龄呈不断上升趋势,意味着开展基础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出身于企业且偏向于应用研究的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并非都取得最高学位(博士学位),因此需根据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与岗位属性提出不同的学历要求;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籍和获奖时任职机构大部分均在日本,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基础科学研究的真实水平。

关键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群体特征;计量研究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3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是一款具有强大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功能的统计分析软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等研究领域。本研究借助SPSS 27.0版本对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群体特征展开计量分析,从相关统计数据中获取关键信息并进行深入解读。

一、获奖年份

20世纪日本共有5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见图1)。其中,汤川秀树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日本历史上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物理学家。之后,20世纪下半叶日本又诞生了4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分别是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朝永振一郎、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以及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利根川进。其中,福井谦一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利根川进则是日本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至此,日本在诺贝尔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理学或医学三大自然科学奖项领域实现了全覆盖,为后来日本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更大突破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引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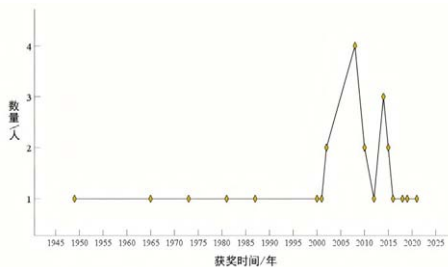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年份及人数分布

收稿日期:2025-05-20

作者简介:阿西伍惹(1993—),男(彝族),四川凉山人,博士,研究方向:物理学史与物理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获得诺贝尔奖的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等科学家与日本“原子物理学之父”——仁科芳雄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坂田昌一作为介子理论提出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主导者之一,认为在汤川秀树所处的“日本的社会环境,很不适合学术的自由发展”,因为日本的科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才传入的,因此具有阻碍学术发展的三大特征:即“舶来文化性”“官僚性”和“军事性”^{[1]151-152}。那么,汤川秀树为什么能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取得介子理论这样的巨大成就?坂田归纳为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相比于其他学科,汤川秀树当时所从事的原子物理学研究领域在日本的“官僚性非常薄弱”^{[1]152}。这是因为1930年前后,“日本原子物理学之父”仁科芳雄从欧洲留学回来后,建立了对后来日本原子物理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民间研究机构——东京理化学研究所(仁科研究室)。由于该机构未设在日本帝国大学内,所以有效地避开了帝国大学所具有的严重的“官僚性”。当时的日本帝国大学“简直像封建时代的城邦一样,彼此间深沟高垒,封闭极严。并且分立派系,帮会式的师徒关系挫伤了青年研究人员的研究积极性”^{[1]152-153}。事实上,日本国内的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同样存在,并成为阻碍法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2]。然而,随着仁科芳雄的归国,其所建立的民间物理学研究机构为有志于原子物理学前沿研究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科研环境,成为日本新兴学科研究的发祥地。

其二,当时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这类日本著名高等学府中的权威教授讲授的还都是传统的物理学知识,量子力学、原子物理等前沿领域的内容并未纳入正规的授业课程中。这些新兴学科在当时的大学里“就像是倍受后娘虐待欺凌的孩子一样,遭受压制”^{[3]215}。在坂田昌一看来,汤川秀树当时所在的京都大学的授课老师们对量子力学都还是“一点都不懂的门外汉”,很难对汤川秀树后来开展的介子理论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指导^{[3]215-216}。仁科芳雄在欧洲留学期间,分别师从或追随卢瑟福、希尔伯特、玻尔、泡利等当时国际著名的科学家。1928年回国后,仁科芳雄将刚刚建立不久的量子力学引入日本,并且于1929年邀请海森堡和狄拉克到日本开展讲座,1937年又邀请玻尔到日本讲学,上述系列

学术讲座有效激发了日本青年对量子力学的研究兴趣。此外,仁科芳雄还在日本开办了量子力学讲习班,在该讲习班听过课的学员就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4]。可以看出,日本能够于20世纪上半叶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率先取得诺贝尔奖突破,与仁科芳雄这位日本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有着密切的关联。

21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罕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井喷”现象。从2000年到2021年短短21年时间内,日本就诞生了20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几乎平均每年就有1人获奖;尤其是在2008年有4人获奖、2014年有3人获奖,2002年、2010年和2015年也分别有2人获奖。在日本2001年实施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诺贝尔奖获奖人数达到30人。”^[5]从2001年至今,日本在还不到一半的时段内就完成了“诺贝尔奖计划”获奖目标人数的63.33%。日本能够在进入21世纪以后实现诺贝尔奖的“井喷”,与日本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社会需求和时代背景制定出相应的科技政策与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于“经济振兴”的目的,提出了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导的战略方针,从而在70年代实现经济腾飞并“催生”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奖成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通过出台“创造科学推进事业”计划和《科学技术基本法》,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

日本的科技发展实践对“坚持认为科学是自发的、不由自主的,因而是不能被计划”^{[6]10}的观点予以否定的回答。不过,并非所有的科技政策都能对科学研究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卡皮查认为制订科学计划必须要遵守一个原则:“它们应该以鼓励科学家去创造,而不能以限制科学家的创造自由为目标。”^{[6]10}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在20世纪下半叶出台并推行的一系列科学计划为当时的日本科学家提供了有利于开展创造性研究的条件,从而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为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的日本诺贝尔奖“井喷”现象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二、获奖学科

统计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的获奖人数分布情况及其比例可以得到图2。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人数最多,为12人,占全体获奖人数的48.00%;诺贝尔化学奖获奖人数也较多,共8人,占全体获奖人数的32.00%;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获奖人数最少,为5人,占全体获奖人数的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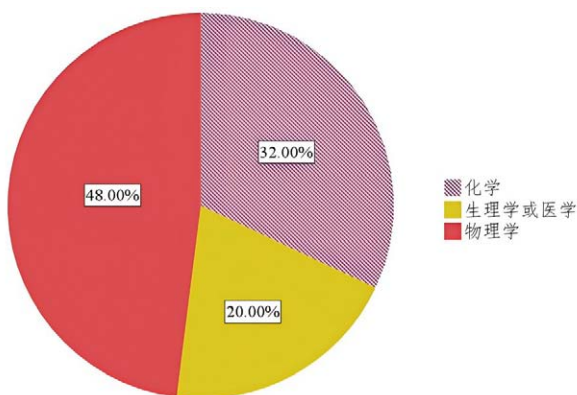


图2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学科比例

为了进一步分析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学科分布是否具有其特殊性,对截至2023年全球共授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643位科学家进行统计,其中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奖项的获奖人数分别为224人、192人、227人,依次占获奖总人数的34.84%、29.86%、35.30%(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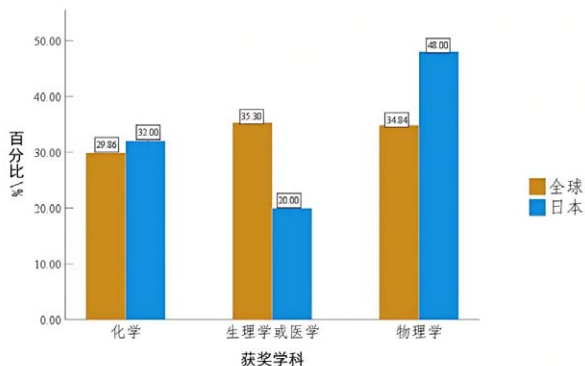


图3 全球及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学科比例对比

通过对比日本与全球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学科分布特征可以发现,全球获得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的人数较为平均,而日本获奖人数分布则表现出明显的学科差异,尤其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人数比例(48.00%)远高于全球比例

(34.84%)。造成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学科分布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日本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对日本青年投身物理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对日本物理学发展与学科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杨振宁所说:“他(指汤川)激发了日本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年轻的物理学者对于物理进军的热忱。”^[7]南部阳一郎、江崎玲于奈、赤崎勇等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均表示汤川秀树对他们进军物理学产生过极大的激励和指引作用。可见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率先培养出一位开拓性的杰出科学人物,对后续以点带面推动整个领域的全面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相比于生理学或医学奖,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奖比例亦高于全球平均比例,这与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化学工业有关。当时的日本出于经济恢复的迫切需要,以“经济振兴”为中心确立了优先发展应用研究的科学政策。此后,日本开始大力推动化学工业的发展,化学工业的高度发达促进了石油化学、高分子化学以及生物化学等领域的研究,为日本化学基础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8]。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对日本化学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福井谦一即明确表示汤川秀树及其著作对其后来提出“前线轨道理论”并荣膺诺贝尔奖起到过十分重要的影响^[9]。

三、获奖年龄

统计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获奖年龄分布情况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时年龄最小者为42岁,年龄最大者为90岁,两者相差高达48岁。其中,获奖时年龄最小的是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而获奖时年龄最大者则为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真锅淑郎,他也是日本第25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基于统计可以发现,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获奖年龄主要集中在56—76岁,中位数为64岁。然而,他们平均在40岁左右就取得了其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以下简称获奖成果),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家从取得获奖成果到被授予诺贝尔奖之间往往具有十分漫长的时间间隔,体现了基础科学研究长期坚持坐“冷板凳”的必要性。

此外,由于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获奖年代分布差异极大,在整个20世纪获奖人数仅有5人,在进入21世纪的短短20余年却诞生了20位诺奖得主,因此按相同时间间隔(如10年或20年)划分年代并不能对他们的获奖年龄及变化趋势进行有效且合理的统计分析。鉴于此,本研究将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按1900—1999、2000—2010以及2011—2021三个时间段对他们的获奖年龄展开统计(见表1),以期能够更好地呈现其获奖年龄随时代的变化趋势。

尽管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不愿使诺贝尔奖金成为“养老金”^{[10]298},但是通过表1可以看出,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获奖年龄随时间推移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他们的平均获奖年龄从20世纪的52岁增长到21世纪的70岁左右。不仅如此,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的最大获奖年龄以及最小获奖年龄也呈现出同步增长趋势。其中,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南部阳一郎以及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真锅淑郎,他们分别在87岁和90岁高龄时才被授予诺贝尔奖,但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取得了获奖成果,获奖时滞竟长达近半个世纪。可见,科学家即使在年轻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科学贡献,但往往需要等到高龄之际才能获此殊荣。朱克曼认为,如果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时间被拖延过久,则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怨恨,乃至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对获奖本身产生矛盾心情^{[10]295}。不过,这也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相较于其他研究领域,更加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杨振宁教授即认为“科研耐力”是科学家取得成功的三个重要因素之一^[11]。

四、学历结构

在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24人取得了博士学位,占获奖总人数的96%。可见,20世纪以来高学历已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准入门

槛,不过这并非意味着科学家的重要科研成果都是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才完成的。例如,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3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而他的获奖成果却早在1934年就已完成。与之类似,吉野彰、中村修二和江崎玲于奈也是在取得获奖成果以后才被授予博士学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三位科学家均是在日本企业完成的获奖成果且偏向于应用研究。此外,田中耕一的获奖成果也是在日本企业取得的,不过其特殊之处在于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他后来在诺贝尔奖纪念讲演中说道:“我的成功证明,没有高度专业知识和学历也能为化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12]身份、经历与田中耕一相类似的中村修二也认为:“不需要艰深的理论、显赫的学历,这些东西,有时候反而成为阻碍。”^[13]可见,取得最高学位(博士学位)固然是当今科研人员所应具备的重要条件,但不能过分强调“唯学历论”,更不能“唯头衔论”。

五、国籍及获奖时任职机构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归属问题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衡量:其一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其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时的任职机构所在国家^[14]。对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籍分布及获奖时任职机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日本诺贝尔奖获奖群体的“国家归属”信息。

(一)国籍分布

对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籍分布进行统计发现,22人(占88.00%)为日本国籍;只有3人(占12.00%)是美国国籍,分别为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南部阳一郎、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真锅淑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人的求学经历以及部分获奖成果均是在日

表1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获奖年代及获奖年龄统计

获奖年代/年	获奖人数/人	平均获奖年龄/岁	最大获奖年龄/岁	最小获奖年龄/岁
1900—1999	5	52.00	63.00	42.00
2000—2010	10	70.00	87.00	43.00
2011—2021	10	69.30	90.00	50.00

本国内取得的,他们后来去往美国并加入美国籍则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们被当时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实验条件所吸引。例如,被称为“现代气候模式之父”“超级计算机使用最频繁的人”的真锅淑郎正是借助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契机才在20世纪60年代领导建立了地球气候的物理模型,成为首位探索辐射平衡和气团垂直输送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家^[15]。另一方面,是对当时日本国内科研体制与研究环境的不满,如中村修二。可见,在全球科技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的21世纪,为研究人员提供先进的科研平台以及适宜的科研环境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任职机构分布

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时的任职机构往往会被媒体予以更大力度的宣传,从而形成更为广泛且深远的社会影响力。鉴于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部分科学家获奖时任职于多家科研机构,每个机构对应获奖人数分别按1人计。此外,同一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如筑波大学),按最新的机构名称进行统计(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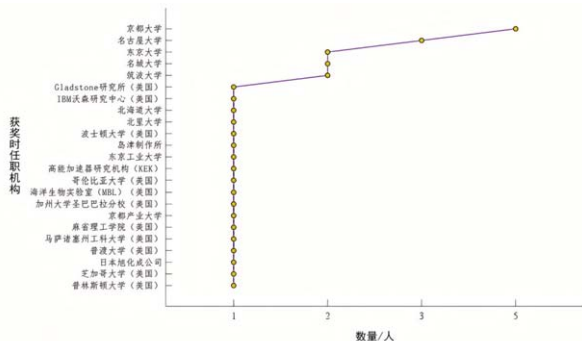


图4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获奖时任职机构分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获奖时任职的机构主要集中于日本国内的著名大学,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京都大学(5人)、名古屋大学(3人)、东京大学(2人)、名城大学(2人)、筑波大学(2人),获奖时在以上五所大学任职的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占获奖总人数的43.75%。此外,34.38%的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获奖时任职于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二战结束后日本与美国保持着更为紧密的科学交流与合作,同时也揭示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不少日本科学家二战后逐渐向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美国转移的事实。

六、总结与启示

(一)基于获奖年份和获奖学科的统计分析

早期仁科芳雄跟随西方物理大师学成归国后在日本国内掀起了研究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学的热潮,并影响了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等日本最早的一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成为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后,进一步激励了南部阳一郎、江崎玲于奈、赤崎勇等科学家进军物理学研究领域,从而使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占到了获奖总人数的半壁江山(48.00%)。从仁科芳雄到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再到南部阳一郎,能看到日本物理学家清晰的“师承”脉络,这种学术谱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后来日本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井喷”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基于获奖年龄的统计分析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群体的平均获奖年龄、最大获奖年龄以及最小获奖年龄都呈逐年上升趋势,大部分科学家在中年时期(平均40岁左右)就取得了他们的获奖成果,但是往往要熬到晚年(平均66岁)才会被授予诺贝尔奖,甚至部分科学家(如真锅淑郎)要到90岁高龄,即在取得获奖成果近半个世纪以后才获奖,充分说明现代科学研究已越来越需要时间的积淀与“考验”。不过,这也可能进一步导致朱克曼所提出的“第四十一席占有者”(即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但是却未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占据的比例愈来愈高,因为部分高龄科学家并不一定能“熬”到获奖之时。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会新增诺奖候选人,从而使早期取得重要科研成果的“老科学家”获奖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

(三)基于学历结构的统计分析

25位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的绝大多数(24位)均获得了博士学位,可见20世纪以来获得高学历已逐渐成为进入科研的基本门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像吉野彰、中村修二和江崎玲于奈这样出身于企业且偏向于应用研究的科学家,其获奖成果却都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前取得的,尤其是同样出身于企业的研发人员田中耕一更是唯一一位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上述案例充分表明,应根据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如理论研究或应用研究)

和岗位属性提出不同的学历要求,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四)基于国籍与获奖时任职机构的统计分析

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群体中88.00%的科学家具有日本国籍,62.5%的科学家获奖时的任职机构为日本国内的高校或企业。这两项数据充分表明,大部分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国家归属”属于日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井喷”现象并非只是表象,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真实地展现日本国内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与科技实力,这也是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群体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借鉴其成功经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坂田昌一.坂田昌一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M].张质贤,谷耀清,黄友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 [2]厚宇德,王盼.阻碍法国科学发展的学界陋习例证[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34(3):38-43.
- [3]坂田昌一.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M].安度,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 [4]胡化凯.20世纪中国理论物理学发展缓慢的原因[J].科学文化评论,2017,14(2):5-16.
- [5]苏楠,陈志,王宏广.“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启示与借鉴:中日比较的视角[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8,33(10):55-64.
- [6]厚宇德,林书羽.卡皮查论大科技时代的科技政策与管理[J].科学文化评论,2024,21(2).
- [7]杨振宁.杨振宁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25.
- [8]节艳丽.对日本战后基础研究发展与诺贝尔科学奖获得的历史考察[D].北京:清华大学,2004.
- [9]福井谦一.学问的创造[M].那日苏,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15-120.
- [10]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M].周叶谦,冯世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1]厚宇德.战略科学家的有效培养方法:以分析杰出战略科学家个人品质及学术道路为基础[J].科技导报,2022,40(16):27-37.
- [12]韦佳.田中耕一其人其事[J].日本学刊,2003(2):155.
- [13]中村修二.我生命里的光[M].安素,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17.
- [14]孙玉涛,国容毓.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与科学家跨国迁移: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为例[J].科学学研究,2018,36(7):1161-1169.
- [15]《科学》编辑部.2021年度诺贝尔奖(科学类)获得者[J].科学,2021,73(6):63.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Nobel Laureates in Natural Sciences

Axi Wure^{1,2}

(1.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ichuan STEAM Science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Base,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e SPSS 27.0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conduct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25 Japanese Nobel laureates in natural sciences, including the year of award, the discipline of award, the age of award,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laureates, the institutions they worked for at the time of award, and their nationalities. The case studies of the scientists such as Hideki Yukawa, Yoshio Inoko, Koichi Tanaka and Sukuro Manabe were introduced to conduct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ereby dra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with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 clear lineage of mentorship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exists among Japanese scientists, offering insight into why Japan has produced so many Nobel laureates in natural scie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ge at which these laureates received their award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signifying that perseverance and scientific dedication are increasingly vital for success in fundamental research. Notably, among them, those who came from industry and focused on applied research do not all hold the highest academic degree (a doctorate);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set different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based on a researcher's specific field and post. Furthermor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laureates were Japanese nationals affiliated with Japanese institutions at the time of their award, which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ctual strength of Japan's fundamental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Japan; Nobel Prize in natural sciences; group characteristics; quantitative research

“越变至鲁”：试析宋代台州的世居士人及其家族

路遇明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0)

摘要:北宋前中期,台州士人数量寥寥可数。宋室南渡后,因地近行都临安,台州士人群体迅速崛起,延至南宋中叶,当地已是儒风浸盛,堪称“多士之邦”。侨居士人与世居士人共同推动了宋代台州地方士族的壮大,其中世居士人的数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两宋之际的“临海二陈”之后,越来越多的台籍士人开始在朝堂之上崭露头角,并热心参与台州地方事务,建立起地方士人的交游网络。以《黄岩大家录》为代表的地方性著述显示,南宋台州土著中的业儒士人和科举中第者的数量,皆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从而成为台州士人群体壮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台州;宋代;世居士人;士族;科举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4

宋代作为新型士人阶层形成的关键时期,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往往以士人家族的形态呈现。与中古时期士族单纯凭借门第来获取社会特权有所不同,宋代士族大姓为维持其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地位,通常依赖于科举功名的不断成功。正因如此,宋代以降,科举中第的人数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家族兴盛与否的重要标志,对于宋代出现的一些世代登科、簪笏满床的科举世家,著名者如河南吕氏、三槐王氏、四明史氏等,学界通常称其为“新门阀”^[1]。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生产力的提升,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有精力从事于儒业,士人仅仅通过各类科举考试便可跻身士大夫行列。王昌伟的研究指出:“士人群体中地方身份认同的建立,常常与该群体成员在国家层面上获取的成就密不可分。”^[2]实际上,两宋时期地方士人的科举事业恰恰是其“国家层面成就”的一切基础来源。目前,学界围绕宋代士人群体已有不少探讨,以士人阶层为中心的研究俨然成为宋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的一大支柱。宋燕鹏由此强调宋代逐渐形成了以具有自我认同的士人阶

层为中心的“士人社会”,并认为这是明清“士绅社会”的前身^[3]。总而言之,对地方士人及其家族的研究,早已成为学界考察宋代不同地域社会面貌的重要切入口。

台州自宋初以来,除众多政治家族外,数百年间还产生了如临海陈氏、黄岩杜氏、黄岩车氏等不少学术家族,李同乐的研究旨在说明这些家族构成了宋代台州地域学术的主要内容^[4]。伊原弘则通过对宋代台州部分科举官僚家族的梳理,从而去探讨此类人群在地域社会中的自主性,并进一步考量了作为地域社会的台州在宋代专制国家统治中的自我认知^[5]。此外,文学造诣突出的黄岩戴氏家族也常常成为文史学者关注的对象,目前学界对其家族成员的世系传承、文学著述和交游网络等多个方面都有涉猎^[6]。同时,又有学者结合台州近代以来新发现的石刻史料,进一步深入研究台州地方社会。森田宪司即根据临海出土的墓志资料,分析了这些墓志书写的特征,并结合传世史籍保留下的墓志内容,尝试对临海境内的宋代士人家族进行复原,包括了临海土著鹿氏家族、应氏

收稿日期:2025-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御容崇拜与宋代皇权政治研究”(23BZS047);金华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南宋能臣马光祖年谱”(24WH03Y)

作者简介:路遇明(1997—),男,甘肃平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区域史。

家族,以及侨居的谷城王氏家族等,文章最终提出了通过特定地域内的墓志碑刻进一步研究地域社会的可能性^[7-8]。

更多的研究则来自地方文化演变的视角。李建军的文章厘清了自北宋建立以来的三百年间,台州从边缘区域到中心区域的文化演进过程^[9]。这其中以“临海二徐”为代表的地方士人对台州的文化发展贡献颇多^[10]。当然,也离不开台州兴盛的私人藏书对当地文化的助益^[11]。上述既有研究对于本文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聚焦于两宋之际的台州世居士人和家族,考察其在两宋之际大批南迁的侨居士人影响下,如何一步步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并在新的地缘格局下实现科举成就的大飞跃。本文所谓地方士人和家族,具体包括了台州各县邑中的业儒士人、闲居官(以上两者即世居士人)和寓居士大夫(即侨居士人)。他们之间重要的共同点是:熟稔儒家经典,生平以道德文章自命,并试图或已经借此取得科举功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南宋台州科举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世居与侨居士人的共同努力,过去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强调作为移民群体的侨居士族,而往往忽略了世居士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①。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台州世居士族的相关史实,引起学界对不同地方士人复杂角色的重视。

一、罗适与早期台州地方士人的基本面貌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纳土归宋,台州入宋版图。此后百余年间,作为边鄙小郡的台州真正走出的科举人才乏善可陈,自然更谈不上有多少士人家族。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直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杜垂象考中进士,台州才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科举中第者。延至北宋末年,台州历届科考中举人数也仅有三四人,有时一届甚至无中榜者,总之规模极其有限。至南宋末年一科则多至一二十人不止。近藤一成的研究指出,浙东沿海地区各州府进士数目的迅速增加是在光宗、宁宗朝之后,这也是该区域内士人社会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成熟的体现^[12]。至南宋末年,台州进士中举的总人数排名在两浙地区已仅次于温、明、处三州。为了更加客观地呈现两宋时期台州科举成就

的增长之快,笔者以《宋代登科总录》提供的两浙路数据为例,统计了从北宋到南宋科举中举人数增长率最高的四个州府,依次是温州/瑞安府1255%、台州892%、婺州596%、明州/庆元府487%,可见其前后相差甚远^[13]。

当然,台州儒风浸盛的局面并非瞬变,而是历经两宋三百年历史的渐次发展。此外,北宋时期台州进士中举者多以诗名为世所知,鲜有因儒业成就而闻名者。与北宋时大多数南方地区的士人一样,其成名者又多活跃于京城开封及其周边,或是寓居于作为区域中心的杭州等地,如临海杨蟠、朱玠、陈克,宁海周弁,黄岩左纬、求仲弓,仙居蒋旦皆是如此。北宋宁海县著名士人罗适“以释为师”的艰难求学,更是证明了儒学之风在靖康南渡之前的台州影响有限。

宁海县地狭山众,风俗粗野,一度属台州五个县域中发展最为滞后的地区。宋末元初宁海诗人舒岳祥曾感慨盛世与人才之关系,并谈及宁海县在北宋的开发历史,其云:

宋东都人材之盛,自庆历至于元祐极矣。于时吾宁海至为僻陋,前未有闻也,惟赤城罗公适正之特起于荜门圭窦之中,与上国名都英俊争衡,鼎鼎如也。既略见于功而形之于词章者,亦雅正丰融。悬车早退,高风凜然。

南渡人材之盛,莫若乾道、淳熙。于时吾邑人士未盛也,而云壑王公先生首以材选,剖符持节,官至九卿。乞身高蹈,以诗文自娱,不求工而自工,大略似赤城先生也。^{[14]128}

僻陋一隅的宁海县在北宋庆历以前不闻于世,庆历、元祐间正当北宋人物盛世,宁海人罗适应运而生,人称“赤城先生”。南宋之时,人才之盛莫过于孝宗乾、淳年间,舒岳祥又赞誉同乡“云壑先生”王齐舆与罗适大略相似,钟情于诗词歌赋,徘徊于庙堂之间,开宁海一带风气之先。可见舒岳祥对罗适这位乡里先贤推崇备至,但罗适在北宋时期的台州所扮演的真实角色,恐与舒氏所云存有一定偏差。

罗适(1029—1101),字正之,治平三年(1066)进士,撰有《赤城集》十卷,今已不存。秦观盛赞其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县令任内的政绩云:“学术有本末,通于世务,风节凜然,国士也。”^[15]陈耆卿

^① 综论性质的相关研究参见魏峰《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关于宋代台州的侨居士人笔者将另有撰文说明。

说：“州言前辈大雅，以适为称首。”^{[16]7530} 后世遂多认为“台士有闻于世，自适始”^{[17]507}。实际上，人才之兴盛需要时机和积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北宋时台州地处偏远，难有名人，上述诸人所论不排除后世过誉之嫌。但无论如何，宁海人罗适都是当时为数不多前往京城任职，并与名公钜卿多有往来的台州士人，陈振孙便曾提到罗适“颇为苏子瞻（轼）、刘贡父（攽）诸公所知”^{[14]507}。

同时，罗适身上表现出的“学无专师”，也是台州这一时期多数士人所共有的时代特征。罗适初随当地乡先生朱绛求学，只因庆历兴学之际，台州学尚无能力延请教官。于是罗适选择负笈他乡，北上就学于四明地区（今宁波）“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楼氏任明州教授多年，是时舒亶、袁毂和罗适皆投其席下，三人又同时中举，“实为一时之盛”^{[18]1344}。罗适对楼郁极尽师礼，尊崇备至，南宋时明州人楼钥曾追述先祖事迹云：“（楼郁）成就一时人物甚众，丰尚书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袁知府穀等皆其门人，又罗提刑适自天台来学。诸公学业既成，舒公试乡里，袁公试开封，罗公试台州，一举三处皆魁选。其亡也，舒公为墓铭，丰公书丹，袁公篆额。罗公以仕北方不得预，后为浙东提刑，拜墓下，用阙里故事，手植数木，今有存者。祭文见《赤城先生集》中。”^{[18]1168} 楼氏对罗适与明州之渊源已交代甚明。

此外，罗适在所撰《永乐教院记》一文中，对其早年求学经历有段较为详尽的自述：

余童年时，好读书，而乡中无文籍。惟乡先生朱叟绛世传《论语》《毛诗》，皆无注解。余手写读之，茫然不知义旨之罅隙，唯永叹而已。庆历中有僧智贤师、禹昭师，皆里释之秀者，同游钱塘，传智者教，以余力事明静大师。惟贤通儒书，能讲五经、《论语》。二师性明敏，志坚而气刚，各以儒、释二家自负，不少下人。余因得与二师游，假其书，叩其论议，日浸淫开发，闻此达彼，由是知圣贤之门墙，有可入者。遂寻师访友，以终所业。余知经术之为乐，权舆于二师也。^{[16]7508}

缺少书籍和解经之讲师是罗适当年读书之时最大的困境，即使如乡先生朱绛所传，亦不过是无注解的《论语》《毛诗》等白文本经书，期间更无倾心经术的同道之人。以至于罗适只能以释僧为师，随其游学，相互发明议论，学问始有长进。这当然也与唐人山林寺院求学之遗风有关^[19]。

北宋时临海士人徐中行在京城得传胡瑗之

学，返乡后同样是“馆于梵舍，熟读精思”^{[20]173}，亦可见北宋台州科举教育之落后。文末罗适发出疑问：“自余登第三纪矣，乡曲少年，无登第者，亦无僧以儒、释学自负如二师者，然则山川秀气，岂绝于吾党也？”^{[16]7508} 其实，罗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文中提及自己早年求学之艰，也是想以此激励乡里后学，“发愤自奋，或儒或释，扬名天下者矣”^{[16]7508}，这恰恰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台州科举事业的窘境。

舒亶所撰墓志铭中提到罗适的治学，云：“公好古强学，虽老不废书。当嘉祐、治平间，学者方事声律，而公已能用意经传。然颇独嗜《易》，其所为注解，合其他歌诗、章疏、碑碣、杂文，仅百卷。雅喜藏书，凡遗文古事，与夫国朝新书，家多有之。”^{[21]11021} 可见罗适之后，其家中藏书蔚为可观，但其对台州的影响似不宜高估。其一，是其“晚岁，奉佛尤严”，并未见有记载提及他对地方教育事业的重视；其二，舒亶指出罗适“虽世居宁海，而姻旧多在明，且爱其湖山可乐，去坟墓为不远，遂家焉”^{[21]11021}。罗适晚年致仕后，因姻亲故旧多在毗邻家乡的明州，故最终徙居于他乡。明州人舒亶甚至称与其同里，可见罗适在世时对台州的影响便愈加有限。

二、人才蔚起：两宋之际的台州世居士族与科举成就

科举家族具有集聚性，名门望族多与科举联系密切，学界既有研究证明宋代家族的兴衰与其科举成就的取得息息相关。简言之，科举之成败对家族的盛衰具有决定性意义。大约与罗适所处的时代相当，临海方氏成为台州第一个科举世家。据方氏后嗣的墓志铭追述，其祖先自五代以来便世居台州，“子孙滋衍，然业儒多举进士”^{[22]355}。早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时，临海方氏的家族成员——方琮^①便已考中进士。《嘉定赤城志》载方琮“临海人，终安仁县令”^{[16]7530}，《方文林墓志铭》不书墓主临海人方从礼（1071—1116）祖父之讳，但称其官至“饶州安仁县令，累赠金紫光禄大夫”^{[22]355}，

^① 《嘉定赤城志》此处避宋讳写作“孝庙旧讳”，四库本作“方瑗”，然历代台州府县志中多称“方琮”。按：宋孝宗曾先后改名为赵伯琮、赵瑗、赵玮和赵昀等，莫衷一是。四库馆臣或是据旧名推定，而府县志多有族谱家乘可据，故暂作“方琮”。

故方从礼之祖必是皇祐五年进士方琮无疑。南宋台州进士数量未激增之前,台州有限的中第士人群体,多呈现家族式的特征,往往是几个主要家族间父子兄弟相继蝉联,这也从侧面说明此时进士举业在台州的影响不广。治平四年(1067)至元祐六年(1091)间,方琮之子方洵武、方洵直和方昌武先后中举,“时号‘三方’”,故而《嘉定赤城志》称方琮进士及第后,“方为世儒自此始”^{[16]7530}。

临海方氏所取得的科举成就,离不开众多家族成员的苦心经营。方从礼的父亲方洵武以朝奉大夫终知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有政事才,善论议,知名士大夫间,卒赠朝奉大夫”^{[22]355}。方从礼虽是凭父荫入仕,但仍孜孜于经营其家,以支持诸弟从事举业。又“常告其弟曰:‘我所以不惮粗剧,政恐若等废学也,勉之。’故其弟试可、行可皆自励,相继贡于乡,而以学行见称于师友云”^{[22]356}。建炎二年(1128),方行可得以科举中第。正是方氏家族内部在继承恩荫与投身举业之间的合理分配,才成功保证了其科举家族地位的延续。

北宋台州士族虽数量有限,但为了进一步延续其家族传统,不同士人家族之间多有相互联姻者。方从礼的前室陈氏,即同郡陈贻序(字叔伦)之女。陈贻序来自北宋时临海另一成功的科举家族。“陈氏世儒家,五季时自金华来居县西之松里。族大以蕃,衣冠相继。”^[23]治平年间,陈贻序与兄长陈贻范(字伯模)相继考中进士,并与苏轼、曾巩等人相往来,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临海陈氏好聚书,建有当时台州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庆善楼。《宋史·艺文志》有载《颍川庆善楼家藏书目》二卷,其所居松里亦改名庆善里。陈贻范曾就学于北宋中叶的名儒胡瑗和陈襄门下,工诗文,有《庆善集》,惜已不存。陈氏后嗣又有如两宋之交知名词人陈克等,世代宦族,藏书不辍。宋亡后,其裔孙陈孚还曾进一步扩建藏书楼规模,取名“万卷楼”。

历史上,另一临海陈氏家族同样凭借科举功名起家。政和三年(1113),陈公辅(1077—1142)以太学上舍两优,释褐第一中高第,官至礼部侍郎,成为台州以高科闻名且位至侍从官的第一人。其人性情耿直,“论事剀切,疾恶如仇”^{[24]11695},南渡后担任台谏官,建言颇多。绍兴年间因与执政者不和而多次请祠,后居于临海城中,并与寓居于此的众多大臣士族产生交集,期间诗词唱和,相从甚欢。

陈公辅子孙辈中多有中举者,以《嘉定赤城志》所载理宗之前为例,其子陈夷行绍兴二年(1132)中举,绍兴十八年、二十一年时其孙辈中陈举善和陈嘉善分别中举,乾道八年(1172)和开禧元年(1205)时其曾孙辈陈铸、陈镛先后中举。科举功名是其家族维持士族身份最直接的支撑,也成为临海陈氏作为台州盛族的重要标识。

此外,尚有临海陈良翰(1108—1172)与陈公辅出身相似。两人虽同为临海陈氏,但本源却非一家,只因陈良翰成名后主动“与侍郎公辅通谱”^{[16]7532}。朱熹在为陈良翰撰写行状时,称后者为陈良翰之“族父”,实则临海二陈最初并不同系。《行状》又云陈良翰早年间谈吐不凡,陈公辅“闻而赏之曰:‘子少年而议论及此,异日立朝,当必有可观者。愿子自爱。’至是卒如其言”^{[25]4535}。陈良翰立朝议论耿直,不附近佞,“质直好义,气和而守正”^[26],故《嘉定赤城志》并称临海二陈“风节实相继”,其言甚确。

陈良翰早孤,“游乡校,以谨厚庄重为人所称,读书务通大指,为文恢博有气”^{[21]4526}。绍兴五年(1135),陈良翰与其侄陈燿同时中举,后官至兵部侍郎、右谏议大夫、太子詹事,除敷文阁直学士。其后嗣之中多有以恩荫入仕者,但同样不乏中举之人,如其子陈广寿乾道八年中举,其孙陈奇之庆元二年中举。刘宰称之为“台望族”^[27],其孙陈咏之虽以恩荫入仕,但不坠家学,包恢为其撰墓铭云:“世固有负才气者矣,而不知学问者多也,况世家积累贵富之后乎?公自少不徒世其官,而能世其美,志趣高尚,嗜学好修,曾不移于贵富之习。”^[28]

上述罗适、陈贻序、陈公辅和陈良翰几人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便是,他们在两宋之际都曾作为家族中第一代读书业儒的士人,并且得以高中进士。特别是“临海二陈”在获得科举成功后,又积极经营,重视家族成员间儒学教育的传承,这也成为维持其家族地位在南宋长久不衰的持续动力。其实以上几人不仅仅是其家族的科举榜样,他们奖掖后进,同时也带动了台州在南宋一百多年间尚儒之风的兴盛,成为台州所有学子的精神榜样。南宋孝宗淳熙初年,尤袤出任台州知州,因罗适、陈公辅和陈良翰三人“皆乡之名德,后进尊慕者也”^{[16]7310},台州士子“仰其大节,俯其细行,无不皆可师也”^{[29]193},遂首建“三老堂”以祠之,这也是台州诸学之中祭祀地方乡贤之始。是时理学尚未形成气候,对官学之意识形态影响不深,以至于陈公

辅“不右程公,学术若少异”^{[29]193},反而能够名列其中。

三、从《黄岩大家录》附诗看 南宋台州地方士族的兴盛

不论是宁海罗适,还是临海二陈,都只是台州土著士人群体和家族兴盛壮大的开始。南宋一百五十年间,台州成千上万的士子投身科考事业,虽然最终取得进士功名者仍不过九牛一毛,但也因此彻底扭转了台州的地域形象。南宋中叶伊始,台州社会风气已迥然不同于前代。理宗淳祐初年,台州知州包恢便称台州士人中举者“至本朝天圣以后,历几年,更几科,然后以渐加多。中兴以来以迄于今,则盛矣”^{[20]73}。而这其中尤以黄岩县最具代表性。

宋代黄岩县占据着几乎所有的温黄平原,在台州属县之中辖境最广、人口最多,是南宋“四十大邑”之一^[30]。嘉定十二年(1219),叶适在写给弟子夏庭简的墓铭中云:“黄岩,浙河东大邑,赋当其州太半,鱼稻之饶被邻境。喜让善施,温克多异材。然自隋、唐设进士诸科,而其地寂寥湮没,无以名称者。宋兴且百年始一见,又百年始再见。又或始二人,或越数举,积而至于君,然后始赢十人。”^{[29]442}叶适既说明了黄岩的自然地理特征,也点明了两宋之间黄岩科举人数的突飞猛进。咸平三年(1000),黄岩杜垂象首中进士,此后黄岩士子中举者寂寂无闻,延至绍兴十八年(1148)后,始有王滋等人中第,此后黄岩成为台州五邑之中进士人数增长最快者。这主要是因为临海县等地在南宋中期人口便已趋于饱和,而开发空间更大的黄岩县则逐渐后来者居上。郝若贝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南宋后期以来,各地的人口和精英家族分布的重心逐渐从“core”的县转移到“periphery”的县^[31]。

随着北宋后期以来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依靠良好的水热条件,温黄平原的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于是黄岩当地形成众多豪强富室。北宋之时,此地富室之家鲜有问津儒学事业者,而多馨香祷祝之举。靖康南渡以来,台州逐渐确立起儒学业举的传统,当地富室之家也多有脱产从事科举事业者,他们中的多数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跻身于士族之列,成为台州世居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士人群体。

直至宋末元初,黄宏^①有感于宋末黄岩士族之盛,撰成《黄岩大家录》,该书今已散佚,但书中所附绝句一首得以流传于世。该诗以高度凝练的方式总括了宋代黄岩各个士族之分布。诗曰:“宋室传来十八家,左陈柔极派来赊。潘林於马裘毛盛,戴杜朱彭孔葛车。”诗中实际上罗列了南宋以来黄岩县赵、左、陈、黄、潘、林、於、马、裘、毛、盛、戴、杜、朱、彭、孔、葛、车共18姓大族的存在,以上诸氏皆是在南宋时取得科举功名的士宦之家,尚未囊括当时所有黄岩士族,但士人家族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明代人编纂县志时曾对以上内容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其曰:

宋室传来谓赵氏诸宗室,柔极谓柔极黄氏,林即林伯和之族。里语云:“林有珠梅,半横东浦。”谓六族皆同始基祖而散居各处云。毛即丹崖毛鼎新族,盛即三坑盛圣泉族,戴即南塘戴氏。稍后又有四大家:南丁、北蔡、东阮、西卢。丁即温岭丁少云族;蔡即白山蔡博士族,或曰黄岩县北有蔡氏云。^[32]

明人所论实则多有疏漏。笔者注意到上述所提家族皆乃黄岩世居土著,靖康南渡以前既已定居台州。南宋伊始,他们大都从富民豪强逐渐蜕变为地方士族,且各家无不世科蝉联,簪缨鼎盛。即使上述部分家族在科举成就上一时乏善可陈,但这些世族之家仍能凭借雄厚的资产,持续不断地支持家族成员投身于科举之中,抑或是与当时士林领袖人物相结交,如上述提到的南宋中后期所谓四大家之一的“丁氏”最为典型。

丁氏之盛始于丁世雄(1146—1194)的经营,其家资宏富,在温峤(今温岭市温峤镇)一带建有园林一座,曰“松山林壑”,规模宏伟壮观。“依山之址,辟而为园。远近蔽亏,高下辉映,回还委折,而曰堂、曰亭、曰台、曰榭、曰林、曰坡、曰窝、曰谷,无虑二十余许。意匠剪裁,各成面势。”^{[29]166}陈耆卿描述此园:“大较松山其主名也,而东际海,西接仙源。水自西南数十折而至东北,其横树侧出,如一步武,而神工随也。其倏窈忽烂,如一顷刻而物候换也;其递凉燠,杂幽丽,如一拱揖而四序之变交吾前也。”^{[29]168}园主丁世雄(字少云)与其堂弟丁希亮(字少詹,1146—1192)好交接名士,特别是与当

① 按:黄宏,黄岩西乡柔极村(今黄岩区屿头乡屿头村)人,字子约,乃寿云先生黄超然的侄子,史称其“博览群经,尤长于词赋”,有文集《谷城稿》,已佚。参见弘治《赤城新志》卷一〇《人物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87页。

时浙东事功学派交往甚多,王琚称其“兄弟所从游,如叶水心、陈龙川,正伟人之尤者,皆尝与之婆娑偃仰,咏歌讲诵于其间”^{[29]168}。丁氏曾与陈亮在此谈论王霸之道,“龙川陈同甫来自永康,一见辄心可,每与少云、少詹击节抵掌,谈王说霸,穷日竟夜而不知倦”^{[29]166}。叶适又称:“客自天台、雁荡者多归之,少云必留张饮,佩兰淪茗,穷日夜与娱乐。”丁氏园林并非单纯的私人赏游玩之地,各路士人汇聚于此,名士伟人吟哦作诗其间,求学问道,延师访友,成为黄岩一带重要的文化交流空间。丁世雄逝世后,其子丁木博学嗜书,“作东屿书房而诵读其中”^{[29]163},并增修园林中原有池馆,延续了其父以来的学林盛举,“同时射策知名士,络绎踵门,为士大夫家,丁材(点校者疑作‘村’,可从)未有也”^{[29]332}。

南渡后寓居黄岩的西桥赵氏一度影响颇大,成为台州首屈一指的新型侨居士族,本文以台州世居士族为主,故暂且不论。过去学者如明代方志的编纂者多将黄宏诗中所及判为南宋宗室之一的西桥赵氏,实则非也。观《黄岩大家录》附诗所载士族,皆为黄岩本地的土著家族,且《黄岩大家录》完成于元代,宋元鼎革后,赵宋宗室出于政治避嫌,似乎不太可能仍强调其世族之盛。因此,笔者以为此处赵氏当指另一支世居黄岩的洪洋赵氏。其家族成员赵世显的墓志中有云:“赵之上世居会稽,讳仁晖,仕后周,爵至光禄者,先君八代祖也。嗣世避难,徙台之黄岩,因家焉。”^[33]赵世显之孙赵处温墓志铭亦云:“子孙自越徙台,居吾邑之洪洋,逮公九世。”^{[34]431}赵处温虽以白丁终身,但其“幼通九经大义,潜心《中庸》《大学》诸书。天资既厚,辅以方册,胸次和融,无私欲以害之”^{[30]431}。南宋乾、淳以来,两浙地区以金华为首,多有设立义庄以代劳役者。宝庆二年(1226),赵处温之弟赵处良(又名赵亥)考中进士,其家得以免除赋役,之后兄弟合计以“自积私田三百亩,置庄役家,共倚为用,就储粟千石散敛之,且贫人瘞丧嫁女取焉”^{[34]431}。①最终在理宗朝地方官王华甫的引导和支持下,黄岩得以设立义役。洪洋赵氏也以此积善于乡里之间,颇具威信。

发展至南宋后期,黄岩一地不仅仅出现了南塘戴氏(以戴复古为代表)这样的文学世家,甚至不乏一些重要的学术家族。如讴韶车氏因得朱子三传之学,在台州地方学术史发展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其中车若水(?—1275,字清臣,

号玉峰)著述颇多,惜乎多数不存。车氏有三世家传之渊源,其族人代有精研经学者,如车若水之祖车似庆(字石卿,号隘轩)、从父车安行(字正路,号韶溪)、堂弟车垓(原名若馆,字经臣,号双峰)等,《宋元学案·木钟学案》下甚至专列“车氏家学”。车若水未曾中举,但其声名享誉乡里,同郡“贾似道三聘入史馆,辞不受。夙承父某《春秋》学,复师杜清献公范”^[35],赵景纬亦曾以遗逸举其于朝^{[24]12673}。车若水早年拜师求学于陈耆卿,受到永嘉古文学派影响较深。中年转师乡贤杜范后,“始悔穷年倚靡,不但去道日远,而古文亦不如此。删焚殆尽,遂并疏笔研”^{[34]535}。自此之后,遂将学术精力投入理学当中。曾撰成《重证大学章句》一卷,纠正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失误。并撰有《道统录》《世运录》和《宇宙纪略》等理学著述。更重要的是,车若水作为南宋台州思想学术演变的见证者,一方面其学术脉络承自朱熹—杜焯—杜范,另一方面传承自朱熹—黄榦—何基—王柏一脉。自朱熹之后,台州理学传承的两支不同学脉,至车若水始再度合流。与此同时,车若水又经历了南宋从永嘉之学向程朱理学的学术转型期。舍弃所谓辞章之学的专研,转而皈依理学之门,这与南宋理宗朝以来理学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

以上虽仅仅详述了南宋黄岩一邑世居士族的历史变迁,不过由此以微知著,亦可看到两宋时期台州土著士族恰恰是其地方社会发展的基础所在。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将北宋以来台州的各个世族一一列举。实际上,自南宋以来,台州五邑中即使是相对偏僻的仙居县,也逐渐出现不少世居士族,如“一门竞秀”^[36]的郭晞宗父子兄弟、被誉为“仙居之勤于儒昉乎此”^[36]的应氏家族、“连取科第”^[37]的吴芾家族,以及“经学传三世”“父子相继擢第”^[38]的陈庸家族等,这些世居家族无不兴起于两宋之际。两宋三百年间,随着临安被确立为新的政治统治中心,地处浙东的台州最终凭借跻身畿辅的地缘优势,于各方面取得迅速发展,行都临安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辐射作用。进士中举人数成为这其中最明显的标志之一,中举或投身于举业的众多世居士人最终构成了台州士族最夯实的基础。故而至南宋中后期,陈耆卿才能自信地声称台

① 该事之来龙去脉详见南宋王华甫所撰《义庄田记》(《赤城后集》卷九,第327页),以及赵处温自撰《义庄田后序》(光绪《黄岩县志》卷六,第458页)。

州为“多士之邦”^①。

结 语

宋代台州士人及其家族的形成与兴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北宋前中期,台州士人大都籍籍无名,虽然自真宗咸平三年后台州间有中举者,但始终未能形成规模和影响力。然自北宋后期以来,以罗适为代表的台州地方士人开始崭露头角,但他们较少参与台州地方社会事务。南宋炎、兴以来,一方面大量中原士人南迁后定居台州,形成规模庞大的侨居士族,并在传承两三代后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因地近行都,台州僻处一隅的地理格局发生转变,许多土著士族迅速崛起,由侨居和世居士族共同组成的台州士人数量发展至历史鼎峰。直至南宋灭亡前夕,台州地方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士人社会,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众所周知,地方士人群体的形成和兴起需要一定的历史契机,这既有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的积累,也与一些突发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在宋代台州士人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的士人群体无疑来自于世居和侨居两个方面。程民生指出:“建炎南渡之际,北方人口潮水般涌向南方,是北方文化向南方地区的一次大规模的迁移扩散,在文化传播速度与程度上具有跳跃性。”^[39]事实上,靖康之难后,包括皇亲贵戚在内的大量北方中原人群的南迁,特别是大量文化士族的集体徙居,的确为南宋台州士人群体的壮大提供了直接动力,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士人的活跃度。

但是,台州世居士人的数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经过北宋的长期历史准备阶段,在“临海二陈”之后,越来越多的台籍士人开始在朝堂之上崭露头角,并且在退闲之时返居台州,热心参与地方事务,借助个人声誉积极经营地方士人的交游网络,台州开始真正形成所谓的士人社会。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防出任知州时,台州尚无兴学传道的传统。与同僚闲谈间皆是台州山水秀甲天下,李防因此疑惑:“可无清气以生奇人?况趋走之吏,尚弄翰墨。而询诸郡人,则曰:‘近世以来,鲜登科者。’”^[20]⁵⁶彼时台州山水之胜已然胜过科举教育,于是李防在先圣庙基础上创立学舍十余间,修藏书楼,一度改变了台州教育长期萧条的旧况。为

警励后学,李防又撰《丹丘兴学记》一文,文末写道:“而今而后,越变至鲁,岂难也哉!”^[20]⁵⁶李氏对台州诸生的殷殷期盼溢于言表。

所谓“越变至鲁”,实系化用《论语·雍也》中孔子“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40]的经典表述。而李防征引该文的深层意涵在于,期待僻处瓯越之地的台州地区,能通过不断接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浸润,实现风俗教化的持续提升。这种文化发展的理想愿景,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淀与地域开发后,最终于南宋时期迎来重要转折。事实证明,台州地方土著士人在南宋取得了快速发展,无论是业儒士人还是科举中第者的数量在短期内均获得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台州逐渐从相对边缘的南服之地,发展成为文教昌盛、儒风蔚然的东南名邦,最终完成了从瓯越旧壤到人文渊薮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 [1]王章伟.近世社会的形成:宋代的士族与民间信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
- [2]王昌伟.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M].刘晨,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21.
- [3]宋燕鹏.因文化而地位:南宋“士人社会”的成立及其意义[M]//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宋史研究论丛.16.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259-292.
- [4]李同乐,朱金花.地域文化发展中学术家族的作用:以宋代台州学术家族为中心[J].社科纵横,2014(10):103-107.
- [5]伊原弘.地方都市を囲む地域社会—南宋時代の台州を事例に—[C]//伊原弘,市来由津彦,须江隆.中国宋代の地域像—比較史からみた専制国家と地域—.东京:岩田书院,2013:89-110.
- [6]吴茂云.新出土戴氏家族墓志与戴复古家世新考[J].台州学院学报,2011,33(2):13-17.
- [7]森田宪司.『臨海墓誌集録』所収史料から見た新出土宋元墓誌の史料の特性[J].13、14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2006(3):12-19.
- [8]森田宪司.系谱史料としての新出土墓志—臨海出土墓志群を材料として[J].奈良史学,2006(24):53-77.
- [9]李建军.“另一乾坤”:台州文化的演进理路[J].台州学院学报,2021,43(1):13-22.
- [10]李同乐,王勇.徐中行的学术风格及其对台州文化的影响[J].兰台世界,2015(4):102-103.
- [11]张明君.宋代台州私人藏书的兴盛及其原因[J].图书馆界,

① 陈耆卿在《大比灵康祝文》中称:“神既庙于多士之邦矣,而不为多士谋,无是理也。尚惟左之右之,俾人人奋张,而不虚其多士之号。神之灵,于是为大,其贤于去菑保岁也远矣。”灵康庙是宋代台州最著名的神祠之一,其功能原本仅限于“去菑保岁”。至宁宗、理宗时期,灵康庙又衍生出主导科举文运的现实功能,这从侧面反映了台州科举事业在南宋时期的发展。参见陈耆卿著,曹莉亚校点《陈耆卿集》卷五《大比灵康祝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2014(5):9-11.

[12] 近藤一成.《参天台五台山记》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所见宋代浙东地区科举和士人社会[C]//武建国,等.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326.

[13]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4] 李时渐,等.三台文献录[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9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15] 秦观.淮海集[M].徐培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41.

[16] 黄薈,齐硕修,陈耆卿.嘉定赤城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楼钥.楼钥集[M].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19] 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689-728.

[20] 林表民.赤城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4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21] 黄瑞.台州金石录[M]//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22] 许景衡.横塘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3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23] 王祎.王祎集[M].颜庆余,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229.

[24]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5] 朱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6] 周必大.周必大集校证:第3册[M].王瑞来,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969.

[27] 刘宰.漫塘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7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485.

[28] 包恢.敝帚稿略[M]//宋集珍本丛刊:第7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552.

[29] 叶适.叶适集[M].刘公纯,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30] 吴业国.南宋“四十大邑”考论[J].中国史研究,2022(2):132-144.

[31] HARTWELL R.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2, 42(2):365-442.

[32] 叶良佩.嘉靖太平县志[M]//温岭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温岭丛书(乙集):第34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192.

[33] 赵允济.宋处士赵君、孺人陈氏幽堂记[M]//张直生.温岭文物简志.温岭:温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48.

[34] 谢铎.赤城后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4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35] 王逢.梧溪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731.

[36] 王寿颐,王莱.光绪仙居志附仙居集[M].活字本.清光绪二十年(1894).

[37] 朱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108.

[38] 陈耆卿.陈耆卿集[M].曹莉亚,校点.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49.

[39]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325.

[40] 皇侃.论语义疏[M].高尚桀,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3:145.

"Yue into Lu": An Examination of Taizhou's Indigenous Schola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Song Dynasty

Lu Yu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number of scholars in Taizhou was very small.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temporary capital city of Lin'an,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of Taizhou rose rapidly. By the middl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local Confucianism had flourished and Taizhou had earned its reputation as "a land of distinguished scholars". The immigrant scholars and the indigenous scholars together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local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aizhou, with the indigenous scholars always dominating the population. After the "Tow Chens of Linhai"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more and more Taizhou scholars began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Taizhou's local affairs, establishing a network of local scholars. The local writings represented by *The Register of Distinguished Lineages in Huangyan*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Taizhou natives who took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were successful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creased rapid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ch becam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growth of Taizhou scholarly community.

Keywords: Taizhou; Song Dynasty; indigenous scholars; scholars' families; imperial examination

戴复古的题画诗初探

姜泽华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戴复古以题画诗为媒介,与达官显贵结交,提升诗名。在诗画书写中,将画中景象与人文情感紧密结合,打破江湖诗派的思维定式,完成了从画作鉴赏到对人性、社会及历史深刻反思的审美转变。此外,戴复古题画诗以诗评画,从观画者的视角,关注到画材意象的使用,侧重自我意识的发掘,营造出“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展现了其脱胎于江湖诗人群体,又高于其他江湖诗人的情感世界与艺术追求。

关键词:戴复古;题画诗;现实书写;“离形得似”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5

宋代诗画交融的艺术传统铸就了题画诗创作的繁荣,据《全宋诗》统计,宋代题画诗的数量超过5 000首。近年来,学界深耕此领域,对苏轼、黄庭坚这些文学巨匠的研究成果颇丰;对活跃在南宋中后期的江湖诗人的题画诗研究尚显不足。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有言:“戴复古在江湖诗人中是最典型的,最富有代表性的。”^[1]戴复古(1167—?),字式之,号石屏,浙江台州人,著有《石屏集》,《石屏集》收录其题画诗共计21首。戴复古题画诗创作,既展现出其个体的诗画艺术和价值追求,又映射出江湖诗人群体形象的文化蕴含。

一、以画求名:

石屏题画诗的创作缘起

戴复古是宋朝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其身份之纯粹,在于他绝缘于官身,终身未仕,选择“以身许诗”。戴复古“以身许诗”的目的,在其自传词《沁园春》中似乎给出了答案:“一曲狂歌,有百余言,说尽一生。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2]243}。纵观其一生,戴复古的“求名”之路历经了从求“功名”到求“诗

名”的转变,题画作诗则是其求“诗名”历程中的重要媒介。

年轻时的戴复古求取“功名”,少有题画。“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3],戴复古也曾想通过科考步入仕途。但南宋时期,江浙一带科举竞争尤为激烈,据《嘉定赤城志》卷四《贡院》记载,嘉定年间,台州一次郡试参加者达八千余人,解额比例几乎是千取其一^[4]。戴复古虽“十岁聪明开,二十早奋发。胸蟠三万卷,手握五色笔”^{[2]15},仍未有所获,《江山》中诗人感叹自己“平生错做功名梦”^{[2]190},体现其心态的转变。《濠州春日呈赵教授》中诗人正式表达了对“功名”的释怀,专心追求“诗名”:“得酒忘为客,谈诗不论官。无人知此意,一笑对黄冠。”^{[2]130}此诗约作于开禧元年至开禧三年(1205—1207)。从此,戴复古在观念上认为“诗成胜得官”^{[2]83},行动上“谈诗不论官”^{[2]130}。

(一)结交权贵,以求“诗名”

南宋中后期,名流巨卿的认可是知识分子追求现实功利、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条捷径。这种风气促使戴复古开展干谒交游活动,以求取“诗名”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宋代是个“郁郁乎文哉”的朝代,绘画艺术在这崇文抑武的社会里享有空前的地位^[5]。诗画兼修成为文人身份建构的重要维度,正

如邓椿《画继》所言,“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6]。戴复古的艺术实践深植于此,在他看来,诗与画都是艺术家抒发胸臆的表达方式。如《黄州栖霞楼即景呈谢深道国正》中“要知作诗如作画,人力岂能穷造化”^{[2]28},可以看出诗画媒介的同构性潜在于诗人脑中。

因此,题画诗成为戴复古与贵族结交的敲门砖。戴复古经常参加高官显贵的宴会或雅集,“连宵歌舞醉东楼”^{[2]186},这些场合往往伴随书画鉴赏、诗词唱和。当贵族文人展示珍藏画作,便为诗人提供了一展才华的契机。戴复古《聂侍郎领客观园林之胜,饮中出示名贤书画》即记录了当时入席画的场景:

烈士家风从橐尊,时容野客上朱门。如登东观图书府,又似西岩水竹村。

自以一闲销日月,谁知万虑满乾坤。诸公衮衮成何事,不若花前对酒樽。^{[2]166}

“聂侍郎”指南宋时期的聂子述,“从橐”指文学侍从之臣,彰显聂子述高雅的家风与尊贵的地位;“野客”指平民,为诗人自称,两相对比,谦卑姿态尽显。又有《赵尊道郎中出示唐画〈四老饮图〉,滕贤良有诗,亦使野人著句》^{[2]23},诗题中诗人亦自称“野人”。戴复古以“诗画”为媒介、以平民的身份频繁出席贵族场合,可见“诗画”对其干谒交游活动的助力之大。

(二)名人赏识,壮大“诗名”

嘉定三年(1210)冬,戴复古携带个人诗集寻求楼钥品题作序。楼钥时任参知政事,声望很高,《宋史·楼钥传》曾记载“楼公当今人物也”^[7]。在楼钥为《石屏集》所作的序文中,虽未具体评价其诗歌,但已经为戴复古的首次结集增光添彩。嘉定十二年(1219),戴复古作《卢申之正字得〈春郊牧养图〉二本,有楼攻媿先生题诗,且征予作》^{[2]26}二首,诗名表明此图中有楼钥题诗。除楼钥外,戴复古还与姚镛、王君保等名公巨卿有诗画上的交流,如《题姚雪蓬使君所藏苏野塘画》^{[2]11}《毗陵天庆观画龙,自题姑苏羽士李怀仁醉笔,诗呈王君保寺丞使君》^{[2]31}《毗陵太平寺画水呈王君保使君》^{[2]16}。与名人的诗画互动壮大了戴复古的“诗名”,其所到之处,以画求诗者渐多。如《昭武刘圻甫以〈崑崙隐居图〉求诗》^{[2]57}。刘圻甫,字子寰,据《关中理学考》记载:“嘉定十年进士。早登文公之门,能诗文,与同邑刘清父齐名,官至观文殿学士,自号崑崙翁。刘克庄为序其集。”^[8]“求”字常作为下对上的敬语,可见戴复古此时已诗名远扬。又如《儒衣陈其姓,

工于画牛、马、鱼,一日持六簇为赠以换诗》^{[2]28},陈儒衣以六幅画作换取戴复古诗作,体现了戴复古诗才为世人所认可。

从“错做功名梦”^{[2]190}的士人到“谈诗不论官”^{[2]130}的黄冠,题画诗成为戴复古投诗行谒、拓展交游、积累文名的重要方式。“结屋三间藏万卷,挥毫一字值千金”^{[2]234},名流邀约题诗壮大了诗人声名,戴复古题画诗的价值也为时人所见。这种较功利性的“求名”行为符合世人对戴复古作为江湖诗人的“风云月露”的固有印象。元代诗论家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评价戴复古“广坐中口不谈世事”^{[2]340},认为戴复古题画诗缺乏现实关照;但深入剖析戴复古题画诗,这些诗绝不只是逢迎之作,也有很多反映现实的作品,能够感知到其高于一般江湖诗人的精神站位。

二、士人意识:

戴复古题画诗的现实书写

戴复古作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身寄江湖”而“心远江湖”。方回曾严厉批评江湖诗派:“无风云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莺燕鸥鹭、琴棋书画、鼓笛舟车、酒徒剑客、渔翁樵叟、僧寺道观、歌楼舞榭,则不能成诗。而务谀大官,互称道号,以诗为干谒乞觅之资。败军之将、亡国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阳,刊梓流行,丑状莫掩。呜呼,江湖之弊,一至于此。”^[9]方回一则从内容方面批评江湖诗不外乎“风云月露”之类;二则从道德人格上批评江湖诗人汲营名利的干谒风气;三则从艺术层面上批评江湖诗长于粉绘雕饰。事实上,戴复古不同于一般的江湖诗人,在题画诗创作中仍然保持着“士人”的“修齐治平”觉悟,表现出爱国精神、关注民生的现实书写。

(一)伤时忧国,耿耿寸心

姚镛在《石屏集》序跋中评价戴复古:“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2]328}王埜也说:“式之独知之,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2]326}两人对戴复古的评价倾向与方回对江湖诗派的批评迥然不同。

开禧二年(1206),宋宁宗北伐失败,向金投降,整个社会风气趋向保守,国力羸弱,民心涣散。这一时期戴复古的题画诗针对时政发表见解,展示了“士人”应有的家国意识。如《题曾无疑〈飞龙

饮秣图》》:

云巢示我良马图,一骑欲水一骑乌。竹批双耳目摇电,毛色纯一骨相殊。何人貌此真权奇,笔端疑有渥洼池。骀駼当用骅骝老,赢得画图人看好。盆中饮,槽中秣,无用霜蹄空立铁,何如渴饮长城濠上波,饥则饱吃天山禾,振首长鸣载猛士,龙荒踏碎犬羊窠!^{[2]27}

这首诗立意鲜明。“飞龙”在唐代指马,这里代指良马。“霜蹄”意指此马为战马;“犬羊”是对金人之蔑称。诗人豪迈万千,慷慨述诗,寄托兴兵北伐之志。

又如《赵尊道郎中出示唐画〈四老饮图〉,滕贤良有诗,亦使野人著句》中对刘毕和陶阮形象的描写,借古讽今,以“五胡妖气蔽神州,誓江不救中原乱”^{[2]23}表达诗人自身对南宋朝廷收复中原的渴望。

除爱国精神外,他的另两首题画诗《毗陵太平寺画水呈王君保使君》^{[2]16}《毗陵天庆观画龙,自题姑苏羽士李怀仁醉笔,诗呈王君保寺丞使君》也是关心现实之作,试看后诗:

姑苏道士天酒星,醉笔写出双龙形。墨迹纵横夺造化,蜿蜒满壁令人惊。

一龙翻身出云表,口吞八极沧溟小。手弄宝珠欲飞,握入掌中拳五爪。

一龙排山山为开,头角与石争崔嵬。波涛怒起接云气,不向九霄行雨来。

万物焦枯天作旱,两雄壁隐宁非懒!真龙不用只画图,猛拍栏干寄三叹。^{[2]31}

这是诗人为姑苏道士李怀仁的画龙而题的诗。但诗人题画的目的主要在于借画向王君保使君寄意,李怀仁的龙画得如此逼真,能够“波涛怒起接云气”,却仍然“不向九霄行雨来”,最后导致“万物焦枯”。当联想到诗人在前一首题画诗中所说的“天下苍生待霖雨”^{[2]16}时,诗人的寄望不言而喻:天下渴望出现能救民于水火的“真龙”。

(二)文染世情,关注民生

戴复古生于农村,游历江湖,熟悉、体恤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戴复古题画诗有闲适类、杂题类、耕织类、兽类等题材,均是贴近人民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卢申之正字得〈春郊牧养图〉二本,有楼攻媿先生题诗,且征予作》^{[2]26}《题姚雪蓬使君所藏苏野塘画》^{[2]11}《题牛图》^{[2]227}等。以《题申季山所藏李伯时画〈村田乐图〉》为例,“王孙公子巧欢娱,勿将富贵笑田夫!非渠耕稼饱君腹,问有黄金可乐无”^{[2]25},诗人从单纯的田园景色转向对人性、社

会、历史的反思,使全诗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可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0]。

戴复古在本是“风情”的题画诗,出现了爱国精神、关注民生、悯农情结等现实书写,凸显了其作为“游士”依然能够保持本心,关注现实的难能可贵。从自然美景欣赏转向对人性、社会及历史的深刻反思,使戴复古在内容和道德人格上能够超脱于江湖诗派。至于艺术层面上的“粉绘”,戴复古则选择将题画诗的重心从描摹画作转移到评论画作,以观画者的视角,关注到画外之境,实现了题画诗“离形得似”的艺术表达。

三、观神融通:

戴复古题画诗的艺术表达

戴复古所题之画多为文人画。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对“文人画”如此定义:“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11]也就是说,文人画不再追求画面内容与实物外形的极致相似,而是侧重于画面之外表达画家自身的艺术追求。

为文人画题诗的戴复古,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与文人画如出一辙。戴复古题画不是分毫无差地去描摹画中之物,而是以诗评画,通过观画者视角的转换、画材意象的使用,在“画外”打造题画诗中的“画境”,以作家之“神”超越画作之“形”,观神融通,构建出“离形得似”的诗画境界。

(一)观者本位:观画视角与画境拓展

在戴复古的题画诗中,诗人总是站在观画者的视角。戴诗评画的开篇多以“何人”起笔,“何人笔端有许力”^{[2]16}“何人貌此真权奇”^{[2]27}“何人妙笔起秋风”^{[2]242}等,第一时间将读者拉入观画视角,拉近画作与观画者、评画者与读者的距离。此外,诗人评画,首先便是评论画家的画技,“妙笔”“入神”“神通”“有生意”等词汇都是戴复古对画家画技的认可,尽管受投诗行谒目的的制约,戴诗中不乏吹捧之意,但他的吹捧往往是对画作艺术价值的肯定与赞赏,是他个人审美情趣与艺术理念的外化。因此,戴复古的题画诗使画面之形与画外之神、画作与诗歌、作画者与题诗人产生了双向互动,既能够满足求诗者的“增值”诉求,又不失水准地点评了画作的深层内在。

戴复古站在观画者的视角还关注到了画材意象的使用。在他的题画诗中,能够看到“三尺纸”“古锦轴”“生绡”“墨迹”“醉笔”等意象的添加。画材的性能与应用是中国画呈现独特风貌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画家在创作作品时,与物象所产生的共鸣皆是通过笔、墨、纸等工具来传达,用什么画、在哪里画,都成为画作完稿的见证。“用笔”主要指作者如何使用画笔,并与感情相融合的技巧。正如唐人张彦远所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12]朱屺瞻谈到“用笔”:“要成于笔,还必须知笔之性,纸之质,墨与色的具体性能,知晓各种性能而掌握之,才可以下笔无碍。用笔之道,须知从有碍达无碍。”^[13]诗人题画诗往往先赏而后评,他创造性地将画材作为意象引入题画诗中,将其与画面看做一个整体,拓展了题画诗的画境。以《儒衣陈其姓,工于画牛、马、鱼,一日持六簇为赠以换诗》^{[2]28}和《题姚雪蓬使君所藏苏野塘画》^{[2]11}为例,两幅画一个用绢,一个用纸,各有特点。水墨作于绢,色度变化较小;在纸上着墨,因纤维密度不均等原因,色度变化较大。戴复古注意到这两幅画的差别,描述儒衣所赠水墨画展于绢中,枯润杂乱的野塘画于纸上,如果诗人不提,读者未必能够在脑海中“再现画境”,题画诗所呈现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又如“墨迹从横夺造化,蜿蜒满壁令人惊”^{[2]31},诗人交代此画画布为寺院墙壁,观画者是以平视或仰视而非俯视的视角,精准地描绘出壁画扑面而来的壮大气势,传递出诗人见到此画的震撼心情。

戴复古常以观画者的立场品评画作,但并非亦步亦趋地跟随画面内容,而是更注重自我表达。戴诗中“我”字的出现频率较高,如“我疑此画即其人”^{[2]23}不仅表达了对画作逼真程度的赞叹,更透露出对画中人物性格、气质的深刻理解与认同;“我之居,元在野,平生惯识牛羊者”^{[2]26}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入诗,传递的是“我”对自然的热爱;“何人为我更作杜陵《饮中八仙歌》,将与冰壶主人对此对”^{[2]23}更是直接表达了对画作延伸创作的渴望,诗人希望在作画者与题诗人之外有第三方的介入,能像杜甫描绘饮中八仙那样,为自己观画时的所见所感赋诗,在画作内容之外缔造新的诗画佳话。结合戴复古“求诗名”的题画目的,以及“请君就此三景中,挥毫添我作渔翁”^{[2]28}“挂君图画读吾诗”^{[2]28}“中有石屏老泪痕”^{[2]11}等诗句,可以看出,诗人将自我融进画面,并对画境

进行了再造。画家、画作、观者联合一体,相互成全,使得戴复古的题画诗不是对画作的简单注解,而是借诗才、画才超越画作本身,传递了观者的艺术精神。

(二)“离形得似”:神韵超越与境界生成

戴复古题画诗的创作促使戴复古在审美过程中更加积极地介入画作,这种积极的审美态度也反映在他的整体诗风上,使得他的诗歌不仅是对画作的客观描述,更是充满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和深刻思考,从而达到“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

“离形得似”出自《二十四诗品·形容》,郭绍虞语:“离形,不求貌同;得似,正由神合。”^[14]戴复古《论诗十绝》中写道:“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2]230}此外,戴复古还认为“诗本无形”^{[2]230},诗虽能够书写万物,而“神蕴”才是诗歌创作的关键所在。题画诗作为诗画交融的艺术,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指向,题画诗如何书写,取决于诗人自己的“神”,而不是极致描摹画作形式与画家意志。以《题牛图》为例:

牡丹花下连宵醉,今日闲看黑牡丹。

得此躬耕东海曲,一贫无虑百忧宽。^{[2]227}

诗人超越外形,用“黑牡丹”代指牛,避免了冗繁细微的形象刻画,只抓住了耕牛的颜色和品性。“得此躬耕东海曲,一贫无虑百忧宽”传递出“耕牛”的朴实与辛勤,将牛的“神采”呈现在读者面前。诗中牛的“神采”与诗人的内心感受相结合,能够感受到诗人对耕牛的喜爱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然而,“离形得似”不是彻底舍弃“形”,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离开描写对象的外形,运用夸张、虚幻或象征等手法,来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和本质特征。如戴复古《题尹惟晓〈芙蓉翠羽图〉》:“翠羽飞来又飞去,一心只在蓼花丛。”^{[2]242}书写出画中静止的“翠鸟”能够“飞来又飞去”的动态。未观原画,亦能让读者体会到诗人描绘的画面。又如《毗陵天庆观画龙,自题姑苏羽士李怀仁醉笔,诗呈王君保寺丞使君》^{[2]31}中对“龙”姿态的夸张描述,“口吞八极”“山山为开”等,无不源自诗人对画作的主观想象。

戴复古打造“离形得似”的艺术效果,主要借助自身诗艺对所题之画进行“雕琢”。“雕琢”是戴复古“再造画境”的必要手段。《论诗十绝》中提到“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2]231},戴复古认为作诗、字句需要精雕细琢。戴复古在题画诗的创作中同样“雕琢”以“留形”。以《题侄孙岂潜〈家山平远图〉》为例:

好山横远碧,平野带林塘。四望耕桑地,几年云水乡。

海天龙上下,秋日鹤翱翔。睹物忽有感,无心住草堂。^{[2]64}

诗人在构建图景时,选择平远构图,“好山”“远碧”和“平野”“林塘”由远及近,渐次铺开。戴复古通过炼字,选择“横”让人感受到一种横向铺展、无限延伸的气势,“带”则赋予了画面流动感与生命力。不同画面的相互呼应、逐步深入,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诗的结尾,“睹物忽有感,无心住草堂”,诗人由眼前的景色触发了内心的感慨。草堂作为诗人的住所,代表着他的物质生活和日常状态,身为江湖浪客的戴复古,晚年归家的境遇并不富裕,他曾作《归来二首,儿子创小楼以安老者》来描绘儿子为其养老所建的小楼:“但能营一饱,浑莫问其余”^{[2]60},小楼草堂仅能解决基本生存,当他看到侄孙辈的新屋落成,这种感慨则包含了自愧不如的酸涩、对一生漂游的无奈,也是对人生、对生命的深刻领悟。由此,诗与画、情与景、心与物完美融合。戴复古“雕琢”有度,更重传“神”,在“离形得似”的诗画互动中将人生体悟融于万物,彰显其题画诗独特的艺术价值。

结 语

有宋一代,题画诗的发展达到高峰。戴复古以游士之身辗转江湖,通过题画诗的创作实践,

展现了独特的艺术审美和丰厚的精神蕴涵,为宋代题画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江湖诗人的干谒风气影响下,戴复古的题画诗创作同样以“求诗名”为目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在具体的诗画书写中,又一反江湖诗人“风云月露”之风,关注现实,展现其士人担当。在艺术表达上,更关注自我意识的呈现,追求“离形得似”的艺术效果。题画诗创作展现了戴复古脱胎于江湖诗派群体,又高于江湖诗派的思想觉悟与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2:221.
- [2]戴复古.戴复古诗集[M].金芝山,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3]赵孟頫.赵孟頫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33.
- [4]陈耆卿.嘉定赤城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125.
- [5]祝振玉.略论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几个原因[J].文学遗产,1988(2):91-98.
- [6]邓椿.画继[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12.
- [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047.
- [8]徐公喜.关中理学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308.
- [9]方回.桐江集[M].宛委别藏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102.
- [10]刘勰.文心雕龙注:下[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75.
- [11]陈师曾.中国绘画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4.
- [1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27.
- [13]朱屺瞻.纵谈笔墨[J].老年教育(书画艺术),2016(4):14-15.
- [1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4.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Dai Fugu's Poems Inscribed on Paintings

Jiang Ze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Dai Fugu associated with dignitaries and promoted the reputation of his poems through the medium of painting poems. In the writing of poetry and painting, the scene in the painting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humanistic emotion, break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Jianghu poetry school and completing th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from painting appreciation to profound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society and history. In addition, Dai Fugu's poems inscribed on paintings comment on paintings with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painting viewer,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painting materials and images,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creates an artistic realm of "spiritual capture beyond form", which shows his emotional world and artistic pursuit that were born out of the group of Jianghu poets and are higher than other Jianghu poets.

Keywords: Dai Fugu; painting poems; realistic writing; "spiritual capture beyond form"

翦论九绝天人苏东坡之天人合一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洪 迪

(台州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苏东坡这位绝世天人,一身而九绝:诗(词)绝、文绝、书绝、画绝、思绝、政绝、仁绝、情绝、真绝。他一生的升沉与潇洒,真实而生动地证明:历史人物的现世必然为天人合一。苏东坡一生的真切传略,既有现实社会历史的造就,更有个人主体条件的优异与善处,体现出杰出思想家的本色。

关键词:天人合一;大科高中;《应诏集》;人性论;中庸论;杰出思想家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6

在悠悠五千年中国文化史上,倘若在已故与健在的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中,举行一次公投,推举一位最敬爱的球面放射的顶级文化人,恐怕非九绝天人苏东坡莫属。这位真正的天人,一身而九绝:诗(词)绝、文绝、书绝、画绝、思绝、政绝、仁绝、情绝、真绝。若论单项,每一项都会有一二位并肩或超越者,而集九绝成球面放射,则断断是千古一人!

中国古哲特重天人合一。天,指宇宙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即指个人身处的包括社会历史存在的客观环境客观实在的一切。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且“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5}。就是说,这位九绝天人苏东坡的诞生、成长与一生,同他所处的时代及有较多交集的人们,关系甚为密切,在颇大的程度上决定他的成长成材,起伏升沉,乃至荣辱死生。

一、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自秦汉以来,汉、唐最为强盛。亦为人所盛称。而对于宋,尤其是北宋的繁盛,却往往被轻忽。其

实,五千年中国历史,在春秋战国以后,有秦汉;在魏晋南北朝之后,有隋唐;在五代十国之后,有两宋。汉、唐,尤其在高峰期,是强盛的。而两宋,即使在北宋盛期,也只是盛而不强。纵在北宋大江南北大一统之后,仍有辽、夏强敌的侵袭,在武功上颇显差劲。但在文治上,在经济繁荣尤其是文化昌盛上,却臻于超迈领先地位。惜乎一向重视不足。

北宋农业较唐有所发展。原来近似农奴的僮仆,在法律上承认其为良人。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可自立户名。宋太宗赵光义曾下诏给江南、两浙、岭南、福建诸路州郡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缺少种子者由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湖北鄂州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东坡有《秧马歌(并引)》。其引云:“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于是作歌而颂曰:“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鹭,纤纤束藁亦可赍。何用繁纓与月题,揭从畦东走畦西。山城欲闭闻鼓鼙,忽

作的卢跃檀溪。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2]⁴⁹⁹⁻⁵⁰⁰在北宋中叶,单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份每亩可获二石至三石。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增多了。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的发展十分显著。开封、成都、婺州、杭州等地的刻版印刷业最为发达。浙江的明州、温州、台州、婺州,江西的虔州、吉州,湖南的潭州、鼎州,陕西凤翔的斜谷等地,皆成为当时的造船业中心。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外商人所用的几乎都是中国船只。商业甚为繁盛。各大城市皆突破了唐代坊与市、昼与夜的界限,城市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外贸亦较唐的极盛时期更为繁荣。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皆成外贸的主要口岸。纸币印行已由私家转为政府专门发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生动地呈现了首都开封民众生活的繁华安康景象。

北宋自建隆二年(961)太祖与赵普定策“杯酒释兵权”之后,抑武崇文,对大臣的礼遇较前代为优,极少诛杀。在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基础上,一时文明昌盛,人才济济。就治国大臣来说,自赵普、吕端、吕蒙正以降,则有寇准(961—1023)、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1007—1072)、文彦博(1006—1097)、司马光(1019—1086)等,皆文武全才,各有建树。北宋的文治特盛。哲学、文学、诗词、书画,均蓬勃发展,人才荟萃。哲学上出了一批理学大家,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077)兄弟“二程”等。

北宋的文艺家尤如三春园圃,万紫千红。散文,“唐宋八大家”竟占3/4,有“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诗词,较散文尤为繁盛。在苏轼之前,有张先“张三影”,柳永原名柳三变“奉旨填词”,再加晏殊、晏几道父子。在苏轼之后的杰出词人则有后来并称“苏黄”的黄庭坚,“落红万点愁如海”的秦观,“梅子黄时雨”的贺铸,更有“词中老杜”周邦彦。

书画。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绘画。宋代是中国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着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突显。书画家米芾及其长子米友仁号“大小米”,诗人画家文同尤擅墨竹,他认为“竹如我,我如竹”。苏轼承之,“喜欢并擅长画枯木竹石……在绘画史上,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3]。而后来从学文同者颇多,有“湖州竹派”之称。在画史上董(源)巨(然)并称,其山水成为南派正传。李成惜墨如金,创“卷云皴”。郭熙更有画论。其子郭思增以己作,纂集为《林泉高致》。李公麟擅人物鞍马及历史故事画,作《西园雅集图》。张择端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存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甚为符合。

看来,我们有充分、翔实而生动的史实证明,掉下九绝天人苏东坡的上天,实为两个方面的和合:一是苏氏家族家庭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生物遗传学上的特异因子;二则更为重要:北宋虽不强而特盛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文艺时代环境与氛围,各方面杰出人物的辈出与繁盛,人物间的直接间接的交集、交合、促进、纠缠与争斗。再加上一些不齿于人的魑魅小人。这便是“三苏”中的“大苏”东坡所面临与卷入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乃显示其“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当然,东坡之所以成为千古独一的九绝天人,其个人的个性与主体能动性,仍居头等重要地位。

二、今朝马首长安

仁宗嘉祐元年(1056)春天,苏洵雄心勃勃、喜气洋洋,带领两个二十左右天才儿子,出川进京,先去成都拜见知益州张方平,求得其撰书荐洵于欧阳修。五六月间抵京师,馆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苏洵上《书》欧阳修,并上所作《洪范论》《史论》,修大称赏,上《荐布衣苏洵状》,称他“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閎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4]可惜他推辞了对他的考试,未获朝廷重用,只以县主簿一类小吏终老。但他的文名因此大振。厕身“唐宋八大家”之列,流芳百世。

苏轼、苏辙兄弟却正是为了赴考而来的,一连参加了两次考试,而且联袂高中。此次三苏进京,兄弟联考是苏明允最明智的大手笔,在中国文化史上投掷一捆最耸动视听的集束手榴弹。而且极幸运地遇到欧阳修等“贵人”相助。嘉祐二年(1057)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

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应试时,苏轼除并作杂策五首、诗一首外,撰《刑赏忠厚之至论》,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之“太学体”。梅尧臣得之以荐,欧阳修喜置第二。他在一封《与梅圣俞》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而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当时欧阳“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2]31}。

紧接着苏氏兄弟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俗称“制科”或“大科”考试。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举行,考官是吴奎、杨畋、王畴、王安石。合格的只有苏轼、苏辙和王介三人。八月二十五日在崇政殿举行“御试对策”。仁宗皇帝亲临考场。考官为胡宿、沈遘、范镇、司马光、蔡襄,胡宿起草了《策问》。考评结果分五等。第四等以上为合格,但一、二等为虚设。苏轼被考为第三等,是破天荒的高分。王介为第四等,苏辙有争议,至御前取中值定为“第四等”。于是,苏轼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这是当时进士科状元的优厚待遇。苏辙只得到“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比乃兄差得多。而且知制诰王安石还“封还词头”,不肯为他“制诰”。终于由沈遘起草,但他一生最高职位是门下省侍郎,却超过兄长。

收在《苏东坡全集》最后的《应诏集》,便是苏轼当年的“贤良进卷”。它像一部独特的子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分作略、别、断的二十五篇。说话人虽为平民考生,实则是从宰相的视角向皇上提出治国安民的总体建议。

策略五篇,是总纲。第一,天行健。“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5]727}第二,针对外有辽夏“二虏”,内需致治现实,“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宰相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其成焉耳”。再依仿西汉的“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凡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亦不甚简欤?”^{[5]728-729}这样在天子宰相之下分设部门,各司其职,既切合当时,亦在原则上适用后世。第三,先讨论法治与人治应相结合,重在人治。而

历来的不治,“失在任人而已”。且“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应当像刘备用诸葛亮,苻坚有王猛一样。“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虽得贤臣千万,一日百变法,而天下益不可治。岁复一岁,而终无以大慰天下之望。”^{[5]730}第四,在“天子与执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无疑,可以尽其所怀,直己而行道”之后,“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论,以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5]731}。让天下人奋发起来,都去建功立业。第五,“其次莫若深结天下之心”。应当恢复太祖太宗时的“法令简约,不为崖岸。当时大臣将相,皆得从容终日,欢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所以“陈其五事,以备采择。其一曰:将相之臣,天子所恃以为治者,宜日夜召论天下之大计,且以熟观其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远方之民者,其罢归皆当问其所以为政,民情风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从侍读侍讲之臣,本以论说古今兴衰之大要,非以应故事备数而已;经籍之外,苟有以访之无伤也。其四曰:吏民上书,苟少有可观者,宜皆召问优慰,以养其敢言之气。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虽其至贱,无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为,岂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见之,使不知其所从来。如此则远方之贱吏,亦务自激发为善,不以位卑禄薄,无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饰。使天下习知天子乐善亲贤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发,知爱于君而不可与为不善。亦将贤人众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5]732}。强调上下和通,广开言路。

策别十七篇。“盖其总四,其别十七。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课百官者,其别有六:其一曰厉法禁,其二曰抑侥幸,其三曰决壅蔽,其四曰专任使,其五曰无责难,其六曰无沮善。”“安万民者,其别有六:为‘敦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去奸民’。”“厚货财者,其别有二:为‘省费用’‘定军制’。”“训兵旅者,其别有三:为‘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5]732-734}其间各有其具体说明与更详细切实的措施。

策断三篇。一篇总论“当今之患”。认为“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

也”。当“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他建议：“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总之，“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5]734-754}。一篇“先论制御西戎之大略”。相对地说，“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且夫大国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因此，制御西戎，必须“先发而后罢”^{[5]756-757}。一篇“论北狄之势”。提出制敌之要妙，在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是惜矣。”具体地说，一是其君主之待臣下比较粗暴；胡人对汉民，以“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这都可以施反间计等，“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二是“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军，仓廩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三是“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馀。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莫不备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5]757-758}。这番精彩论议深蕴着中国古代素朴的唯物辩证法。

当我们在一千年后，总体而具体、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苏轼这融略、别、断于一体的攘外兴内、治国安民、文武双全的国策建议，怎不拍案惊叹！上天竟降下如此年轻的绝世政治天才！而亲临崇政殿制科“御试对策”的宋仁宗赵祯亦真具睿智慧目，当时便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

三、俯仰人间今古

苏轼之所以具备攘外兴内、治国安民、文武双全的一代名相之才，正是建筑在他是文史哲政经全面发展的大学问家的坚实基础之上。而一切社会科学的核心与灵魂是哲学。在“贤良进卷”二十五篇论中，属于哲学的则有中庸、子思、孟轲、荀卿、韩非、杨雄、韩愈等论。其间，苏轼着重在人性论与中庸论等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哲学家思、孟、荀、杨、韩等作出自己的有创见的独特评价。

(一)关于人性论

他认为：“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杨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杨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故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圣人之道，造端于夫妇之所能行，所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思、孟同作“性善之论”。“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天下之人；故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苏轼赞成“性善之论”，而又细辨思、孟之优劣。对于荀卿，苏轼持批判否定态度：“荀卿者，喜为异论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5]758-760}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5]772-775}。而在《杨雄论》中，苏轼有更透彻的辨析。苏轼说：“杨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析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多焉。而‘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是故其论终莫能通。”“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人，而小人无是，则无由以为恶。圣人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杨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5]775}而在《韩

愈论》中,苏轼更进一步辨析道:“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儒者之患,患在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5]779-780}综上所述足见苏轼的人性论精深明晰,独树一帜,尤近乎真理。他认为,性、才、情三者相近而有别,必须明析。“性”指人的天然需要,如饮食男女,人生而莫不有的。因而无“善恶”之显,亦无“三品”之分。能分“三品”的是“才”。有“善恶”的是“情”。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圣人“御之而‘之’乎善”,小人“御之而‘之’乎恶”。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性”的似乎善恶,是先天的所无“有”,乃后天发展的所“之”,所到达。不过,细心的读者能发现,似乎苏轼的人性论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是赞同思、孟的“性善”;一是称好杨雄的“善恶混”;一是认同孔子言性“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近乎本无。然而,正是在这似乎自相矛盾之处,体现了苏氏人性论三位一体的精深微妙。他真正论断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是白板一块的“无”,或者非常相近;也可以说它是极淡的善恶混。但从后天的发展来看,却是好人多,所以偏于性“善”。看来,在中国古典哲学人性论中,苏轼确为近乎被忽视的卓然特立的一大家。

(二)关于中庸论

两宋哲学的主流是程朱学派。苏轼年长二程二三岁,朱熹则晚生一个世纪。苏轼的中庸论,自行溯源孔子、子思,自有创见,自成一家。他先作总论:“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是故去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5]781}于是展开一论述。

他提出:“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乐之者为主也。

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贤人之所由以求者也。君子之学,慎乎其始。何则?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乐焉,则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5]760}他认为,“诚”是“乐之”,“明”为“知之”。人的好恶出于人的本性,忠实于人的本性,便是诚。他讲诚明落实到知行。好之者虽知而有所不行。乐之者虽有所不知,但既知即行,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乐之者”才是圣人;知而有所不行的“好之者”只是贤人。以知行合一的程度来区分诚明,区分圣贤。

他提出:“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而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他举“若为强人者”的“礼”为例,作正反面的层层推演,然后断言:“将天下之所谓强人者,其皆必有所从生也。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是之谓明。”他更进一步说:“君子欲其不隐,是起于夫妇之有馀,而推之至于圣人之所不及。举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使天下之安其至难者,与其至易无以异也。”“故凡为此说者,皆以求安其至难,而务欲诚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诚而不得其说,故凡此者诚之说也。”^{[5]760-761}他将由“明”至“诚”的方法道路,作为“诚之”的要义来阐发。强调这个要义的主旨,在于“诚之”的起点放在普通人都能做到,而其终点则在连圣人亦颇难完全到达。这样便能“举天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使天下之安其至难者,与其至易无以异”^{[5]761-762}。这样,他所规划的由“明”至“诚”的大道,从普通老百姓至贤人圣人,都可以奔走在其上,只是程度与速度不相同罢了。

于是,他总结性地论到中庸:“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纵然“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途,夫虽欲不废,其可得

耶”?那么,“既不可过,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因为“皇极者有所不极,而会于极;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他更进而分析批判道:“君子见危则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于中庸。见利则能辞;勉而不辞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何则?恶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5]762-763} 他将诚、明、诚之、中庸贯通起来。他强调诚是忠实于人的本性,因而皆为人之所“乐之”,且为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诚之则为包括普通人与圣贤所有人追求诚的共赴大道。而中庸则是走动中无邪僻无过无不及的标准状态,即“皇极者有所不极,而会于极;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也就是动态地时刻归于正中。亦即时时“皇极”而“时中”。他特别痛恶伪君子真小人的“乡原”,因为“恶其似

也”。最后,他提出做到“中庸”的要诀:“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不惑于“迹”,真品其“味”。透过现象,得其本质。

总之,在属于哲学的这九论中,青年苏轼着重通过对人性论与中庸论的深究与阐释,雄辩地证明自己是杰出哲学家。更何况他后来还有专著《苏氏易传》及大量诗文中散见的精彩宏博的哲理思想。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历史学家对于真实历史的记载与评价,亦难免有所偏颇与疏漏。苏轼这位货真价实的杰出思想家,竟被雪藏了整整一千年!呜呼,惜哉!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苏轼.苏东坡全集:上[M].北京:中国书店,1986.
- [3]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M].1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65-467.
- [4]欧阳修.欧阳修散文全集:下[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86:943.
- [5]苏轼.苏东坡全集:下[M].北京:中国书店,1986.

Treatise on Su Dongpo's Ninefold Celestial Mastery and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Swept by Tides of Time in the Winds of Emotional Profundity

Hong Di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Su Dongpo, a rare genius with celestial qualities, epitomized nine pinnacles of mastery including poetry (ci), prose, calligraphy, painting, philosophy, governance, benevolence, emotional depth, and authenticity. His life journey — marked by both vicissitudes and graceful composure — vividly attests that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mundane world inherently embodies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The authentic chronicle of Su Dongpo's life was shaped not only by socio-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by his exceptional personal qualities and adept navigation of challenges, exemplifying the essence of an outstanding thinker.

Keywords: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top rank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Response to Imperial Edic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doctrine of the mean; outstanding thinker

论柳宗元酬赠诗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何方形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柳宗元酬赠诗是其交友活动、自我挣扎及奋进处境的真实记录,超越单纯的友谊叙写,蕴含价值判断乃至社会意义;山水文学精工刻肖的风格渗透到诗歌领域,能使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达成诗意化境,形态要素具足,提高了酬赠题材的美学与文化价值。柳宗元以杜诗为基础,在题材拓展、艺术深化与细化、地方性写作等方面均有新探索,诗史意义巨大。柳宗元与刘禹锡之间的酬赠诗作更是唐代文坛的重要收获,可谓中唐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去中心化的标志性样本之一,甚至影响文化地带迁移。

关键词:柳宗元;酬赠诗;文化意义;地方性;去中心化;杜甫;刘禹锡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7

治化与文运的关系比较复杂。当写作者处于社会体系边缘,笔尖流露出深挚情怀和抱负之时,往往激发出潜藏的文化变异能力。柳宗元酬赠诗正是这种变异能力的体现之一,从生活经验中构筑诗意,既是新的文学现象的浮现,也有自觉建构的成分。人们得以从中窥察当时社会交际、文化迁移等方面的真实生活面相。文学书写传统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其文学乃至文化功能理当诠释与窥究。

一、柳宗元酬赠诗创作背景: 贬谪囚居

柳宗元文名重于当时,酬赠诗亦是其纯粹而深刻的作品之一,在杜甫之后,把诗歌抒写心志之艺推向新高度,使诗歌的意义领域更深、更广,体现出当代性与地方性,是今人解读唐诗的重要视窗。俞陛云在评述柳宗元《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时指出:“历历前程,行行老泪,山阳闻笛之情,马策西州之恸,无以过之。知子厚笃于朋友之伦矣”^[1],方家所论,自无虚夸。酬赠诗多为一时感知的急就章,但以真为本,表现丰富、细腻又复杂的情怀,蕴

含人生价值判断和一定的社会意义,使传统诗歌有了新的发挥空间。柳宗元以仁者情怀变革图强,还利于民,一度跻身于政治与社会中心,志在经世却有志难展,竟至放废而离乡远涉,来至文化朴野之地。经历社会变动,但其生命世界从不枯寂,朴正耿直,崇道重情,《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所谓“交侣平生最亲”^{[2]607}。《师友箴并序》挑战历史陈论,探索拜师与交友的规范与准则,辨析详明,甚至上升到友谊哲学层面:“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2]287}这段自述文字可谓精见。

柳宗元酬赠诗多作于南谪期间,是交友活动、自我挣扎及奋进处境的真实记录。柳宗元固然不是为了从事审美才去体验生活,但屡遭贬谪的生活却不断为其提供创作源泉,创造新的写作视角,也使抒情更加厚重,以《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为代表的诗歌文本打破酬赠诗往往境界狭窄的窘境,有着文学乃至文化层次的意义。究其原委,地理环境和物质生存条件的急剧变化,使柳宗元产生比较强烈的“弃地”意识,作

于元和十二年(817)的《柳州东亭记》因物见我,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个性化明显。《囚山赋》亦以“囚”名,可见自我被拘囚之心投影到客体。贬逐期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匮乏,心理情感上又漂泊无依,与囚居生活无异,生发“囚山”之感也就正常。柳宗元虽出入于佛教,属于好研佛、论佛者,佛理往往于山水中获得悟解,但人生基点仍在儒学。处于废弃、远谪等恶劣环境,独自品味着落寞无依的凄切与哀愁,始终不能忘怀君国之事,超越一己坎坷与个人感情的纪实环节,这就是唐人的真精神。酬赠诗也可以表达重要的思想见解,如《寄韦珩》。诗歌描述群贼缚壮杀老的惨状,交代“支心搅腹”的实景,也描述了“笼铜枹鼓手所操”等摒弃与消灭恶习、陋俗的神勇,最后表达“起望东北”的情思,视角多重。全诗针对性很强,不作平面化叙写,亦无道德教化文辞,一气呵成。柳宗元追求积极生活,对传统儒家精神有所跨越,致用之心终生不泯,无论是参与永贞革新,还是治理柳州期间挖井汲水、开荒植树、释放奴婢、开设学堂等,在唐代甚至整个古代都很有代表性。柳诗多能在书写中反顾仕途,强调人生历程中的责任,不去宣传与高扬隐逸思想,又进而使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达到诗意化与审美化的境界,既得前人沾溉,又努力加以熔炼,自铸新我,这与杜诗精神相一致。《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表露了柳宗元的理想志趣:“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厅。”^{[2]593}客观生活场景激活了主体的既有情感结构,世事郁结又不得稀释,贞心不泯而风节弥高,充满体悟张力。诗人不作虚浮空泛之思,而是将热情渗透在诗境中,将生命体验作了诗意显现,增强了抒情的深度和广度。《朗州宴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也作于集体遭贬而后共同奉诏回京途中,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内涵丰厚:“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赐环留逸响,五马助征骑。不羡衡阳雁,春来前后飞。”^{[2]592-593}这也许是柳宗元悲剧人生中最富喜剧意味的时刻,引证有虚有实。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刘禹锡谪朗州司马,另一友人陈谏为台州司马。

长期的谪居威胁着柳宗元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诗人深味出浓黑的人生悲凉,难免意苦,独处孤吟,时露寒酸之叹,乃至渗透哀情。伤老悲秋,本为人之常情,但诗人的侧重点又各自有别。方回

《瀛奎律髓》卷四《风土类》将杜诗的悲而能壮作参照,凸显柳诗的酸楚特征,又强调其“可法”价值:“杜诗哀而壮烈,柳诗哀而酸楚,亦同而异也。……年四十七卒于柳州,殆哀伤之过欤?然其诗实可法。”^[3]柳子壮年而逝,与其“哀伤之过”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以酬赠诗而论,身心困厄的柳宗元以杜诗为基础,但不是全面规摹,而是在题材拓展、艺术深化与意兴细化等方面均有探索,情思深婉。诗风质朴信实,与希冀以文学变革推动王朝中兴的古文运动并行不悖,这是在文学反映领域有所缩小的情况下尽己所能而努力的结果,颇显创新,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二、柳宗元酬赠诗的文学价值: 去中心化

在李杜历史书写之后,诗坛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产生了求新求变意愿,如何汲取前人精华并化为自身素质,取舍与运用颇为重要,韩孟诗派、李贺之作,巨笔写来,皆为成果。柳宗元《酬徐二中丞普宁郡内池馆即事见寄》在对友人的谢意中展开对故乡的怀念,没有陈言套语而气势自具:“鹧鸪念旧行,虚馆对芳塘。落日明朱槛,繁花照羽觞。泉归沧海近,树入楚山长。荣贱俱为累,相期在故乡。”^{[2]601}《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二首》之二则情理兼容:“无能常闭阁,偶以静见名。奇姿来远山,忽似人家生。劲色不改旧,芳心与谁荣?喧卑岂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韵动竽瑟,谐此风中声。”^{[2]601-602}《柳州寄丈人周韶州》有创作主体的人生追求,也写出心灵哀怨与感伤之深:“越绝孤城千万峰,空斋不语坐高舂。印文生绿经旬合,砚匣留尘尽日封。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鲛鳙。丈人本自忘机事,为想年来憔悴容。”^{[2]599}以生活意象入诗,诗中的物象都是诗人着意选择而又被心灵化了的产物,贯注主体的主观情志,这是人向自然所作的情感移入。“越绝”二字奠定基调,入笔便有波澜;“孤城”则强化感受,渗透生活体验。印文早已生绿,而砚匣更是留尘。远望梅岭,烟雾笼罩,下观桂江(即柳江),总是鲛鳙偶露,颇富层次感。

《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其二是柳集中唯一的一首六言诗,诉说返回长安后的复杂情绪:“一生判却归休,

谓著南冠到头。冶长虽解纆绁,无由得见东周。”^{[2]596}

柳宗元与刘禹锡相知最深,20多年的书信、诗歌往来,心神契合,而相比其他类型作品,酬赠诗的区隔不甚明显。以见证交往双方的坚贞友谊而论,柳宗元与刘禹锡之间建立了最为深厚稳固的情谊,心腕交印,是士人保持终身之谊的理想典范,应该也是两人共同选择的结果,这在两人的酬赠诗中可作鉴评。这些浸透真实感受的诗句,超越单纯的友谊叙写,无形中成为中唐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去中心化的标志性样本之一。这些诗歌创作固然总体上还是属于刘、柳之间非自觉的活动,但能超越地域,影响传统文化地带迁移,形成诗坛格局的多元化,在文学地域观念相对淡薄的唐代显得珍贵。现在,需要回归文学创作现场以观察其原生态。诗人早年与刘禹锡等芟除社会积弊,革故鼎新,希冀对社会有所裨益,但伟业难成,屡遭迁谪,远放蛮荒,一步步偏离都市主流文人文化,且含冤莫辩,荷负许多不该由他们来承受的人生苦痛。面对不尽摧残,柳宗元没有阿世取容,而是砺节守正,表现出抗争精神,同时也进行自我反思,心多感触,探求悲剧的体验以及人生本身的存在意义,最后凝华为《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2]596}我国早就有把贬逐作为政治惩罚的严酷手法。异地别友亦送友,不作沉沦之状,便觉阔大。诗歌以动态结构传递出诗人酸楚而又坚毅的心理感受,饱尝种种人生况味的心路历历如绘,浸透了忧患感和现实感,成为社会政治的直接表现,视野更是直入历史纵深,文化意味浓厚。再次远贬,友朋星散,不禁勾起诗人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想,也强化了其社会洞察力,使诗人对世道险恶的认识更为透辟。诗歌在时间变迁中蕴藏着深沉情绪,后以谛视人生贯穿,是审美情境的自然升华。作品引发刘禹锡的情思,作《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4]在诗篇中多显出超然姿态与刚强自信的刘禹锡,出语也不再豪纵,而是显得老成凝重。柳宗元得刘诗后有感而发,再作《重别梦得》,语意有所联结,但已经

变换句式:“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2]597}诗人非一味怨尤不满,叹老嗟卑,而是表达了以友情为人生理想归宿的夙愿,透出坚贞之志与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有真率之味。诗人一语道尽政治仕途上的苍狗白云,视野宏通,期待排遣孤独感。诗人感到意犹未尽,也为了充分表达深情厚意,作《三赠刘员外》,将家国身世之悲深入淡出,简笔勾勒眼前景与心中事,拓开诗境:“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2]597}诗人在失意的境遇中体验和审视着新的情谊,也在更高层次上丰富着对友情的认识,在往复赠答中表白心迹,落其华而存其实。在交通、通信都十分不便的社会条件下,亲友之间一旦离别,能否得以重聚以及何时才能再聚,都难以把握。事实上,刘柳日后确也再无相见。两人就各自立场,对谪宦生涯尤其是二次贬逐发表评论。柳宗元的三首诗好似命运主题交响曲,情感层层深入,抒发了人生苦悲与希冀,创作主旨得到深刻与完整的体现,情韵缠绵,耐人寻味。这一创作范式是对杜诗的发展,颇为后人所效法。

《答刘连州邦字》是到达柳州后酬谢刘禹锡之作,阐述苦难时代的生命意义:“连璧本难双,分符刺小邦。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负弩啼寒狖,鸣枹惊夜猿。遥怜郡山好,谢守但临窗。”^{[2]600}“连璧”之喻,直入主旨;“本难双”写出两人聚少离多的现实,浅貌深衷,感慨无限。“寒狖”“夜猿”,凄凉意自在其中,显出诗人心境悲苦。诗人最后希望刘禹锡属意山水,寄托深微。可见友朋之间相互酬赠,认识人我之间异同,取长补短,互为影响,也能促进诗意的成熟与完美,拓宽诗歌作为主体文学样式的抒情言志功能。

与元和期间其他诗人关系中,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虾蟆虽水居,水特变形貌。强号为蛙哈,于实无所校。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皴。跳踯虽云高,意不离泞淖。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周公所不堪,洒灰垂典教。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巨堪朋类多,沸耳作惊爆。端能败笙磬,仍工乱学校。虽蒙勾践礼,竟不闻报效。大战元鼎年,孰强孰败挠。居然当鼎味,岂不辱钓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黎豹?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5]韩愈诗歌本来就险为绝,此诗不改昌黎本色,略显艰涩之风。柳诗已佚,难知详情,

但柳宗元有《与退之论史官书》等其他作品。与柳相比,韩愈诗歌很少反映贬谪地特征。柳宗元与白居易之间没有直接的酬赠诗篇,也少有白氏的“闲居”诗。柳宗元仅《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提及元稹,元稹则有《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涉及柳宗元。总之,唐人交友选择及其所具有的道德内涵值得现代人审视与反思。

柳宗元笃于友道,诗歌植根于人生体验,反映生存环境和心态变化,倾注了被贬中的抗争及挣扎,在大历之后坚持风雅精神,永、柳之间的酬赠诗也发生变化,这与自我认识逐步成熟与不作自我复写的艺术取向有关。柳州期间,诗人更加感悟绝不俯仰于时的精神,笔触亦有新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于细处用大笔,感伤情调浓郁。

三、柳宗元酬赠诗的文化意义: 地带迁移

文学在接受过程中总是带有时代记忆。酬赠诗始兴于六朝,唐代更为繁盛,情感言说更加细密且注重个体性。柳诗在实现交际性的同时展示了学问的富博宏深,也评议时事,较好地解决了创作中容易出现空疏问题,形态要素具足,其中的真实经验、生活细节、叙议结合等都影响后世,是宋以后以学问为诗活动或倾向的一支近源。换言之,柳诗是艺术发展的正道之一,比较适合作为向上溯其文化渊源、向下发现继承现象的文学样本。

柳诗展现了与佛道人物深入交往的文化史实。如《闻彻上人亡寄侍郎杨丈》:“东越高僧还姓汤,几时琼佩触鸣珰。空花一散不知处,谁采金英与侍郎。”^{[2]607}从历史上的东越高僧惠休(彻上人与之皆汤姓)切入,在这样的场域中比较合理,起句有奇致,信笔写去便成佳作。又如《韩漳州书报彻上人亡,因寄二绝》。其一:“早岁京华听越吟,闻君江海分逾深。他时若写兰亭会,莫画高僧支道林。”其二:“频把琼书出袖中,独吟遗句立秋风。桂江日夜流千里,挥泪何时到甬东。”^{[2]606}诗歌触发而兴,先凭记忆叙述构成,又援引前代形象以展意驰情,不为空言高论。把生命的时间感转化为流动的空间感,将形象化词语融进物是人非的情怀。又如

《赠江华长老》:“老僧道机熟,默语心皆寂。去岁别春陵,沿流此投迹。室空无侍者,巾屦唯挂壁。一饭不愿馀,跼蹐便终夕。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满庭芳草积。”^{[2]585}诗歌首先颂扬长老精熟佛理,心静如水,秉性高洁,但重心不在倡明教义;然后点出长老远来永州的时间。日常生活状况的叙写,由细微处着笔,是对主人公随遇而安、别无所求的精神状态的形象展开。诗人避免情绪的直接叙说和倾泻,而是融情思于客观景物的描写中。“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二语以物写人,以动衬静,细腻传达出主人公的真寂境界,达到精神品格与艺术品格的圆融统一,也是自身山水文学精工刻肖的风格渗透到诗歌领域的结果。

《雨中赠仙人山贾山人》品出人生真味,蕴蓄着对人生的失望与悲痛,后接以自我解嘲而显出意趣,穿透万象,实现诗歌格调与描写对象精神的统一:“寒江夜雨声潺潺,晓云遮尽仙人山。遥知玄豹在深处,下笑羈絆泥涂间。”^{[2]603}《摘櫻桃贈元居士,时在望仙亭南樓与朱道士同处》也是别开生面:“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儿。”^{[2]608}

《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置于佛禅语境中,以茶为媒,自生眼目,感受新颖,物我化一,是唐代较早以茶(茶道)为主题的诗篇之一,注入时代内涵,文化学上的意义也许更加突出:“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蒸烟俯石濑,咫尺凌丹崖。圆方丽奇色,圭璧无纤瑕。呼儿爨金鼎,馥馥延幽遐。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咄此蓬嬴侣,无乃贵流霞。”^{[2]586}

柳宗元也与更多的友人对话,不再一一赘述。酬赠诗最没有价值的就是完全工具化,文情皆空。柳诗则无此弊,师法前人而求变,各体都有所成,结构上进一步破除程式化,诗题上也有一定新创。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四认为:“长题如小序,始于大谢,少陵后尚有柳州、杜牧之、李义山诸家。”^[6]柳宗元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等长题技艺明显接武杜甫,长题写长诗而成为叙情长篇,又具备很强的叙事因素,袭故弥新。

初到贬所,得人匡助,自致谢意,《酬娄秀才

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便是这样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的地域指向。综合诗文等创作而言,柳宗元是楚地最终育成湖湘文化的重要开启者之一。柳宗元饱谙世态,《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把感受到的情绪凝练为诗,深挚动人,是赠答酬别之作中的上品:“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谬委双金重,难征杂佩酬。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2]584}此诗吐露肺腑,情真意厚,其中“壁空”一联,道他人之所未道,不着感伤色调而韵味全出,出神入化,深得后人称赏。苏轼推尊陶柳人所共知,《书柳子厚诗》自叙:“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龙川信,寄此纸试书此篇。”^{[7]48}

柳宗元有着对抗政治与文化权势的实践,却意外促进本为地理阻隔的边远地区——永州、柳州的文化开发,使得这些谪居地的文学乃至整体社会文化底蕴有所改善,地域风物较为充分地展开,文化基因渐趋丰饶。本为僻远小郡的永、柳二州多被人视作畏区,因子厚的到来一度成为有影响力的新兴文学基地。这从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等都可以得到印证。在柳宗元心中,写作也许是另一种政治践行,他改写了人们对南楚与粤西等地的述说方式。《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在柳、衡二地的联结与比较中以劝慰友人,强调自己所处更属南荒:“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非是白蘋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2]600}《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既直书“象县”,又有更具体的“破额山”,使得桂地山水与风物展露无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2]608}这种展示又以《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最为显明:“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2]591}诗歌深入呈现内心世界,却以富有特征的粤西地貌而出,同时突破山水与愁思的表象化认知,可以理解为全新的文化实验。苏轼《书柳子厚诗》中肯定其写实艺术:“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旁诸峰,真如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7]46}虽然两诗中的“海山”南北悬隔,也写作于不同世代,但两者的关联度是极为清晰的。在《对韩柳诗》中又化用出“割愁还有剑铓山”的诗

句^{[7]47-48},可见柳诗对苏轼影响之大,无愧于一生叹服。略晚于苏轼的黄翰《祭柳侯文》中“一麾出手,惠此南方。……翰幼学公文,久服余芳”^{[7]140-141}乃为点睛之笔,肯定了柳宗元对南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贡献。这里的“文”,应该包括诗,柳子是诗文同光。

结 语

即使到了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之时,柳宗元仍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充溢其间,早已没有了一切文化臆想,而是将精神意绪熔铸成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超越文学流派纷争,成为新的地方社会文化景观与诗史上光辉的存在,值得人们为此作出深度解读。与时陷陈腐俗套的书牋文相比,柳宗元酬赠诗不循旧途,自立门户,有生命质感,承载着丰厚的文化精神,自具超越文本存在的价值。柳宗元研究领域仍然存在失衡情形,重文而轻诗,这一状况应该改变。但也必须指出,柳宗元酬赠诗还没有达到足以争夺话语权的高度。宪宗朝固然出现中兴气象,但难掩盛世转衰的本质,这是文学发生变异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缘由。盛唐气象已过,诗人又百忧丛集,以愁苦之眼观大千万物,也等不到谪籍结束的时刻。因此,柳宗元的诗歌缺少杜诗的持论正大、格局宏远等。这是与开元盛世文学不可企及的差异与距离。

综上所述,柳宗元是中国文化史上崇道、重情、讲艺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一。十四年的外放生涯玉成了柳宗元,使他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均有着较大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俞陛云.诗境浅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49.
- [2]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国书店,2000.
- [3]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8.
- [4]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26.
- [5]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钱仲联,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138-1139.
- [6]陈衍.石遗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18.
- [7]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下转第55页)

汉韩维度形容词“大/小”语义扩散路径比较

张则顺

(武汉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汉语维度形容词“大/小”的语义由二维、三维空间扩散至一维空间和无维度的数量、力量、强度、程度、可能性等方面。“大/小”意义扩张的路径主要通过空间隐喻来实现。汉语作为一种空间性特征凸显的语言,优先采取空间视域对事物进行具象编码的认知策略。“크다/작다”意义扩散的路径跟“大/小”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汉语使用者凸显空间特征、注重整体性思维、偏爱外部体验视角的认知特点导致“大/小”语义扩散程度更深,范围更广。

关键词:大/小;크다/작다;空间隐喻;意义扩散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8

跨文化交际中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同样是表达外面雨下得很大,汉语中说“雨下得很大”,韩语中说“비가 많이 내린다(雨ga多下da)”,而英语中却说“It rains very heavily(雨下得很重)”。我们很难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找到两个完全对应的词,即使像“大/小”这样简单的词,虽然基本语义一样,但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和搭配对象,在使用中凸显不同的语义特征。

当留学生对汉语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之后,会发现曾经觉得简单的一些词并不是那么简单了。维度形容词“大/小”,在跟一些具体名词搭配时很容易理解,如“大房子、小房子、大眼睛、小眼睛”等。然而“气味很大、密度很大、进展很大、影响很大、脾气很大、意见很大……”等说法,不少留学生表示很难理解:气味不应该是浓和淡吗?密度难道不是高和低吗?至于“进展、影响、脾气、意见”这些抽象的事物如何能用“大/小”来衡量呢?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上述疑惑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汉语维度形容词“大/小”究竟能跟哪些名词搭配?这些名词在语义上有什么共同点?“大/小”搭配范围是如何从具体名词认知域投射到抽象名词认知域的?汉韩维度形容词跟名词搭配时有哪些

共性和差异?这些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有趣的民族文化?

一、汉语的维度表达系统

自然世界中存在一维的线性空间、二维的平面空间和三维的立体空间,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自然语言中也存在用来度量和描述一维线性空间的形容词,如“长/短”“高/矮(低)”“深/浅”“远/近”;度量和描述二维的平面空间的形容词,如“宽/窄”“厚/薄”“粗/细”“大/小”以及度量和描述三维立体空间的形容词,如“大/小”等。

汉语的维度形容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们都是成对的、高频的单音节形容词。“长/短”“高/矮(低)”“深/浅”“远/近”“厚/薄”“宽/窄”“粗/细”“大/小”都是由意思相反的正向、负向两个形容词组成,其中正向形容词的出现频率大大高于负向形容词。第二,某个维度如果存在几组度量和描述的形容词,那么它们凸显的方面会有细微的差别。“长/短”“高/矮(低)”“深/浅”“远/近”都用来描述一维的线性空间,但凸显的方面不同:“长/短”和“远/近”是

收稿日期:2025-06-31

基金项目: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413000005);2018年度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推广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张则顺(1978—),女,湖南武冈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和对外汉语教学。

从横向角度来考虑的,而“高/矮(低)”“深/浅”则是从纵向角度来考虑的。“长/短”可用于度量物体的水平线性长度,而“远/近”则专指路程、距离方面。“高/矮(低)”凸显水平面之上的线性长度,而“深/浅”凸显水平面之下的线性长度。度量和描述二维平面空间的四组维度形容词“宽/窄”“厚/薄”“粗/细”“大/小”也各有侧重:“宽/窄”凸显平面空间水平方向长度;“厚/薄”凸显平面空间垂直方向长度;“粗/细”凸显圆形截面的面积大小;“大/小”是从整体上描述事物的面积。第三,存在跨越维度的形容词,如“大/小”既可以度量二维空间的“面”,也可以度量三维空间的“体”,有时还用来度量一维空间的“线”。

此外,汉语中还有成对出现的无维度单音节形容词,如“多/少”“好/坏”“浓/淡”“轻/重”“强/弱”等。这些形容词主要用来度量事物在数量、性质、浓度、重量、强度等方面的特征。汉语的维度形容词和无维度形容词有时会出现混用的情况:如“气味很大”其实指的就是“气味很浓”;“声音很大”就是“声音很强”。

在所有的维度形容词中,“大/小”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们是唯一一组跨越一维、二维和三维空间的维度形容词,同时也是使用频率最高并跟其他维度形容词以及无维度形容词有着复杂纠葛的一组词。田美花(2006)指出汉语的“大/小”不仅跟韩语的“크다/작다”对应,而且“大”还跟韩语的“넓다/좁다/길다/왕-/말-/한-”对应,“小”跟韩语的“좁다/잘다/짧다/애-/꼭-/손-/아지”对应,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体现了汉语“大/小”意义的广度以及“大/小”“크다/작다”意义发展的不平衡性^[1]。袁毓林(1999)在讨论汉语的多层定语时敏锐地发现,“大/小”类形容词表示单纯的极性对立,只有两个对立项,而“高/矮”类形容词除了表示极性对立外,还包含维度对立,因此有多个对立项^[2]。前贤的研究指出了在汉语中“大/小”较之其他维度形容词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对其意义分布,尤其是扩散路径讨论得还不够充分。我们试图从“大/小”的具体搭配出发,通过分析与之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特点,来窥探维度形容词“大/小”在语义地图中的覆盖情况,进而探讨其语义衍生的路径。

二、维度形容词“大/小”的高频搭配名词

在研究形容词意义时,考察与之搭配名词的

范围和语义特点是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手段。形容词的语义内容越广,那么与之搭配的名词的范围也就越广。我们对“大/小”意义的研究也从与之搭配的名词入手。“大/小”作为一个成词语素,跟其他语素结合组成词语的能力非常强,为了避免干扰,选择“很大/很小”在CCL语料库中进行搜索,试图通过与“很大/很小”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特征来窥视“大/小”在语义上的广度。由于“很大/很小”跟名词搭配的语料是海量的,难以穷尽性分析,因此本研究调查分析了前500条,以期发现一定的规律。

(一)跟“大”搭配的名词情况

根据对这500条语料的调查发现,与“很大”搭配的名词多达152个,这些名词中包括少量占据一定空间的具体事物名词,更多的是很难用面积或体积来度量的抽象名词。具体名词如“蛋糕、树、河水、市场”等,比例非常低,约占7.6%;抽象名词如“程度、影响、作用、帮助”等,所占比例相当高,约92.4%。与“大”搭配的抽象名词总体上呈离散状,但某些特定语义的名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聚合。其中高频出现的一类是表示距离意义的,包括“差异、差别、差距、距离”等,还有一类是带有“量”“力”“度”“值”“性”等准后缀的抽象名词。与“大”搭配的排名前20的高频名词(见表1)。

表1 与“大”搭配的高频名词

排名	名词	频次
1	程度	97
2	影响	50
3	差异	31
4	变化	20
5	不同	16
6	作用	15
7	差别	13
8	部分	13
9	帮助	11
10	发展	10
11	压力	9
12	差距	8
13	分歧	7
14	比重	6
15	可能性	6
16	距离	6
17	关系	6
18	相关性	5
19	工夫	5
20	贡献	5

跟“很大”搭配的高频名词并不是具有空间维度特征的具体名词,反而是不具备空间维度特征的抽象名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程度”,高达97例,在这些语料中“很大”无一例外地作定语修饰“程度”,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语块“在很大(的)程度上”,“高”和程度搭配时常常做谓语,形成明确的分工。

(二)跟“小”搭配的名词情况

本研究调查了500条包含“很小”的语料,其中跟“很小”搭配的名词或代词多达174个,与之搭配的名词既包括具体名词也包括抽象名词,据统计跟“很小”搭配的具体名词约占15.8%,抽象名词约占84.2%。与“小”搭配的排名前20的高频名词(见表2)。

表2 与“小”搭配的高频名词

排名	名词	频次
1	世界	54
2	年龄 ^①	38
3	可能性	29
4	胆子	21
5	几率	19
6	雪	17
7	心	15
8	体积	13
9	数量	13
10	希望	11
11	概率	9
12	力量	8
13	声音	8
14	城市	7
15	差距	6
16	身材	6
17	范围	6
18	影响	5
19	规模	5
20	作用	4

跟与“大”搭配的名词进行对比,相同之处在于跟“小”搭配的抽象名词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最高频搭配的前20词中,抽象名词依然占绝对优势;不同之处在于与“小”搭配的名词中具有空间维度意义的具体名词的比例更高、范围更广。其中“世界、雪、城市、身材”等具体名词的搭配频率还上榜高频搭配前20。

从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大/小”的语义非常广,既包括具有维度特征的具体事物和抽象事

物,也包括不具备维度特征的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在具有维度特征的事物中,既包括具有平面或空间维度特征的具体或抽象事物,也包括具有线性维度特征的具体或抽象事物,可谓是包罗万象。可以提取出三组语义特征:具体和抽象的对立;维度特征和非维度特征的对立;在维度特征内部是平面/立体维度特征和线性维度特征的对立。

作为表示二维平面空间和三维立体空间的维度形容词,“大/小”跟[+平面/立体][+具体]名词搭配是最基本、最具有原型特征、最容易被理解的。如“大汽车、大房子、大操场、大个子、大眼睛……”等,这类搭配大多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共同的认知策略,理解难度最低。[+平面/立体][-具体]的名词不多,包括“面积、体积、容积、框架”等,这类名词抽象程度更高,它们和“大/小”搭配也比较容易理解。

另一类具有维度特征的词是[-平面/立体][+线性],它们不具备平面或立体的空间维度特征,而只具有一维的线性空间,如“距离、差距、分歧、差异、差别、不同”等。“距离”是本身具有线性维度特征的抽象名词;“差距、分歧、差异、差别、不同”本身不具有线性维度特征,但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通过隐喻的方式把它们处理为两个事物的距离,从而具备了线性维度特征。“大/小”能跟具有线性维度特征的名词搭配,说明“大/小”的语义广度不仅跨越二维平面空间和三维立体空间,更是扩展延伸到了二维线性空间。三个维度的形容词在跟一部分名词搭配时出现交叠或两可的情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维度形容词“大/小”的语义广度不断扩展。

让我们惊讶的是,跟“大/小”搭配的最高频名词却不是上述具有维度特征的名词,而是大量的非维度名词。仔细观察我们统计的最高频出现的20个名词,就会发现这些高频词除了上述具有线性维度特征的几个名词之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标记的,带有“力、度、量、值”等准后缀的名词,一类是没有标记的,如“影响、作用、帮助、发展、关系、工夫、贡献”等。

第一类有标记名词,在可描写的词库意义中凸显了“量”的含义,对于一部分抽象名词“量”体

^① 在统计中,不只统计了名词“年龄”跟“很小”的搭配,还统计了大量的“XX(某个人)很小”这样的语义上表示年龄的情况。

现为数量,对于另一部分抽象名词“量”体现为程度。包含后缀“力、度、量、值”的抽象名词主要凸显数量的意义,包含后缀“性”的抽象名词主要凸显程度的意义。在汉语中表示数量、程度的意义的形容词有很多,如“多/少、高/低、强/弱、浓/淡”等,它们分别可以和不同的名词搭配。此外,汉民族语言社团还赋予“大/小”极大的活动领域,几乎横贯所有的表示数量、程度的名词。从抽象的层面来看,空间的大小跟数量的多少、程度的高低本身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有“量”的含义,其语义是相通的。这就为“大/小”的语义从空间延伸至数量、程度提供了可能。

第二类无标记名词如“影响、作用、帮助”等,它们为什么也可以跟“大/小”搭配,且出现频率还特别高呢?Talmy(2000)提出了基本空间图式系统假设(Hypothesis of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Spatial Schemas),该假设认为人类头脑中都会存在一个由基本空间元素范畴组成的基本空间图式系统,该系统使得空间的各种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意象图示投射到抽象思维的领域^[3]。王文斌(2013)提出英汉时空性假设,他认为汉语具有空间性特征,也就是说汉语在空间性思维的影响下,采取空间视域对事物进行具象编码的认知策略,从多维视角对事件结构进行空间化表征^[4]。汉语社团对于这些难以描述的抽象名词采用的认知策略是抽象事物空间视觉化,通过隐喻的方式把这些抽象事物当作占据一定空间大小的具象。表3是“大/小”占据的语义空间图。

三、韩语“크다/작다”搭配研究及“大/小”“크다/작다”意义扩散比较

空间的体验与认知是人类与外在世界最为基础的互动活动之一,空间感知在人类对世界进行

具象表征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上文已经阐述汉语的基本空间维度词“大/小”是通过空间隐喻的方式实现了语义扩张。韩语的“크다/작다”对应汉语的“大/小”,这两个词也属于韩语中的高频词,接下来我们通过语料调查来分析“크다/작다”的意义扩张情况。

(一)韩语“크다/작다”搭配情况

韩语语料主要来自 RISS 语料库,“크다/작다”跟名词搭配的语料同样数量巨大,本研究调查分析了跟“크다/작다”搭配的各 500 条语料。跟“크다”搭配的韩语名词多达 117 个,其中抽象名词占 84.3%、具体名词占 15.7%;跟작다搭配的韩语名词多达 106 个,其中抽象名词占 74.2%、具体名词占 25.8%。“크다/작다”最高频搭配的前 20 个名词见表 4。

韩语维度形容词“크다/작다”和汉语维度形容词“大/小”在名词搭配方面表现了高度的相似性:与之搭配的名词的范围都非常广,与之搭配的抽象名词的比重较之具体名词更高,其意义扩散的路径有着高度相似性,但是扩散的程度及扩散的具体领域却存在一定差异。

(二)“大/小”“크다/작다”语义扩散共性和差异

汉韩维度形容词“大/小”“크다/작다”意义扩散路径都是从人类的空间体验和感知出发,通过构建空间认知隐喻对客观世界进行具象表征,进而通过投射、迁移等方式将空间概念扩散到相邻领域,从而实现了意义的扩张。“大/小”“크다/작다”意义扩散的路径都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空间到时间、视觉到其他感知觉、概念意义到程序意义等发展路径。总的来说,它们意义扩散路径一致,但进程不同步,侵占的相邻语义空间存在差异。下面将结合具体到抽象、空间到时间、视觉到其他感知觉、概念意义到程序意义这四条扩散路径具体分析其意义扩散的共性和差异。

表3 “大/小”所占据的语义空间

具体事物			抽象事物		
维度特征(+)		维度特征(-)	维度特征(+)		维度特征(-)
平面/立体	线性		平面/立体	线性	
汽车、房子、操场、 国家、个子、眼睛、 蛋糕、窗户、气球……	/	风、雪、雨、雾、 喷嚏……	面积、体积、 框架	差异、差别、 分歧、距离	影响、作用、帮助、年龄、 声音、强度、浓度、力度、 数量、程度、可能性……

表4 与“크다/작다”最高频搭配的前20个名词

与“크다(大)”搭配的名词			与“작다(小)”搭配的名词		
排名	名词	频次	排名	名词	频次
1	가능성(可能性)	62	1	가능성(可能性)	88
2	책임(责任)	26	2	신체(身体)	60
3	위험(危险)	25	3	도량(器量)	33
4	기대(期待)	21	4	면적(面积)	31
5	영향력(影响力)	20	5	효과(效果)	20
6	부담(负担)	19	6	소리(声音)	18
7	작용(作用)	18	7	손실(损失)	14
8	온도차(温差)	17	8	사이즈(尺码)	13
9	효과(效果)	15	9	작용(作用)	11
10	면적(面积)	15	10	규모(规模)	10
11	규모(规模)	13	11	체중(体重)	10
12	의의(意义)	10	12	공간(空间)	9
13	키(个子)	10	13	수량(数量)	9
14	소리(声音)	8	14	영향(影响)	8
15	실망(失望)	8	15	위험(危险)	6
16	타격(打击)	8	16	힘(力量)	5
17	이익(利益)	7	17	차이(差距)	4
18	신체(身体)	6	18	비중(比重)	3
19	고통(痛苦)	5	19	오차(误差)	3
20	착오(错误)	4	20	경쟁(竞争)	3

1.“具体→抽象”路径上的共性和差异。“大/小”“크다/작다”最基本的概念意义都是较为具体的空间、面积。人类对空间、面积的体验一般通过视觉即可感知。从空间感知出发,通过隐喻的方式向更加抽象的数量、力量、规模、程度方面扩张。《现代汉语词典》把“大/小”的语义概括为“形容体积、面积、数量、力量、规模、程度等方面超过(不及)一般或超过(不及)所比较的对象”^[5]。《标准国语大辞典》把“크다/작다”的语义概括为“人或事物的体积、面积、长度、高度、周围、规模等超过(不及)一般的程度”^[6]。从两本词典的注释来看,“大/小”“크다/작다”的语义扩张都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物理空间可以通过空间隐喻延伸至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意义发展过程。“大桌子、大房子、大城市”体现的是物理空间,那么“很大的发展、很大的名声、很大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空间,“很大的脾气、很大的胆子、很大的肚量”体现的是心理空间。

较之占据空间小的人或物,占据空间大的人或物具有显著性的特点。由于显著性这种关联,其他抽象认知领域中具有显著性特点的事物也对“大”开放了通道:数量多→数量大;力量强→力量大;程度高→程度大;气味浓→气味大;声音高→声音大……汉语的“大”和韩语的“크다”都发展了“显著、突出、重要”的意思,相对应的“小”和“작다”也相应地有“不显著的、不突出的、不重要的”意义,如“大人物/小人物、大问题/小问题、很大的成绩、很小的错误”等。

跟“大/小”“크다/작다”搭配的抽象名词大大超过了具体名词,可见它们都在从具体到抽象的扩散路径上走得很远。但两相比较,汉语中“大/小”的意义广度还要更大一些,汉语中可以说“太阳很大、气味很大、脾气很大”用来指太阳光线强、气味浓郁、个性强等,但对应的韩语表达一般用강하다(强)。此外,汉语中“大/小”用来表示程度高低,早年有“大/小”修饰动词的用法如“大吃一惊、小有名气”,近年来更是出现了修饰

形容词的用法如“小郁闷、小欢喜、小确幸”,这些用法在韩语中尚未见到。说明和韩语的“크다/작다”比起来,汉语的“大/小”侵占了更多的相邻语义空间。

2.“空间→时间”路径上的共性和差异。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都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概念,对时空的认知体验是人类认知理解客观世界的基础。时间体现的是世界的变化和过程,对时间概念的把握常常要依赖于空间隐喻系统。Clark(1973)将时间的隐喻分为“时间在动”隐喻系统和“自我在动”隐喻系统,说明人们是如何通过空间隐喻来理解时间的^[7]。

“大/小”“크다/작다”也以空间的概念意义为起点发展了时间意义,因此“大”有了时间长,“小”有了时间短的意义。无论是汉语还是韩语都把月份分成了“大月”和“小月”,大月有31天,而小月等于或小于30天。

汉语在空间到时间的扩张线路上走得更远。汉语中的“大”有时间更久远的意思,指的是过去或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距离现在的参照时间更远。如“大后天”指后天的下一天,“大前天”指的前天的前一天,甚至还有“大大后天、大大前天”的说法,都是距离今天更远的时间。汉语的“小”有某段持续时间不长的意思,如“小住几天、小睡一会儿”,此外,“小”带上整十的数字,如“小二十年了”表示接近二十年了,这些用法都是韩语中没有的。

3.“视觉→其他感知觉”路径上的共性和差异。空间信息主要通过视觉来感知,“眼见为实”,在人的五种感觉中,视觉感知是最普遍、最常用、最方便用语言描述的。因此,将其他感知觉信息视觉化是一种重要的认知策略。“大/小”“크다/작다”由可视的空间概念意义扩展到相邻的其他感知觉领域,如听觉、嗅觉等。

汉语在描述声音强弱时可用“大/小”,与之对应的韩语用“크다/작다”。声音的大小是通过耳膜感知声波振幅的大小和频率,振幅越大声音越强,频率越快声调越高。在汉语和韩语中“大/小”“크다/작다”的语义从视觉领域投射到了听觉领域。

汉语在视觉到其他感知觉的扩张线路上走得更远,不仅扩张到听觉领域,还扩张到嗅觉领域,“气味很大、味道很大”都是涉及嗅觉的。在韩语中“크다/작다”在这条路径上的扩散目前止步于听觉

领域。

4.“概念意义→程序意义”路径上的共性和差异。Blakemore(1987)认为语言形式可以编码为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和程序意义(procedural meaning)^[8]。概念意义指话语的语义表征或命题意义,为话语理解提供语义信息输入。程序意义与话语理解中的推理有关,对推导话语的含义或交际意义起制约作用。从概念意义到程序意义的发展是语法化的必然路径,是语义虚化的过程,体现了语言从意义功能向人际功能的转变。

在汉语中,维度形容词“大/小”不仅在概念意义上不断扩张和延伸,同时也发展了人际交互意义——敬称和谦称的用法。敬称和谦称的发展跟 Leech(1983)提出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有关^[9]。礼貌原则的赞扬准则要求说话人尽量对别人少贬损多赞誉;而谦虚准则要求说话人尽量对自己少赞美多贬损。赞扬准则发展出语言中的敬称,谦虚准则发展出语言中的谦称。正向维度形容词“大”,由空间意义发展出“显著的、杰出的、优秀的”,在汉语文化背景中,“大”的就是好的,“大”就是一种赞美,进一步发展为敬称,如“大作、大驾、大名”中的“大”,概念意义已经淡化,而敬称的程序意义则被凸显。与之相对应的,负向维度形容词“小”,由空间意义发展出“不重要的、不突出的、意义不大的”。在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中,“小”是负向评价,进一步发展为谦称,“小店、小文章、小小的建议”中的“小”未必真的小、不重要、不突出,而仅仅是说话人的谦称而已。

“大+时间词(的)”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宋玉柱(1994)认为“大过年的”“大星期天”中的“大”的意义不在于说明大小,而在于强调其(某个时间)重要性或特殊性^[10]。“大”的评价功能并不是由“大+时间词(的)”孤立完成的,而是跟后续句子连在一起,共同构成认知上的“时间-事件”匹配模型。“大”从空间维度的概念意义发展出强烈的人际评价功能。

在韩语中,“크다/작다”尚未发展出敬称、谦称的用法以及评价功能。说明汉语在从概念意义到程序意义这条路径上发展得更深入、更彻底。

(三)“大/小”“크다/작다”语义扩散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大/小”“크다/작다”语义扩散遵循着共同

的路径,体现了人类语言和认知发展的共性;同时其语义扩散的表现又存在某种差异性,体现了不同民族思维习惯的不同和认知策略的差异。

1.从认知偏好看。汉语是一种空间性特征凸显的语言,在空间性思维的影响下,汉民族对体现空间概念的意象结构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在对事件及事件要素进行表征时,善于凸显事件所关联的空间,优先采取空间视域对事物进行具象编码的认知策略。比如“睡觉”这个事件,主要凸显持续时间,汉语使用者习惯把持续时间映射为空间具象,因此可以说“小睡了一会儿”,而韩语使用者对空间概念的意向结构依赖性没有那么强,因此在语义扩散的路上没有走得那么远。

2.从思维方式看。汉民族注重整体性思维,相对而言韩民族则更注重分析性思维。这就解释了论文开头提出的现象,为什么汉语说“雨下得很大”而韩语却说“雨下得很多”,这是因为汉民族把“雨”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象,而韩民族在思维中颗粒度更小,把“雨”看作可以分割的具象集合。类似的例子很多,“雪”“年龄”也是如此。汉语中说“人年龄可以说‘她多大了?’”韩语中却只能说“她多少岁了?”汉语中说“他的年龄比我大”,韩语中却说“他的年龄比我多”,细究其原因,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汉民族习惯把年龄看作一个整体具象,而韩民族把年龄看作一个具象集合。

3.从体验角度看。汉语使用者偏爱外部体验视角,从主体的感知经验出发,优先用视觉感知空间具象,具有更强的主观性;韩语使用者具有更多的内部体验视角,从客体的物质属性出发,更多地采用其他感知方式凸显客体自身的属性。汉语中说“太阳很大”“早上的雾很大”,韩语中说“太阳很强”“早上的雾很浓”,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但韩民族凸显太阳的客体性质——光线很强,雾的客体性质——很浓;而汉语使用者凸显主体的感受,忽略客体的自然属性。韩语使用者综合运用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多种知觉方式来感知事物的自然属性如“强”“浓”,而汉语使用者优先运用视觉将客观事物抽象为整体的、可视化的空间具象进行感知,以自

我的空间体验为基础进行表达。

结 语

汉语的“大/小”和韩语的“크다/작다”都是两种语言中最基本的维度形容词,其基本语义都包括了二维的平面空间和三维的立体空间。它们都通过空间隐喻的映射机制,以一种统一和协调的方式向一维的线性空间和无维度的数量、力量、强度、程度、可能性等方面投射,由此建立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复杂概念范畴。

“大/小”意义扩张的路径和“크다/작다”意义扩散的路径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遵循具体到抽象、空间到时间、视觉到其他感知觉、概念意义到程序意义等发展路径。但在语义发展过程中受到认知偏好、思维方式和体验角度等因素的影响也呈现了一定的差异性。汉语使用者在对事物进行认知和编码的过程中,空间特征凸显、注重整体性思维、偏爱外部体验视角,这是“大/小”语义扩散程度更深,使用范围更广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田美花.汉韩空间维度词“大/小”的语义对比[D].延吉:延边大学,2006.
- [2]袁毓林.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J].中国社会科学,1999(2):185-201.
- [3]TALMY L.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M].Cambridge, MA:MIT Press,2000.
- [4]王文斌.论英汉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时空特性:从Humboldt的“内蕴语言形式”观谈起[J].中国外语,2013,10(3):29-36.
-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38,1439.
- [6]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EB/OL].(2025-05-02)[2025-05-20].<https://stdict.korean.go.kr>.
- [7]CLARK H. H.Space, Time, Semantics, and the Child[J].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1973:27-63.
- [8]BLAKEMORE D.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M].Oxford:Blackwell,1987:144-145.
- [9]LEECH 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9-16.
- [10]宋玉柱.“大”的区别词用法[J].中国语文,1994(6):447.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Semantic Diffusion of Dimensional Adjective "big (大)/small (小)"

Zhang Zesh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Chinese dimensional adjective "big (大)/small (小)" spreads from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o one-dimensional and dimensionless elements, such as quantity, power, intensity, degree, possibility and so on. The path of "big (大)/small (小)" semantic diffusion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spatial metaphor. Since Chinese is a language with promin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t gives priority to adopting the cognitive strategy of spatial vision to representational coding. The semantic diffusion path of the Korean dimension adjective "크다/작다" has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with that of "big (大)/small (小)". However, Chinese has promin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ttaches importance to holistic thinking and prefers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experience, which leads to deeper semantic diffusion and wider use of "big (大)/small (小)".

Keywords: big (大)/small (小); 크다/작다; spatial metaphor; semantic diffusion

(上接第47页)

On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iu Zongyuan's Reciprocating Poems

He Fangx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Liu Zongyuan's reciprocating poems are the true record of his friendship activities, self struggle, and progress, surpassing simple friendship narration and containing value judgments and even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exquisite carving style of landscape literature permeates into the field of poetry, enabling the rugged journey of life to reach a poetic realm. The form elements are sufficient, enhancing the aesthetic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reward and echo themes. Based on Du Fu's poetry, Liu Zongyuan made new explorations in expanding themes, deepening and refining art, and writing locally, which has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poetry. The reciprocating poems between Liu Zongyuan and Liu Yuxi are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conic samples of decentralization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mid Tang Dynasty, even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of cultural zones.

Keywords: Liu Zongyuan; reciprocating poetry; cultural significance; locality; decentralization; Du Fu; Liu Yuxi

“菌桂”再辨

刘心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草木意象是《楚辞》的显著特色,“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更是延续千年,辨析《楚辞》中的植物值得且应当。《楚辞》中数次提到“桂”,早在先秦时期,“桂”就已经被记载,此所载之桂为樟科桂而非今日木犀之桂。在“桂”基础上,“菌桂”说法更众,通过对“菌”的字形分析、词性讨论,可得出“菌”有修饰功能。通过对《离骚》中“杂申椒与菌桂兮”“矫菌桂以纫蕙兮”的原句分类讨论,认为“菌”是“桂”的形容修饰更能得其旨意。

关键词:《楚辞》;《离骚》;“菌桂”;“菌”;“桂”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09

《楚辞》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运用了异彩纷呈的草木意象,尤其以《离骚》为突出代表,进而奠定了“香草美人”这一文学传统,在后世千年的中国文学中流传发展。准确识别这些植物原型,对于深入解读文本内涵、阐释作品思想至关重要。“王逸以来的历代注家,对草木名物的探究逐渐深入,近代以来植物分类学的引进,更使楚辞植物的辨析工作趋于科学合理,不少植物的性状与现代名称得到了确认。”^{[1]8}

纵观前人对“菌桂”的注释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认为“菌桂”是一种植物,或“菌”“桂”为同一种植物;二是认为“菌”“桂”是两种不同植物;三是认为“菌”不是植物,“菌”是“桂”的形容修饰。当代研究中,刘蒙《〈离骚〉中的植物名称研究》认为“菌桂”等同于“蕙”^[2];姚小鸥、李拓《〈楚辞〉中的桂与菌桂——兼论〈楚辞〉植物的考释方法》对“桂”与“菌桂”进行了辨析,认为菌桂不可分而言之,“菌桂”与“桂”均表称同类植物,即樟科木本植物肉桂或同属近似种^{[1]30-37}。

“菌桂”一词在《楚辞》中只出现了两次,且都出于《离骚》,分别是“杂申椒与菌桂兮”^{[3]7}与“矫菌桂以纫蕙兮”^{[3]13},虽然出现得少却争议繁多。本文首先讨论“桂”,在“桂”基础上讨论“菌”的不同字

形及其作为名词的修饰功能,以此对“菌桂”进行辨析。

一、辨“桂”:先秦之桂何所指

这个辨析包括两点:一是先秦时期“桂”是否真实存在;二是此“桂”究竟为何物。

(一)先秦有“桂”

民国时期学者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为了证明《楚辞》非屈原所作,将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名物的出现时间如“桂”定于汉代而非先秦。如其《楚辞新证》篇提及:“当时(汉代)域外物品之流入中土者极多,而桂及菌桂等,亦于此时传入”^{[4]39};《九歌作于汉代诸证》篇提到:“‘兰’‘桂’这些植物的名称,在周秦时还不习见,自秦汉开辟南海一带的疆域以后,宫廷间才有这些‘远方而至’的植物”^{[4]93}。——这个说法显而易见是错误的。

先秦时期的典籍里已经出现了不少对“桂”的记载。如《山海经》中涉及“桂”的生长地点:“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5]1}“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涂之山……其上多桂木”^{[5]36}。《庄子·人间世

第四》记载了“桂”的食用价值已被发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6]。《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的记载则表明了这时候“桂”已经与“椒”相联系，香气令人关注：“楚人有卖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7]，且此处“桂”已和“楚人”相联系。《战国策·楚策三》则直接点明了“楚国”与“桂”：“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渴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8]。

除了上述列举的，还有很多。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典籍中记载同一事物，足以证明其存在的真实性；且在载“桂”时不止一书中提到“楚人”或“楚国”这种跟楚地有关的名物。于此，可以得出先秦楚地有“桂”的结论。

(二)“桂”为香木

上文说道，先秦楚地有“桂”。《说文解字》解“侵”为“桂”，解“桂”为“江南木，百药之长”^[9]，《尔雅》又载：“侵，木桂”^{[10]3572}。许慎《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尔雅》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由此可见至少在两汉时期及其之前，“桂”并非现在常见的木犀科桂花。汤炳正先生也说：“古代称‘桂’，系指‘肉桂’，非指‘木樨’^①。”^[11]笔者查阅《中国植物志》发现“肉桂”是樟科下樟属，在广西又称“筒桂”，是“中等大乔木”“树皮灰褐色，老树皮厚达13毫米”“树皮、叶及‘桂花’（初结的果）均有强烈的肉桂味”“入药因部位不同，药材名称不同，树皮称肉桂”^{[12]223-226}。沈德鸿说：“菌桂，即今肉桂也……凡经传言桂，皆非今之木犀；唐以后始名木犀为桂花”^{[13]129-130}。

《楚辞》中的“桂”除出现在《离骚》外，主要集中于《九歌》。《九歌》中的“桂”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运用在交通工具与建筑领域之“桂”。如：

《九歌·湘君》：“沛吾乘兮桂舟。”^{[3]60}

《九歌·湘君》：“桂棹兮兰枻。”^{[3]62}

《九歌·湘夫人》：“桂栋兮兰橈。”^{[3]67}

《九歌·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3]79}

“桂舟”“桂棹”“桂栋”“桂旗”即人们用桂木做成舟楫、房屋和车旗，可见屈原时代桂木的实用性已被熟练运用。洪兴祖《楚辞补注》注释，聚焦于“桂”之香，如注“桂舟”曰“舟用桂者，取香洁之义”^{[3]60}；注“桂棹”曰“桂兰取其香也”^{[3]72}，注“桂旗”曰“结桂与辛夷以为车旗，言其香洁也”^{[3]79}。这里的

“桂”，承袭了屈原借草木芬芳以喻品德高洁的习惯用法。

这里的“桂”有造船、建房等实用价值，还与香相联系，可知“桂”为香木。由此可推断《楚辞》中的“桂”并非木犀科的桂花树。木犀科的桂花树，根据花的颜色有金桂、银桂、丹桂等不同名称，花朵未开时，树木本身并无香气；而樟科植物多为芳香树种，其树身包括树皮、叶等常多数含有芳香油或粘液的细胞^{[12]1}，通常本身就有芳香，比如汤先生所说的肉桂和现在熟知的香樟树。

通过查阅《中国植物志》，发现樟科樟属下的“天竺桂”就有“木材坚硬而耐久，耐水湿，可供建筑、造船、桥梁、车辆及家具等用”^{[12]195-196}的特点——这种本身自带芳香又多用于建材的特点恰好与上述材料中的“桂”相符合。

第二类是“桂酒”“桂浆”之“桂”。如：

《九歌·东皇太一》：“奠桂酒兮椒浆。”^{[3]56}

《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3]76}

“桂”能酿酒，王逸注其为“桂酒，切桂置酒中也”^{[3]56}，可知这里的“桂”，亦非木犀科桂花。今所谓桂花树之“桂”，其花本就细小，何至于切？只有比较坚硬的且具有芳香味道的樟科桂树皮或枝条用“切”，才义理皆合。恰好《中国植物志》中樟科樟属下“野黄桂”条目就言“有桂皮香味”“枝条曲折”“树皮甘而辣，芳香，湖南黔阳一带用树皮作桂皮入药，功效同桂皮，亦有将树皮放入酒内作为酒的香料的”^{[12]194-195}。战国时期的楚地包括今天湖南一带，桂的树皮用于酒中有了现实依据，由此可以推测，屈原时代的“桂酒”“桂浆”已经在当地有了习俗，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被保留下来。

现代的植物学分类细致详尽，樟科中有很多不同树都被冠以“桂”名。目前无法分辨《楚辞》中的“桂”到底是何品种，或许为“肉桂”，或许是“天竺桂”，又或许是“野黄桂”，也可能是其他未提到的品种。可以试想，先秦时期樟科桂诸品种在交点地区杂生，其细小的区别未被细致了解，于是被当时的人们统称为“桂”，是极有可能的。但是《楚辞》中的“桂”是指树木本身为香木的樟科^②桂这一点

① “木樨”同“木犀”。《中国植物志》木犀科木犀属之“木犀”即桂花（通称）；《现代汉语词典》解“木樨”为“桂花”，解“木犀”为“同‘木樨’”。此处引汤先生原文“木樨”，文中其余处皆写为“木犀”。

② 樟科是一个起源古老的自然科，樟科下樟属大多数在热带、亚热带亚洲，在中国秦岭、长江以南广布，在常绿阔叶林中常成优势，其木材、树皮及叶为肉桂、樟脑、樟油的来源。

是可以确定的。

二、辨“菌”（“菌”“筒”“困”）：

字形之辨与修饰功能

历来对“菌”之解释，多集中于其字形之上，“菌”有异文称“菌”，又有“筒桂”一说，故此处从“菌”的字形之辨出发，进一步对其作为名词的修饰功能做一辨析。

（一）“菌”的字形之辨

1.“菌”“筒”。“菌”字字形，争议极大，主要集中在从草还是从竹。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校曰：

菌，一作菌，其字从竹。^{[3]7}

朱熹《楚辞集注》中校曰：

菌，渠陨反，或从竹。^[14]

刘梦鹏的《屈子章句》中记载“杂申椒与菌桂兮”，是另一版本，此处“菌”本就为从竹之“菌”。刘梦鹏对此校曰：

菌，音郡，或从菌。^[15]

以上对《离骚》中“菌桂”之“菌”的校语、注释，仅点明“菌”字有“菌”之写法；或记载的版本本就为“菌”，而校其可从“菌”。二字似乎是同一字，传达同一意思。各注家语焉不详，未曾对此进行明确地说明或辨析。

关于“菌”与“菌”二者的字形不同的原因，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有提及，首倡“讹误说”：

筒卷者，即菌桂也，以嫩而易卷。古方有筒桂，字似菌字，后人误而书之，习而成俗，至于书传，亦复因循。^[16]

他认为“菌桂”实为“筒卷”。“筒卷”名字何来？有说菌桂嫩时容易卷曲故名；有说或与常见形态有很大关系——如今日中药“桂皮”，就是天竺桂等树皮的通称，其被剥下来后卷曲成筒（见图1）。又说古方有“筒桂”，“筒”与“菌”字形相似，于是后人讹误将“筒桂”写成“菌桂”，误写次数多了就成了约定俗成。



图1 桂皮形态

吴仁杰亦云：

菌桂一名筒桂，而木桂一名板桂。筒不离竹，板不离木，大抵以竹言薄，木言厚也。虽菌、筒字近，传写易误，只用菌字，其义亦明。^[17]

认为“筒桂”又叫“菌桂”，“菌”与“筒”字形相近，故易误。

李时珍《本草纲目》：

今本草又作从草之菌，愈误矣。^[18]

《本草》^①提及“菌桂”从草之“菌”，就延续了这个错误。

据上推断，“筒”字应为最初的写法。“筒桂”在古方中存在，而“筒”“菌”“菌”三者字形都极其相似，在传抄中出现错误难以避免，加上流传甚广的《本草》用从草之“菌”，后来便更多的从草了。但是从其流转看来从竹的“菌”更加合理，更加接近“筒”字。

除上述文字可证明其字形的相似易误之外，还可直观地从古字形来对比。“菌”的小篆写作“菌”；“菌”的小篆写作“菌”；“筒”的小篆写作“筒”；“筒”有异体字“筒”，小篆写作“筒”，其在楚系简帛中写为“筒”^[19]。可以看出在古字形上三者的相似之处，尤其是“菌”与“菌”，由此可以认为“讹误说”有一定依据与可能。

黄灵庚先生则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菌桂，犹芳芷、芳茝、芳椒、幽兰、石兰，言芳桂也。……《补注》据《本草》以为“正圆如竹”之菌桂，失旨。^{[20]96}

他对“菌”从竹进行了否定，认为“菌桂”之意与“芳芷”等香草同性的“芳桂”更为相似，从草较为合理。

那么到底应该从草还是从竹呢？笔者认为从竹更加合理。一是古时传抄将竹部和艸部混淆讹误，无法完全避免。二是黄先生以“菌”为“芳”意，并不能否定“桂”或“菌桂”形貌上的“正圆如竹”。三是上文提到“桂”或为“野黄桂”，其本就“有桂皮香味”且“生于山坡常绿阔叶林或竹林中”^{[12]194-195}，既然可以生于竹林中，那么不管“菌”是修饰“桂”还是“菌桂”本为一物，其字从竹部都是极可能的。四是和植物有关的草头字如“芷”“葑”“菊”“葵”等多是低矮细小的草类作物，而和

① 此《本草》应指《神农本草经》。李时珍《本草纲目》“菌桂”条目下有“本经上品”小字，《神农本草经》又称《本经》或《本草经》，另笔者翻阅今辑《神农本草经》都有“菌桂”条目，与李时珍所言契合。此处为了行文更好理解，依李时珍原话写作《本草》。

植物有关的竹头字如“竿”“筒”等都带有一丝和竹子一样挺拔的象征意味,若是修饰“桂”这类香木,竹头更加合适,不仅对树木的基本外形作了描述,同时也与香气一起增加了品德高洁、宁直不弯之类的内涵。

2.“囿”。除上文所提“籓”与“筒”的字形之外,《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困桂”这一写法:

冶囿(菌)【桂】尺,独口一升,并冶,而盛竹甬(籓)中……^[21]

这不仅给“菌桂”的存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据,而且展示了“菌”字或可为“困”字新的可能。从字形上来看,既然前文所论诸家根据无法避免的讹误讨论从草与从竹,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字头是后人传抄时所添。

《说文解字》解“困”为:“廩之圆者,从禾在口中,圆谓之困,方谓之京,去伦切。”^[22]¹²⁵根据其禾在口中的字形可以简单看出“困”本义为粮仓,《说文解字》细化为“圆形的粮仓”。此义在很多文献中都有体现,例如:

《诗经·魏风·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囿兮。”^[23]

《国语·吴语》:“今吴民既罢,而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囿鹿空虚。”^[24]

《礼记·月令》:“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囿仓。”^[25]

此处所论《离骚》中之“菌桂”,金开诚在《屈原集校注》中解“菌桂”时就曾引清人王引之所言提过“困”:

菌桂,香木名,即“籓桂”。清代王引之说:“籓之言圆也。《说文》云:‘圆谓之困,方谓之京’,是困圆声近义同。箭竹小而圆,故谓之籓也,竹圆谓之籓,故桂之圆如竹亦谓之籓。”^[26]

将其意思概括一下,即“菌”为“籓”、“籓”为“圆”、“圆”为“困”,故“菌”为“困”,是“圆”的意思。那“菌桂”就是圆如竹子的桂树的意思,正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又说其“正圆如竹”;同时也包括了如图1所示剥下来后树皮的圆形卷曲形态。将其引申,还能得到积拢、聚拢之义,如《说苑》:“菽粟帛帛,腐于困府”^[27];以及回旋曲折之义,如《阿房宫赋》:“盘盘焉,囿囿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28]。

(二)“菌”的修饰功能

从词性来看,“菌”不论是写为“籓”“筒”还是

“困”,其本义都为名词。值得注意的是,名词可以修饰其他名词作定语,用来构成词汇和语法意义上的偏正关系。

从“菌”字本身在各类字典中的解释来看:

《说文解字》:“菌,地蕈^①也,从艸,覃声,渠陨切。”^[22]¹¹⁵

《尔雅》:“中馗,菌。小者菌。”^[10]³⁵³³

《玉篇》:“菌,奇陨切,地菌。”^[29]

古人单字之“菌”多解为现在所说的可食用“蘑菇”,“菌”的本义即如此。用现在的语言解释:“菌”是低等植物的一大类,不开花,没有茎和叶子,不含叶绿素,不能自己制造养料,靠寄生生活,种类很多。

同时,先秦时代的典籍文献早已有单用“菌”本义的记载:

《列子·汤问》:“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30]

《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31]

从中可以看出,若是作为其本义的蘑菇之“菌”,先秦时期大多是根据其朝生暮死的生长特点,来引申为叙写时间短暂,感慨时间流逝。而将这个“时间短暂”的引申带入《离骚》中“菌桂”来解,并不符合文意。

先秦典籍中,除将“菌”解为本义之外,亦有“菌”修饰其他名词的用法。如: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小人,名曰菌人。”^[5]³⁵³

《墨子·旗帜》:“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为菌旗。”^[32]

《逸周书·王会解》:“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33]³³³

《楚辞·九怀》:“菌阁兮蕙楼,观道兮纵横。”^[3]²⁶⁹

“菌人”就是身材异常矮小的人,这是借“菌”本义蘑菇本身的特点引申而来;与前文对比,“菌旗”中的“菌”用来修饰“旗”,至于是否如苍赤黄白黑表示颜色有待商榷;黄怀信将“菌鹤”注为“菌地所出之鹤”^[33]³³⁴,笔者认为或许和“菌人”一样是指体型矮小之鹤,但不管何解,此处之“菌”亦是用来修饰“鹤”;“菌阁”即形如菌状之阁,同样为修饰之语。

① 郭璞注曰:“地蕈也,似盖。今江东名为土菌。”

具体到“菌桂”一词,将“菌”作为名词的修饰功能,明确解释出来的典型代表就是前文说到的黄灵庚先生释“菌”为“芳”。若“菌”为“菌”“筒”或“困”,也都带有修饰的意味,“菌桂”就是像筒卷一样的桂或者说正圆如竹的桂。

三、辨“菌桂”:并列还是偏正

结合前文对“桂”与“菌”单字的探讨,可以确定“菌桂”一词是由两个语素组成的合成词,加上“菌”“桂”都是名词,那么对于“菌桂”构词的争执就主要集中在并列式与偏正式二者上。这个争执也是历代诸家关于“菌桂”不同看法的原因所在。

(一)并列式为误解

据前文所言,可以肯定“桂”为一种植物,“菌”的本义也是植物。不考虑其他的附加意思时,“菌桂”应为并列结构。

王逸称:“菌,薰也。叶曰蕙,根曰薰。”^{[3]7}意为“菌”就是“薰”,这种植物的叶叫做“蕙”,根叫做“薰”。此解并未对“桂”单独解释,应是默认“桂”为植物。但王逸这种说法“没有根据,而且引起很多歧义”^{[1]33},显得语焉不详,可信性大为降低。正如洪兴祖对王逸说法的补注:“菌,薰也。其叶谓之蕙。则菌与蕙一种也。别言蕙茵。又云:矫菌桂以纫蕙;则菌桂自是一物。”^{[3]7}很明显王逸是将“菌”“蕙”相混淆,对今后人们考察植物原型等造成不小的困难。

可以发现,这种并列结构在意义的理解上是有一定问题的。从句法的角度来看:若“菌桂”为并列式,应断为“菌/桂”,按照对仗原则,原句须断为“杂/申/椒/与/菌/桂/兮”,这显然不合常理,读起来的音顿、韵律也并不好听。所以能够排除“菌桂”为并列式,即“菌”“桂”为两种不同植物的说法。

若“菌”等同于“桂”,即二者为一种植物的同义复指的情况呢?也可以排除。因为不仅单字的意思差距很大,而且并未在各种典籍中找到此种记载。

那么洪兴祖所说“菌桂自是一物”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菌桂”不可分而言之,洪氏在这句话之后言“《本草》有菌桂,花白蕊黄,正圆如竹”^{[3]7},又以“菌”为“菌”,中心语在“桂”,“菌”是修饰。这

里就涉及所要说的第二种结构——偏正式。

(二)应解为偏正式

解为偏正式的前提是认为“菌桂”为一物,即二者不可分开,断句应为“/菌桂/”。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其放入原句中来看。

1.以“杂申椒与菌桂兮”为例。“杂申椒与菌桂兮”句是一个并列对举结构,即“申椒”对“菌桂”,厘清“菌桂”可析“申椒”。

原句中,“杂”为杂聚、杂集,多无疑义。关于“申椒”,一则可将“申椒”视作一物,二则可将“申”单独理解。

若将“申椒”看作一种植物,典型的代表是黄灵庚先生,其在《楚辞章句疏证》中解到:“申、新通用”,“申椒,即辛夷”^{[20]94}——黄先生这个观点在笔者看来值得商榷。一是因为转得太多,他从读音上的“信,读曰申”到“古者新、信同音”得出申、新通用,再到“新,辛声”,又以“椒”为“夷”之讹,类“寂寞”之“寂”讹为“夷(迟)暮”之“夷”^{[20]94}。实在是千回百转,显得格外牵强。二是因为“辛夷”一物在《楚辞》中本身就有出现,如“辛夷楣兮药房”^{[3]67}(《九歌·湘夫人》),所以说用“申椒”指代“辛夷”几无可能。三是因为黄先生解“菌桂”时以“菌”为“芳”,所解之“申椒”与“菌桂”结构不同,不能对仗。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不同意黄先生关于“申椒”为“辛夷”一说,但认同他认为辛夷非香草而应该是一种香木^{[20]94-95}的说法,这也和上文所证“桂”为香木契合。

若是将“申”单独解释,即“椒”为中心语,“申”为修饰,则存有以下几种可能。

首先,将“申”看作地名,如胡文英言“申椒,申地所产之椒”^{[13]128},闻一多也说“椒有秦椒、蜀椒,皆以地名,或申椒亦然”^{[13]130},并且叙述了申地所在:“春秋申国灭于楚,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县北,申椒盖产于此。”^{[13]130}楚国有申地,《左传·鲁庄公六年》记载:“楚文王伐申,过邓。”^{[34]139}《左传·鲁哀公十七年》中有楚太师子谷与叶公诸梁的一段对话提到“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34]1830}“观丁父,都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贱之有?”^{[34]1829}但是,以上记载是春秋楚国有申地,而屈原所处战国时代在楚国地图上未见申县之名,当地名称已从“申”变成“宛”;闻一多所言“秦椒”“蜀椒”在其他文献中亦有记载,如《黄帝

内经》有“蜀椒一斤”^[35]、《山海经》有“景山多秦椒”^{[5]111}，而“申椒”只出现于《楚辞》及相关作品中，没有明确的“申椒”为“申地之椒”含义的其他记载。

其次，王逸《章句》解“申”为“重、多”之义。这可从花椒形态来解释，如金开诚在其《楚辞选注》中释“申”为“重叠，形容花椒簇生累累”^[36]。李贺也早在其《巫山高》一诗中描绘过这种花椒的层累形态：“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花椒的层累形态如图2所示。



图2 花椒形态

这里的“申”可解为“重、多”，表示“椒”之层累形态，亦可以表示杂聚“椒”木之多。这种解释一语双关，更加合理且可信。

综上所述，“申椒”应为偏正式，“椒”为中心语，“申”为“重、多”之义来修饰“椒”。故，根据对仗原则“菌桂”也应是偏正式结构。正如游国恩先生言：

此文申菌二字，乃形容椒桂之词，申椒、菌桂各为一物。本篇言香草嘉木，如此等句法甚众。上文“扈江离与辟芷”，下文“畦留夷与揭车”“杂杜衡与芳芷”，皆上下各为一物，从未有上二下一，上一二或上二下二之例。^[37]

如此，该句断句便为“杂/申椒/与/菌桂/兮”，从读起来的韵律和音顿来看也更加朗朗上口，较为合适。

2.“菌桂”之义。据前文所言，“申椒”之“申”解为“重、多”，此解能够修饰出“椒”层累、杂聚之状态。

那么“菌桂”之“菌”该如何解呢？笔者以为，“菌”解释为“圆”更加适合。一是因为此解可以修饰“桂”的形态。正如上文解“菌”时所提到的“菌”“筒”“困”三个字形，都带有对外形形态的描写，其解释的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圆”的意思。这个“圆”不仅是“桂”木整体正圆如竹的“圆”，也是常

见“桂”皮剥下来后所成的入药之桂皮形如筒卷的“圆”。二是因为“圆”也契合了“椒”或者“椒”木的形态。即在“杂申椒与菌桂兮”这个句子下，当“杂”字引领该句，“申”与“菌”运用互文的修辞，“申”的是椒与桂，“菌”的也是椒与桂。那么可以解释为：杂聚众多的圆的椒（木）与桂（木）。联系后句“岂维纫夫蕙茝”，“蕙茝”与“椒”“桂”同喻贤者，而“蕙茝”是香草，比香木的味道更浓郁，虽然“蕙茝”更贤，但“椒”“桂”众多也能积石成塔、积少成多。

那么将“菌”解为“圆”在“矫菌桂以纫蕙兮”句中能解释得通吗？先来看其他字词之义。先看“矫”字，一则可以理解为“矫正、纠合”；二则可以根据其引申为“捆扎”；三则可以将“矫”看成是“拈”字，“拈”从手，有“举、拿”之意。“纫”解其为“捻线、搓绳”之本义。“蕙”就是蕙草。“以”字用法可能性颇多，在此处不论何解都不影响“菌桂”之解，姑且认为其为最常见的表顺承之义。“矫菌桂以纫蕙兮”后句为“索胡绳之纚纚”，此处句意应是要搓成胡绳。那么“桂”这里具体为桂的枝条或者桂皮，“菌”为“圆”的具体语境义——或曲折卷曲或积拢聚拢或形容桂皮圆的形态，都能够说通。结合“矫”的不同意思可以翻译为：“拿集聚的桂树枝条联结蕙草搓成绳”或“矫正纠合曲折卷曲的桂树枝条来联结蕙草搓成绳”。同时，对比“矫菌桂以纫蕙兮”前句“擘木根以结茝兮”，可以发现两句结构相同。“擘”字管“木根”，“木”修饰“根”，可以佐证“菌”亦为“桂”之形容修饰。

综上，将“菌桂”解为偏正式的结构，且解“菌”义为“圆”，是合乎句法与文意的。

（三）其他文献中的“菌桂”

除了《本草纲目》《离骚草木疏》这类记载医方及专释《楚辞》植物的书籍外，“菌桂”也出现在其他的文献及相关注释中。

《山海经·海内经》有“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5]396}句，郭璞注曰“桂山”为“或云‘衡山有菌桂，桂员如竹’。见《本草》”^{[5]397}，郝懿行笺疏其曰“刘魁注《蜀都赋》引《神农本草经》曰：‘菌桂出交趾，圆如竹，为众药通使’”^{[5]397}（左思《蜀都赋》原句为“菌桂临崖”^{[38]1105}）。可见释“菌桂”大多引《神农本草经》所载“菌桂”，且其义为正圆如竹的桂，即“菌”为“圆”修饰“桂”。

除此以外还有诸如：

王粲《游海赋》：“乘菌桂之方舟。”^[38]¹⁵²
 王俭《灵丘竹赋》：“仪菌桂而成林。”^[39]；
 李德裕《夏晚有怀平泉林居》：“菌桂秀层岭。”^[40]

都是与前文所言《神农本草经》之“菌桂”一样的释义，也同样都和《楚辞》中的“菌桂”一样是偏正式结构。

一言以蔽之，“菌桂”应为“菌”修饰“桂”的偏正式结构。

结 语

通过对“桂”的考证、“菌”的辨析和对“菌桂”的解读，可得结论如下：

首先，先秦有“桂”。《楚辞》中所咏之“桂”不同于现在所说桂花的木犀科桂，而为樟科桂。根据《中国植物志》的分类与记载，可以发现“天竺桂”和“野黄桂”的部分特点与《楚辞》中的“桂”之特点和运用场景有吻合之处。其次，通过对“菌”的辨析，“菌”为名词，且在“菌”本字字形之外发现“菌”“简”“困”三种字形，均具有作为名词的修饰功能。最后，通过构词与句法，分析得出“菌桂”不应为并列式结构，而为偏正式结构，此结论在《楚辞》以外的其他文献中也找到了例证。

参考文献：

- [1]姚小鸥,李拓.《楚辞》中的桂与菌桂:兼论《楚辞》植物的考释方法[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2010.
- [2]刘蒙.《离骚》中的植物名称研究[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12):4-5.
- [3]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M].北京:中华书局,1948.
- [5]山海经[M].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6]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100.
- [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266.
- [8]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3.
- [9]许慎.说文解字[M].陶生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175.
- [10]郝懿行.尔雅义疏[M].吴庆峰,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

- [11]汤炳正.《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J].求索,1984(3):73-82.
- [12]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31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 [13]崔富章,李大明.楚辞集校集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14]朱熹.楚辞集注[M].夏剑勤,吴广平,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3:6.
- [15]刘梦鹏.屈子章句[M].胡彦,点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4.
- [16]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M].尚志钧,等校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339.
- [17]吴仁杰,屠本峻.离骚草木疏:外一种[M].徐东舜,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50.
- [18]李时珍.本草纲目:第三册[M].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1932.
- [19]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M].增订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437.
- [20]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增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2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83-84.
- [22]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吴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411.
- [24]左丘明.国语集解[M].徐元诰,集解.王树民,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554-555.
- [25]郑玄.礼记注[M].王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224.
- [26]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21.
- [27]刘向.说苑校证[M].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348.
- [28]杜牧.樊川文集校注[M].何锡光,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2.
- [29]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M].吕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9:462.
- [30]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6.
- [31]王先谦.庄子集解[M].沈啸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2.
- [32]孙怡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579.
- [33]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M].修订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34]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35]黄帝内经[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923.
- [36]金开诚.楚辞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5.
- [37]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8:56.
- [38]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
- [3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2840.
- [40]彭定丘,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5399.

(下转第88页)

视像化阅读：“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创新实践

梅 咏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00029)

摘要:“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新形态产品形式,适应了移动互联时代学生群体的知识获取习惯,在搭建沉浸式教学场景、提升学习兴趣等方面的作用也越发凸显。在创新机制方面,短视频可以有效提升教材内容的教学适用性,丰富传统教材内容的呈现形式,通过再现课堂教学互动的情境过程,实现教学成效和育人质量的显著提升;在传播效果方面,通过优化拓展教材的内容增值服务,形成多渠道的内容分发推广机制,最终实现资源配置和价值共创模式。

关键词: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视像化;内容增值;价值共创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10

随着当下媒介技术的迭代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智能硬件等新技术,不断深化人与世界的交往情境,创造更多视像化生存的新场景。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以新的媒介技术和传播手段,进一步推动出版传媒业进入视像化阅读时代。短视频蕴藏着巨大的产能优势和传播优势,为教材深度融合出版提供强大动能,通过短视频与教材相关知识内容的关联,不断探索“短视频+教材”的新样态,成为出版深度融合下新形态教材研发的重要实践。本文从“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现实需要、创新机制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探讨教材出版如何通过创新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方式,构建知识服务的新业务模式,更好地满足视像化阅读环境下教育教学的需要。

一、“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现实需要

短视频是互联网、算法和视频媒介融合的一种创新性尝试,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成为高校学生接触最多的媒介形态。短视频

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发生着深刻的关联,较好地满足了视像化时代学科知识碎片化传播、学生碎片化阅读的需求,在为学生提供知识服务的同时,激发其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兴趣,进而推动高校教学方式的持续变革。

(一)满足信息时代学生的阅读需求

在移动互联网这一技术环境的包围下,学生获取知识、接受知识的思维习惯和方式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从文字阅读到可视化阅读,从深阅读到浅阅读,无纸化阅读、可视化阅读成为常态化的学习方式。作为知识传播的新载体,短视频所承载的知识内容正朝着可视化、通俗化、碎片化方向发展,基于短视频的知识传播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实现随时随地的泛在学习,并对教材内容形成有益的补充,因而短视频成为学生求知实践中重要的媒介工具。

首先,短视频能够满足学生视像化阅读的需要。数字化阅读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逐渐技术化和视频化,对学科知识的获取不再限于纸质教材。他们既期望通过短视频获得娱乐和放松,也想借助短视频学习学科知识,甚至通

收稿日期:2025-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23&ZD218)

作者简介:梅咏(1978—),女,重庆长寿人,副编审,硕士,研究方向:编辑出版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过观看短视频掌握某项技能。短视频是一种娱乐性和知识性兼顾的媒体形式,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悦之中获得知识和理论,真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基于课程标准制作的短视频,将原本抽象难懂的学科知识以生动且直观的视频形式呈现,不仅契合了当下视像化时代学生的阅读偏好,还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

其次,短视频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传统教材以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为主要特点,通过批量复制的形式传播,学生的区分度很难被体现,层次水平不同的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更难被满足。短视频契合了学生对于碎片化场景下知识获取的个性化需求。在教材中利用短视频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视像化呈现,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学科内容;还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围绕教材不断地进行内容补充和阅读辅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纸质教材和个性化学习平台建设的不足。在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同时,通过对教学效果给出评估和反馈,可引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在掌握教材核心内容基础上进行拓展延伸学习。

(二)推动现代教学模式的持续变革

“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产品形式,突破了传统网络媒介主要依赖文字和声音进行知识传播的局限。通过制作与教材核心内容相关联的知识类短视频,与纸质教材共同构建良性互补的知识体系,在打破传统课堂线性授课模式的同时,较好地实现了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的统一。

首先,丰富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呈现形式。传统纸质教材的知识更新速度较慢,围绕教材展开的课堂讲授方式较为单一,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短视频+教材”是以教材为基点组织内容,将视频传播与智能技术完美结合,以生动、直观和趣味性的形式刺激学生的敏感点。出版社组织编写团队针对教材的逻辑结构和核心知识点进行讲解,并录制成若干独立的短视频,可将抽象的内容转化为具体、形象的视听体验,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该教材的结构框架、基本内容和核心知识点。在视像化阅读情境下,学生获得知识也以短、微、快的节奏展开,通过打破线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方式唤起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也能激发其购买教材的意愿。

其次,实现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的有机统一。“短视频+教材”的视像化呈现形式,突破了单纯将线下课堂内容转移到线上的传播模式,成为学生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形式。依靠先进的技术优势,短视频涵盖的内容空前巨大,为教师开展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积累和整合知识的互动空间,而在特定场景中运用或嵌入特效元素,能够深度激发学生参与内容创作的积极性。教师和学生知识流动的互动空间中,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互动,不断更新学习内容,优化知识呈现方式,以教学模式的跨越性变革实现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的有机统一。

(三)契合教材融合出版的发展趋势

教材融合出版的实质,是以数字化手段丰富内容的呈现形式,内容价值成为教材融合出版价值变现的根本保证。伴随移动互联网时代学生阅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变化,现代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持续更新,倒逼出版社加快推动基于短视频的教材融合出版步伐。

首先,传统的纸质教材是融合出版的入口和起点。在“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格局中,传统教材的思想理念和重要知识点是短视频内容建构的逻辑起点。两者融合的关键是应用数字化技术赋予传统教材新的功能,推动传统教材实现升级换代,使之能够更好地满足互联网环境下学生知识获取的需求。传统教材具有学理性、规范性、书面性的特点,在教材中聚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元素,可以使教材涵盖的信息内容更加多样而全面,在不破坏原有阅读的连贯性和流畅度的同时,让学生沉浸式体验到短视频传播出来的知识和信息。

其次,短视频使内容资源的呈现更加灵活多样。随着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短视频与教材的结合不断加深,出版社经年累月积淀而来的优质资源为短视频的内容创作提供着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而短视频显著的声画结合特点使得教材中的知识和信息内容能够以视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1]。“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产品形式所具有的知识功能和服务功能,改变了传统教材使用的单一传播模式,也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单一讲授模式。短视频的可截取、可嵌入、可重构,以及制作成本低廉、简单快捷的特点,使教材知识内容的呈现更加灵活。仅凭一部智能手机,辅以基本的视频编辑软件,而无需复杂的设备和大量资金投入。

入,就能够将知识内容丰富且呈现形式各异的教学短视频创作出来。

二、“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创新机制

“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所具有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出版社随时可以得到知识传播效果的反馈,并根据学科发展和受教育者的群体特征及时对内容进行更新和补充。出版社借助短视频提升教材内容的教学适用性、丰富传统教材的内容呈现形式、再现课堂教学的情境过程,进而构建知识流动和整合的互动空间,满足学生群体共有的知识获取愿景。

(一)提升教材内容的教学适用性

在教材将要出版时,通过录制与教材内容相关的短视频并向使用者试播,由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来判断该教材在教学中是否具有适用性,并及时对教材内容做出相应调整,进而避免教材出版后出现与用户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

首先,借助短视频的试播来评估教材内容及其编排方式与教学实际需求的适配度。目前,高校教师和教材编辑的主观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领域教材的内容及体例结构,而学生作为教材使用者,其使用体验和意见却较少被关注。在教材付梓之前,出版社制作短视频,向特定的学生群体试播教材的相关内容,如分析重要知识点、讲解较为深奥的原理、将抽象内容以生动晓畅的形式呈现等,通过学生对短视频内容的反馈意见,来评估教材内容是否适应教学需求^[2],并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和更新,校正教材中存在的错误和薄弱环节,确保正式出版后教材真正为教学所使、为学生所用。

其次,基于深度学习技术检测短视频内容和用户之间的匹配程度。在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当下,场景化已成为内容与用户实现高效联接的关键纽带,而深度学习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精准剖析短视频内容,从而为用户打造更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体验,成为推动内容与用户深度交互的重要驱动力。出版社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提取短视频中的关键特征信息,深入分析短视频所呈现的具体场景及其涵盖的内

容细节,进而洞察短视频使用主体的行为模式与偏好,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和提升知识服务的品质;还可以借助算法推荐技术获悉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精心打造贴合学生需求的短视频,让其内容深度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从而实现内容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丰富传统教材的内容呈现形式

作为教学活动展开的重要载体,纸质教材以其框架结构的完整性、知识体系的严谨性和内容表达的规范性,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纸质教材在信息承载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表现形式较为单一,难以充分契合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的多元化需求。短视频在持续的更新与发展中,正逐渐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知识传播重任,通过文字和影像的相互融合与巧妙搭配,以更加多元化的文本内容,显著提升学习效果。

首先,最大限度挖掘纸质教材的内容价值并生成新知识。将纸质教材作为一个入口,利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和线上互动等平台功能,将教材中的重要知识点以短视频形式呈现,不断产出知识细化的短视频产品,依托教材内容生成新知识、展现新图景。诸如历史类短视频的制作,可以从电视剧、纪录片等传统影视作品中选取素材,还可以灵活运用地图、动画、3D模型、实景拍摄以及历史影像资料等多种表现形式,从而丰富内容的视觉表达形式。特别是在呈现政权的历史疆域变迁、战争格局演变,或是某一时期的人口迁移路线、商业贸易路径变化等复杂历史内容时,可以综合运用多种制作和剪辑方式^[3],营造出更具沉浸感与真实感的历史场景,使学生深度融入教材所讲述的内容并刺激他们的时空想象力,既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其探索欲,又能助力学生建构起相对完整的学科知识结构。

其次,与教材内容资源同步设计、同步开发、同步发布。基于学科内容同步研发的短视频,可以是对某个核心知识点的讲解,可以是对一项应用技术的形象演示,也可以是学科领域专家的精彩讲座等,通过为学生提供与课程相关的拓展阅读和学习,建构立体化、可视化的学习体系。短视频资源在平台的发布可以与课堂教学的进度同步进行,帮助学生理解和巩固必须要掌握的学科知识,提升教材内容在教学中的适用性。出版社也可以策划组织相关课程的短视频创作大赛等活动,以

此为契机广泛征集优秀作品,并从中精心筛选出内容优质、富有创意的短视频,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储备,满足知识结构水平多样化学生的学习需要,推动高校教材从内容生产向增值知识服务迈进。

(三)再现课堂教学互动的情境过程

“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产品形式,应立足学科的教学大纲和基本的教学要求,按照学科特色、人才培养目标来制作短视频,通过再现课堂教学和互动场景,在将学习过程变得轻松愉悦的同时,使学生获得多维度、场景化、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首先,还原课堂教学的沉浸式学习体验。作为一种融合了视听传播与智能化数字技术的知识传播工具,短视频彻底革新了互联网知识内容的呈现与传播模式。它以生动的动态形式展现知识,具备多样化的内容形式、高清的画面质量、鲜明的色彩搭配以及明快的节奏感,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的代入感与沉浸感。短视频巧妙地整合了多种感官元素,为用户带来强烈的视觉与听觉冲击,让知识传播变得更加生动、直观且富有感染力。例如,在制作历史文化类短视频时,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创新技术,将历史场景和文化地标重建在虚拟的现实空间中,学生通过手机屏幕与虚拟场景互动,从而获得沉浸式的体验。此外,依托短视频平台的信息搜索、内容管理、视觉呈现功能,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能够进行类似于课程教学的深入讨论和辅导。

其次,再现日常教学中难以实现的场景。短视频的制作灵活便捷,可以根据具体需求,有机嵌入或链接各类图片、动画展示以及音视频文件,也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再现日常教学中难以实现的课程场景。以“局部解剖学”这门课程为例,作为一门专注于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其教学的核心在于为学生呈现立体且直观的知识内容。然而,传统的解剖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大多局限于通过幻灯片展示静态图片与文字说明,这种模式本质上只是将线下课堂的授课方式简单复制到了线上环境中,并未充分发挥数字化教学的优势。依据教学大纲和授课实际制作的短视频,借助3D解剖学软件生动呈现人体复杂的内部结构,同时绘制简洁清晰的线条图,制作直观易懂的动画,并结合经典解剖学图谱,对相关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4]。通过这些

方式,可将抽象的解剖学概念转化为具象的视觉图像,将复杂的生理过程转化为直观的视像展示,使实操难度大、限制性强的教学内容得以快速、准确、便捷地展示。

三、“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传播效果

出版社凭借其深厚的原创文化资源积累,在推动文化遗产与提供高质量知识服务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与潜力,可以对短视频进行反哺,促进短视频内容的优化升级和传播变现。借助短视频为学生提供知识服务,一方面能体现出版社积极履行知识传播与价值引领的社会使命,另一方面能持续为自身汇聚用户群体并提升流量热度,从而有效实现教材产品的传播效果和营销目标。

(一)优化拓展教材的内容增值服务

相较于传统的出版知识服务,“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产品形式更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审美、垂直细分的兴趣领域和分众化的学习需求。出版社通过制作高质量、有创意的短视频内容为学生提供增值服务,利用短视频平台弥补学生的知识缺口,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和场景匹配。通过开发基于教材内容的附加价值,提供线上线下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互动的增值服务,不断提升学生对“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产品的信任度。

首先,为学生提供海量的学习资源。短视频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撑,展现出惊人的内容承载能力,能够容纳丰富多样的海量信息。基于学科内容的短视频源于教材,也能突破教材内容的限制,通过相关知识链接、知识的深层次嵌入和匹配等方式,为学生丰富科学知识、提升人文素养、引发情感共鸣、重塑思维模式提供资料与参考。例如,当短视频与思想政治教材结合时,短视频平台为红色文化的深邃内涵、先进人物的卓越功绩以及传统民俗的丰富意蕴等珍贵资源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些资源在平台上得以灵活呈现,进而被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极具感染力和吸引力的生动素材。线上线下资源互为补充,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助力学生深入探索民俗

文化与精湛技艺,厚植文化自信根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拓展出一片全新的数字教育天地。

其次,为学生提供学习的交互平台。以短视频为切入点的教材增值服务,在延续传统的数字网络平台提供的相关服务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平台便捷的交流互动功能和课程资源的持续更新,为教师教学和学生提供学习提供更加专业化、更具差异化的服务。短视频的弹幕互动、评论区留言以及私信沟通等功能,为教师与学生搭建了多元化的交流桥梁,作为知识接受主体的学生由过去知识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接收者、传播者和生产者三重角色^[5]。通过深度学习和探究,使得知识传播由单一传播转变为双向互动,学生的多方需求都能得到较高度度的满足。

(二)形成多渠道内容分发推广机制

“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产品生产模式,使得出版社由产品思维走向了用户思维,寻找擅长的短视频细分领域进行深耕,通过分众化聚合用户实现产品的深度IP运营。短视频的发布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在纸质教材上设置二维码关联相关知识内容,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单独发布或集中推送,也可利用学科群实现精准定向发布。

一是在纸质教材上设置二维码。以“教材+二维码”关联短视频的相关内容,打造深层次的内容服务产品。教材所承载的深厚而优质的内容,为短视频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这些内容能够衍生出多种形式,如微话题讨论、小知识分享、实用技能讲解、经典语录摘选等,为短视频创作提供了灵活且多样的知识信息,极大地丰富了短视频的内容生态。在传统的纸质教材中嵌入二维码,学生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得相关学习内容,为展开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

二是借助第三方平台单独发布或集中推送。短视频借助智能算法精准洞察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偏好,判断学生的层次水平。在此基础上,平台能够为学生推送高度定制化的知识内容,从而显著提升学生的阅读体验。这种个性化的内容推送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知识输送的效率和精准度。短视频能够通过知识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实现“一次制作、多次传播”的高效分发模式。短视频的即时性、互动性

和高度个性化的特点,使出版社得以借助第三方平台突破以纸质教材的销售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内容销售来带动纸质教材和其他衍生资源的销售。

三是通过学科群定向发布。短视频平台所具备的评论、分享和互动功能,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群化学习空间,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可能促使他们主动购买相关教材。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对教材中的重难点进行讲解,或者将教师对课程和教材的精彩解读、学生的学习感悟与心得体会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到教材销售平台或各学科的教学研讨社区,为学生自主购买教材提供信息参考,在推动实现知识付费模式的同时,助力纸质教材的销量增长,进而提升用户对出版社品牌的信任度和忠诚度。

(三)实现资源配置和价值共创模式

“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关键在于价值创造与创新,通过多种来源、多样内容、不同价值维度之间的相互交融与互渗,设计出新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价值生成体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短视频可以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教材内容的价值创造中。

首先,通过优化教材内容的专业生产机制实现价值创造。出版深度融合下利用短视频探索全新的价值实现模式,出版社要从单一的教材提供商转向教学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不断产出知识细分化的短视频产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学生提供超越纸质教材的多维内容价值。以学科内容为依托制作的短视频能有效推动纸质教材的销售,还能通过丰富的拓展阅读材料,对教材内容进行补充和延伸,进一步丰富知识体系。教材销售后,新媒体平台利用大数据工具分析学生的阅读习惯、观看时长和互动行为,自动统计学生的访问次数和地理位置,重新界定和识别学生潜在的需求,根据分析结果优化内容创作,从而实现出版社和用户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依托精准化的内容分发机制实现价值创造。通过在平台上分享学习心得、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激发学生的再创造力,从而形成同一层次的学习社群,帮助学生基于学科内容或相关知识进行针对性、专业化的学习。融合形态教材的价值实现不仅依赖传统的产品销售模式,还要通过持续优化服务吸引并留住用户,协

同创意、协同编辑和协同发布成为融合出版的价值共创模式。出版社应由内容生产者转变为价值创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敏锐捕捉师生对于教材及其相关课程内容热点问题的反馈,借助多样化的社群渠道,精准定向发布讨论交流、名师讲解等短视频,持续提升学生对于教材的认知深度和体验价值,构建出版社与师生互动交流的价值共创机制,多方协同汇聚资源,扩大教材的品牌影响力。

结 语

教材融合出版的核心在于借助数字化技术拓展内容的呈现维度,而内容本身的优质价值则是其融合出版价值实现的关键支撑。短视频具有直观易懂的视像化呈现方式,且可以高效利用学生的碎片化时间,使学生获取知识的门槛显著降低,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他们的潜在

学习需求。“短视频+教材”融合出版的创新实践,不仅能为教材的出版和营销开辟新的思路与机遇,还能借助短视频的开放性,重塑教材出版的内部流程。通过创新价值共创与变现模式,持续向以内容价值为核心的知识服务生产模式转型,在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的同时,推动品牌影响力的扩散与流量的有效转化,达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参考文献:

- [1]朱爱敏,邱梦雅.“图书+短视频”:出版机构融合发展路径探析[J].编辑学刊,2023(2):116-120.
- [2]刘坚.“短视频+高校教材”融合出版:动因、机制和表现[J].中国编辑,2020(8):76-80.
- [3]贾雨翔.新媒体语境下历史混剪类短视频在教学中的应用与启示[J].大众文艺,2024(20):161-163.
- [4]高菱鸽,杨蓬勃,杨维娜,等.数字化时代局部解剖学教学短视频建设初探[J].基础医学教育,2024,26(11):963-968.
- [5]陈矩弘.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短视频营销研究[J].出版科学,2019,27(4):80-84.

Visualized Reading: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Publishing with "Short Videos + Textbooks"

Mei Y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new form of integrated publishing combining short videos with textbooks meets the knowledge-acquisition habits of students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Its role in building immersive teaching scenarios and enhancing learning interes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erms of innovation mechanisms, short video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applicability of textbook content, enrich the presentation formats of traditional textbooks,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by recreating the interactive process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garding dissemination effects, by optimizing and expanding the value-added services of textbook content and forming a multi-channel content distribution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this approach ultimately achieves a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value co-creation.

Keywords: short videos; textbooks; integrated publishing; visualization; value-added content; value co-creation

从数字哀悼到数字永生

——智媒时代的情感传播实践考察

雒有谋, 孙宇航, 吴梦凡

(安庆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00)

摘要:智媒时代下,数字媒介重构了生死“对话”的媒介生态,演化为情感交互的“灵媒”,哀悼仪式也从线下逐渐发展至线上。元宇宙的出现解构了人类原有的死亡观,为数字永生搭建了技术可供性平台。这一“奇点”的来临,让人类在拥抱技术永生带来的存在论革命时,也必须保持清醒的伦理自觉:当数字复制技术试图模拟情感的生物真实性,当算法生成的虚拟人格成为哀思寄托的替代品,那些悬浮在数据云端的“情感假体”,是否正在消解人类哀悼行为的本真性?这种技术建构的永生图景,究竟是生命意义的诗意延伸,还是技术理性编织的情感幻术?在技术可能性与伦理正当性的问题中,人们需要始终守护人性中那份不可被数据化的温暖与敬畏。

关键词:智媒;数字哀悼;数字永生;情感传播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11

人存一世,其生理周期沿时间渐进的方式不可逆地展开,死亡也就成为固有的生命现象。海德格尔说过:“死亡是人类最后的可能性,是谁都无法避免的。”^[1]从古至今,人们通过书信、图片、留声机、影像资料等各种媒介穿越时空来缅怀和“触摸”逝者,以哀悼的具象化行为构建与死者的对话,从而造成南森所言“永不安息的逝者”(the restless dead)之生命景观^[2]。媒介哲学家傅拉瑟提出:“传播的终极目的在于对抗死亡。”^[3]在技术赋能下,媒介作为情动力量保存逝者记忆,延展情感空间,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回应了生与死的连接,建构穿梭生死时空的“第二重生命”,以拟化身再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一、历史回眸: 作为终极关怀的“灵魂不灭”

“人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能结束

自己的不朽。”^[4]关于灵魂与精神不朽的追问始终都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命题,并引发对肉身离世、寻求灵魂不灭的漫长精神期待。人类对灵魂的认识阶段沿着神话语境下的具象灵魂观、宗教哲学意义上的理性灵魂观和科学时代的心理灵魂观推进。

(一)神话语境下的具象灵魂观

远古时期,初民崇拜神灵,形成“万物有灵论”^[5]。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社会》中提出,原初社会中的人们普遍认为灵魂的存在,并推崇“灵魂不死观”^[6]。原始人将灵魂看作是与躯体相似的形体,这一万物有灵的生死观被折射在神话、宗教和丧葬、祭祀等多种民俗文化层面。

人类对死亡的思考和神话传说一样悠久。远古中国神话中,不死之乡也存在于先民的幻想中,如《山海经·海内西经》的轩辕之国、《蜀王本纪》中的蜀地皆为长寿之邦。《山海经》有云:“开明有不死树”,上述不死之术的神话应该源自人类反抗死

收稿日期:2025-06-19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网络圈群舆情研判与协同引导机制研究”(AHSKY2022D043)

作者简介:雒有谋(1977—),男,甘肃靖远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网络舆论、新闻伦理与法规;孙宇航(2001—),男,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吴梦凡(2000—),女,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亡的能动意志。随着时代发展,中国人认为神和人都会死亡,但存在独立于肉体而永恒存在的“气”,“气”不灭则灵魂不亡,如女娲、盘古死后化为万物而生,夸父逐日而死精魂感念化为邓林,鲧被杀含恨而死肉身不腐等^[7]。

泰勒曾言:“万物有灵崇拜乃是一切宗教的源泉。”^[8]从初民在蒙昧状态创造的活物论神话到鬼神神话,宗教也随之打上了灵魂不灭的烙印。譬如,基督教的灵魂学说轻尘世、重后世,《圣经》主张原罪论,人需赎罪至生命终结才能灵魂永恒^[9]。再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主张“为主道阵亡的人,他们是活着的,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正如弗雷泽所言,原始宗教信徒确凿不已地相信死后的生命;道教倡导得道成仙,通过形体与心志的修炼长生不老,“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10]。超越死亡也是佛教信仰的核心,佛教主张生死轮回,肉体的死亡是获得新一轮生命的开始,生死以轮回相续,谓之“分段生死”,同时信奉“变异生死”,即在精神层面超越生死以达“涅槃”^[11]。

除却宗教,民俗中关于丧葬、祭祀和占卜的仪式也是灵魂信仰的产物。中国丧葬中招魂、陪葬、停灵,西方葬礼中的停丧、守灵等仪式都是以灵魂构筑人的生命循环。如岁祭、节祭等祭祀仪式均起源于祖灵信仰。此外,占卜、巫术等民俗文化也杂糅着对灵魂鬼神的信仰。

(二)宗教哲学意义上的理性灵魂观

在古希腊哲学中,灵魂含义广泛且演进过程复杂,不仅具有精神的意义,也具有物质及其运动,物质、精神相互关系,认识论等意义。从本体意义出发,灵魂被古希腊哲学家看作是物质或物质运动的动力。西哲始祖泰勒斯认为灵魂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活动原则,具有活动能力;德谟克里特将球形的原子叫做灵魂;本体论意义上的灵魂观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毕达哥拉斯将灵魂不朽、轮回的宗教观念引入哲学,他和恩培多克勒宣扬灵魂转世需要学习知识使其净化,为灵魂理论注入宗教血液。柏拉图将灵魂观从本体论和宗教论发展到认识论,赋予灵魂认识能力,将其当作独立运动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主张灵魂非物质,不能脱离躯体存在,并划分了灵魂的功能和等级^[12]。

在中国,与丧葬、祭祀等灵魂信仰的民俗文化同时发展的还有对个体价值延续的精神不朽的探讨。古代哲人主张追求精神不朽,以“死而不朽”来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是实现精神永存的具体条件,即以实现人生价值作为超越死亡、达到不朽的方法,是从精神延续角度给予了“永生”的肯定^[13]。从孔孟到现代,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精神与心的不朽,此种不朽超越生死,同天地长存。无论灵肉统一还是精神不朽,中西方哲人都追求在生命可持续联接中领悟在世的意义。

(三)科学时代的心理灵魂观

随着科学技术的出现,人类对灵魂的研究也进入了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将灵魂纳入人类心理活动的范畴,人们对灵魂的认知也逐渐转向心理灵魂观。

巴甫洛夫、谢切诺夫等人的实验证明意识是大脑对外界刺激的一系列反射活动。当代脑科学在分子和细胞的基础上研究脑功能,分析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克服错误的灵魂观念。实验表明,胎儿在几个月时的胎脑对光反应的脑电图就和成人一样,使灵魂转世说失去理论根基^[14]。现代科学证实人脑是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意识活动是神经细胞输入和输出信息的过程,是大脑的一种生理过程,意识绝不能脱离大脑而独立存在,否定了“灵魂脱壳”的观念,灵魂和灵魂不灭的观念自然失去理论支撑,其所衍生出来的鬼神论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灭。

科学视域中,灵魂只是精神世界的代名词,这是灵魂应归之位。在某种意义上,对灵魂不灭的追寻又何尝不是人类对自我生命张大的渴求,想象逝者的存在成为生者面对死亡的心理活动,也是一切哀悼仪式的起源。死亡将悲伤哀痛的情绪带给丧亲者,而这种悲伤将在死亡这一行为发生后持续存在,哀伤的疗愈往往要经历一个长久又复杂的过程,葬礼这种哀悼仪式将逝者的身份从生物学死亡向社会学死亡转变,生者也能够有意义的重新建构中走向新生。而当物理空间的葬礼与哀悼仪式平移至赛博空间时,这种情感寄托第一次有了无限延展的可能性,人类灵魂不灭的终极渴求也被重新激活,以至于人们开始探求借助智媒营造的数字空间实现精神永生的可能性。

二、加速兑现: 从“哀悼”到“永生”

死亡是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事件,哀悼是生者因灵魂信仰对逝者的亲情义务表达。悼为怀念死者之意,哀悼一词强调情感行动,弗洛伊德认为哀悼的作用正是断联与逝者有关的期望和记忆。在维雷娜看来,哀悼是一种蕴藏某种力量的悲痛情绪,促使人们同过去告别^[15]。电影《寻梦环游记》有句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记忆是哀悼的情动的基础。当下,数字可供性延展了哀悼空间,人们在持续联结中体会着记忆的恒久性^[16]。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哀悼应被视为以记忆为基础的情动体验,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考察新技术条件下媒介本身带来的情动属性。

(一)前数字时代的传统悼念

传统的线下哀悼仪式具有时间限定性和空间限定性,丧亲者需要通过“在场”的具象化行为寄托情感。参与群体往往局限于丧亲者家属和其他社会关系网络成员,哀悼仪式呈现出差序格局,关系性高于情感性。

记忆的开展离不开场域的搭建和介质的赋能,媒介是承载哀悼内容的渠道,也是影响哀悼实践仪式的因素。在信息社会来临前,坟墓、讣告、遗书、留声机等媒介都是丧亲者处理哀悼进程的技术手段。“死尽哀”“祭如在”是中国祭祀哀悼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人们以“墓”作为情动媒介,以陪葬物品寄托生的哀思,通过打幡招魂、吊唁、扫墓祭祖、哭葬等传统线下仪式承载情感^[17]。基特勒感慨:“如果墓碑是树立在文化开端的象征,那么媒介技术就能召唤神灵。”在西方,媒介技术的革新让留声机、电报等设施承担沟通生死、纪念与哀悼的角色,赋予大众招魂的媒介可供性^[18],而新媒介所构成的景观让死亡具备新的呈现方式。从坟墓到电报,众多灵媒在前数字时代的悼念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隐蔽且重要的功能,在不同的记忆文化中体现着灵魂不朽的永恒命题。

(二)数字时代的互动悼念

无论是情动媒介的线下哀悼还是在 Web1.0 时代的线上悼念,生与死的对话都是单向诉说。2000 年,我国出现了第一家祭祀网站 Netor 网同纪念,

借助网络技术手段将现实的公墓和纪念馆转移到线上,丧亲者可通过操纵鼠标完成网上“点蜡”“烧纸”“献花”等哀悼仪式,以上传逝者图文视频的方式完成情感联结。

Web2.0 时代,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延展了哀悼空间,让哀悼仪式进入全民书写的时代,所有人都能看到送葬者,听到敲钟声。网络悼念可以在多个场景进行,微博、微信、纪念网站、数字账号等数字空间集结了大量的情感记忆,马德雷尔认为这是一种与逝者的持续扭结及与其他哀悼者形成共享社区的可能性。Facebook 的“遗产联系人功能”、豆瓣的“豆瓣公墓”小组、B 站的逝者纪念账号等数据化空间都为哀悼者集体的情动仪式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网络空间中,生死联络随时举行的行为挑战着将死亡作为人生终结的传统。如网友将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作为“延展性情感空间”,充斥着同情、悲伤的情感流动,以数字化死亡挖掘生死的“有机联系”^[19]。除基于强关系的私人悼念和民众的自发悼念,媒介记忆建构路径还包括媒体事件的公共悼念,如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日”,以电子纪念碑的形式构建集体哀悼的记忆,延展承载死亡的民族情感和集体记忆,无数的情动在网络哀悼的仪式中共鸣,以空间和情感的流动性生成新的情动^[20]。

(三)赛博空间的数字永生

随着数字技术对认知世界的形塑能力趋于饱和,仿真技术突破人类认知壁垒,赋予人们生死“对话”的能力,人工智能将逝者的数字痕迹作为基础资源,借用语言编码技术模仿逝者的交流习惯,打造数字化死亡的新景观。2015 年,Relika 的创始人 Kuyda 收集逝世挚友在社交媒体的对话信息,通过数字技术生成“AI 版故人”;2017 年,詹姆斯设计纪念软件 Dadbot,采集已逝父亲的数字信息,该程序可模仿逝者的谈话风格实现与生者的对话。

“生死对话”多以 Blender 和 DialoGPT 作为底层框架,3D 建模、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则进一步让逝者可触可感。2013 年,在一场超越时空的演唱会中,邓丽君被虚拟投影技术“复活”,但这仅仅是光影技术层面的“可视”;在韩国 MBC 电视台纪录片《遇见你》中,制作团队通过 VR、AI、VFX 等技术创造已逝小女孩娜妍的虚拟人,亲属可通过触觉反馈手套实现身体参与,与逝者“可触”活动。

而真正实现灵生在线的是赛博空间中的数字

人,通过计算机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将人体结构数字化,能以仿真的视听系统“合成”逝者的“思想”,实现情感交互,逝者从被哀悼的对象演绎为“能动者”;肉身虽逝,但可通过数字技术分享生者的喜怒哀乐,将永恒的精神价值留存在数字空间中。Eternime网站可通过将用户的日常生活信息上传到云端并采用AI技术分析数据生成一个虚拟世界仿真的TA,具身离场后,储存在云端的数据人便可“再生”,实现叠合生死^[21]。

从追悼的“身体在场”、灵媒沟通生死、数字“墓碑”、“生死对话”到元宇宙的数字来世,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承载着人们对肉身离场的情感哀悼,对抗着生存的孤独,满足生者“何处话凄凉”的寄思。人类永生的夙愿是否又能真正实现?元宇宙对身后世界的构思给予人们对于生命存续的思考。

三、赋权与赋能： 硅基生命的崛起

元宇宙以虚实共生的技术将现实世界镜像到虚拟空间中,将拟态仿真技术扩展到数字孪生体,实现三维空间的身体在场,现实肉身元宇宙空间中映射为数字化身,活灵活现地展现出一个具有灵魂和思想的虚拟人,从碳基肉身生命走向硅基数据生命,以虚实相生实现数字永生。

(一)记忆永存

大卫·伊格曼提出死亡的三种形式,遗忘则是最后一环,即当逝者的记忆被清空时,则意味着其面临最后的精神性死亡,而数字化则将人的记忆数字化存储,超脱了死亡的终结,生者借助数字化身抵抗对逝者的遗忘,过往记忆在遗忘和唤醒中循环往复,死亡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22]。

记忆是个人存在的身份参照,是自我与他人相区别的证明,记忆本身以大脑作为承载介质,而数字时代衍生出记忆的新类别,即通过数据承载外化的记忆^[23]。例如人们在数字化生存中留下包括聊天记录、生活记录等一系列足迹,这些数字记忆是人们在虚拟空间的记录,包含着个人的身份信息和社会互动信息。在元宇宙中,社会形态的记忆都以数字方式呈现,实现数字永生的第

一步就是构建外化记忆的基本模型。扬·阿斯曼将记忆外化分为模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文化传承记忆和社会交往记忆^[24],因而数字记忆不能只考虑个人记忆,要放在整个系统模型中考察,记忆作为主观的精神存在,其呈现方式也应该是非线性的。

在元宇宙中,虚拟人通过复刻人的行为实现模仿性记忆,如数字人梅兰芳的兰花指动作;通过搭建场景和还原物品实现对物的记忆,如开天工作室无限少女手中武器取材于《神笔马良》;通过文化符号产生文化传承记忆,如数字人天好的国风造型;通过语言交互技术完成社会交往记忆,如数字梅兰芳的京腔等。

(二)意识上传

当个体的记忆与信息被收集记录到数字空间时,通过意识上传便能塑造数字自我,用户在脑中生成的每条数据都经由物理实体传输进入人造基质。在元宇宙中,人类的意识可以被复制保存,意识上传也就成为数字自我的终极表现形式。根据意识上传的途径的不同,数字永生可以分为数字孪生和数字再生两种类型。

数字孪生是在虚拟空间中构建出与现实世界功能、特征一致的仿真模型的技术,收集个人数据以数字孪生的方式可以生成一个新的数字个体。在影片《黑镜》第二季 *Be right back* 中,女主角玛莎的男友艾什意外去世,玛莎将艾什在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上传到智能软件,塑造了一个AI艾什,AI艾什能还原艾什的容貌、气味、声音、性格等具象化特征,代替逝者承载玛莎的情感。但影片中AI艾什程序设定是用来取悦玛莎的,其本质是一种被美化的数据,与真实的艾什存在着差异,既没有思维也不会变化,被玛莎弃之阁楼成为“数字幽灵”,这也揭示了数字孪生因无法获取思维数据而导致了困境。

数字再生则需要借助脑神经上传技术实现,意识被扫描神经数据从人脑上载到元宇宙,当肉体腐坏,大脑陨灭,人类仍能以数据化的意识生存在元宇宙中,成为硅基体,即“纯电子人”^[25]。动画《万神殿》身患绝症的主角大卫的意识被科技公司上载,以“电子人”的形式被迫为科技公司劳作。在《上载新生》美剧,男主角内森通过大脑逆向扫描读取记忆,将意识上传到“顶级天堂”的系统中。在肉身部分保留脑神经系统,意识数据可以循环流动,即希拉里·普特南所提的“缸中之脑”时,人

类就会以“半电子人”的碳基硅基混合体的方式存活。如在动画《爱,死亡和机器人》中,女主角桑尼肉身被毁,以“缸中之脑”的方式将意识寄存在怪兽分身中。更为高级的数字再生形态是意识上传和下载的双向传输,意识不但可以由人体传输到计算机,也能反向由计算机下载到“义体”,那么上载者可成为人造碳基的“克隆人”。在美剧《副本》中就有这种设定,将死者的皮质层从原身取出放进克隆体,便可使死者在另一具身体里“复生”。

(三)上载世界

意识上传必须要通过强大的云端才能实现永久的存储,而元宇宙则以庞大的数据存续空间、虚实共生的虚拟场景搭建数字来世的天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将元宇宙建造成与现实世界高度照应的镜像世界^[26],并以此打造现实的来世生活。2021年发布的Ominiverse Enterprise云平台构想设计一个将现实世界一比一复制的元宇宙虚拟世界,其创造的Blackbox的数字孪生产品是可以部署到现实世界进行交互体验的设计空间。2020年上线的由亚马逊出品的科幻剧集《上载新生》中描绘了一个数字孪生后的元宇宙来世——“湖景庄园”,在这个看似超脱现实世界的“虚拟天堂”里,主体结构模拟现实的酒店建筑,消费结构、等级秩序乃至广告插入都与现实世界无异^[27],逝者的意识被上载后,可以在湖景庄园中继续具身感知与现实世界产生联结。

以新技术在元宇宙天堂中创造新生服务与产品,可以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数字原生空间,虚拟原生空间具备全新的交互场景、任意设定的虚拟数字主体,可以让交互对象超越对现实的束缚,颠覆对已有世界的认知。在《黑镜》第三季病危的老年人能在圣朱尼佩洛系统调整自己的身体参数,可以自由选择虚拟空间中数字自我的容貌、年龄、性别,创造了一个“转世”与“新生”的数字天堂。

斯宾诺莎曾言:“数据可以永生。”^[28]记忆永存、意识上传、上载世界三条路径是人类对极致数据化生存的构想,也是实现智能永生的技术基础,基于这部分构想人们得以窥见元宇宙中数字自我和肉体自我、意识与身体、数据与肉体、硅基人与碳基人的复杂关系,而在数字永生真正到来之前,人们更需思考技术幻影的伦理风险以及死亡离场的哲学意义。

四、伦理审视:数字永生下的情感期盼与伦理冲突

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当人们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先行到死中去”,才能“向死而生”,挖掘生存的意义^[29]。叔本华也主张死亡为意义的追寻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建构了人类身体的仿真,也打造了“情感”的流动,将鲍德里亚的仿真社会学推向现实^[30],其为永生打造的时空观也引申出新的生命观,重新解读了来世信仰的理想激励与数字伦理。

(一)灵魂不灭的情感信仰与恒久悲伤

米兰·昆德拉将遗忘视作一种在生命中不断上演的死亡形式,而数字记忆帮助个体保存情感记忆缓和悲伤^[31],逝者留下的信息被留存为恒久的纪念对象,其数字遗产能唤起生者的回忆,生者可以自由选择追忆数据来保持与逝者的持续联结或删除数据远离悲伤回归当下日常生活,留存在数字空间的数据可视为逝者身后世界生命的延续,象征着虚拟永生的存在,减少生者因生理记忆的退衰勾连丧失的悲伤,告慰延续逝者仍在的情感。

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永生一方面以这种网络遗产的形式将持续悲伤社会化诉诸转向集体冥思,将对挚亲的寄思化为再生的动力,实现自我疗伤。另一方面,数字人的发展则将离场这一死亡现象具身拟人化,通过仿真技术再现身体在场和灵魂不灭,具身离场不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拟像的数字人不再是静态被动的寄思存在,而是能进行情感交互的拟化对象,能积极地回应生者的呼唤,延续逝者在世的陪伴价值,其独特的媒介景观修复了生者悲恸的情感,人们在虚拟的“第二人生”的精神乌托邦中再造灵魂再生的来世信仰。同时,生者也可以在媒介圣道中消除对死亡的具象化恐惧,重新界定生死界限,以永生的理想激励实现对当下生活的自由探索,在不惧死亡的生命可循环的观念下获得彼生的自由。

但数字永生在延展死亡记忆、寄予生的希望的同时,其生命价值延续而不是重生的本质则带给生者哀痛的持续放大。生死叠合的边界在缓解生者哀恸的同时,也会使其被困于离场记忆的伤痕中。媒介营造了逝者拟真在场的幻象,并以这一

技术迷思造成生者在反复接触拟化同在中体会着持久创伤。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32]。生者在伤痕的重复揭开中不断接受着痛苦的存在,数字永生固然重新定义了死亡的存在,然而“庄周梦蝶”之后,生者仍应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二)数字失范的情感假体与伦理危机

数字永生是这一时代极具诱惑力的神话,却也带来了人文的噩梦,数字技术具身在与人类共生之间面临着如何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和抵抗技术蔓延导致隐私侵犯的双重挑战。埃吕尔的技术哲学主张技术的自主逻辑性往往使人类难以掌控和逃离技术^[33],数字技术和身体的每一次融合都是一场博弈,不可避免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危机。

虚拟数字人作为拟化同在的文化景观,其情感假体的塑造必然不仅是一组数据和信息的组合,而且还是基于逝者所有数字遗产的整合创造的寄托情感的能动性意志个体,这就使得信息共享的技术搭建和信息保护的原则产生了悖论。无论中西方传统的价值观,逝者的个人信息都应受到保护,而数字永生则将逝者的隐私“活化”,逝者的隐私边界不断弱化,从保护与怀念转向利用隐私获得永生,人们对隐私的态度日益流变^[34]。与此同时,技术假体是在网络云端公开呈现的,其数字遗产就会在接受网络围观中掺杂着技术便车带来的网络侵犯的风险。2024年,网络上涌现出诸多借助AI技术“复活”已逝明星如李玟、高以翔、乔任梁等的短视频,未得到家属同意却呈现广泛传播之势。在传统价值体系里,逝者个人信息更应受到保护与尊重。然而“数字永生”赋予公开和非公开数据“活化”的属性,使其成为承载个体精神意志的实体,这种变革令逝者隐私保护愈来愈难^[35]。生者创建“数字永生”的动机,究竟是缅怀还是利用?二者界限亦渐趋模糊,难分难辨。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具身离场的数字再生是基于经济基础打造的技术服务,这势必会在货币挤压中消解亲情的哀寄。Vlahos公司推出了一款“数字人”的订阅服务,用户可以每个月通过付费和“数字亲人”进行互动,将数字生命明码标价获取商业价值,个体生命价值延续的追寻实质上只是商业出境的利益需求,商品迷思和货币挤压背离了数字永生的出发点和生命价值的创造性,死亡逐渐被经济与技术所渲染,生命日益科技化。在实现数字永生的进程中,人类意识上传催生了新

兴产业链^[36]。其中,新兴符号、产品、交易方式所衍生的不稳定组织关系、价值认知偏差,或将引发新型权力博弈,亦会对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结 语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赋予了死亡意义,生命具有现时性才能体会本真性,数字永生解构了死亡的内涵,人类在生命的存续中消解着对其本真性和整体性的度量,走向个人虚无主义的极端化。若一味沉浸在技术幻影打造的“第二人生”中,人们很难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保持对生命朴素的想法,亦无法坦然面对死亡。

参考文献:

-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20:61-73.
- [2]NANSEN B,ARNOLD M,GIBBS M,et al.The restless dead in the digital cemetery[J].Digital death: Mortality and beyond in the online age,2014(1):111-124.
- [3]FLUSSER V.The surprising phenomenon of human communication[M].Berlin:Metaflux Publishing,2016:22.
- [4]昆德拉.不朽[M].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92.
- [5]孙浩然.老子的道与原始宗教灵魂观[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42-45.
- [6]周艳芳.中、希神话生死观之比较[J].湘南学院学报,2011,32(3):46-49.
- [7]尚子楠.上古神话中死亡灵魂及冥界神话思想论析[J].兰州学刊,2013(12):220-221.
- [8]王秉翰.略论东、西方的“灵魂论”[J].科学与无神论,2005(3):35-36.
- [9]王雅晨.从宗教角度浅析中英“死亡”委婉语异同[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3):101-103.
- [10]张晓俊.从炼度看道教的死亡观[D].杭州:浙江大学,2013.
- [11]孙禄.浅谈宗教死亡观研究对死亡教育的意义[J].课程教育研究,2015(14):16-17.
- [12]张晓楠.古希腊哲学中的灵魂问题初探[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9(2):57-60.
- [13]吴博群.《左传》生死观及其文化意蕴[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0.
- [14]许锡芳.灵魂观的演变[J].学海,1996(1):47-51.
- [15]张梦园.数字时代的哀悼:一种情动媒介的视角[D].深圳:深圳大学,2023.
- [16]赵晨楠,侯欣洁.社交媒体中悼念普通人行为研究:以“墨茶official事件”为例[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2,30(10):40-46.

- [17] KITTLE F.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 [18] 彼得斯. 对空言说: 传播的观念史 [M]. 邓建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142-206.
- [19] 李丹, 杜骏飞. 我虚拟, 故我在 (2): 数字化死亡 [J]. 现代出版, 2023(6): 41-56.
- [20] 李红涛, 黄顺铭. 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 南京大屠杀 纪念与数字记忆的个案考察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24(1): 5-26, 126.
- [21] 周裕琼, 张梦园. 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2, 29(12): 32-52, 127.
- [22] 王嘉乐. 在网上死亡还是永生? 生死传播之间的数字遗产论争 [J]. 青年记者, 2023(22): 112-114.
- [23] 石中钰. 数字永生的幻影: 虚拟数字人与记忆数字化 [J]. 东南传播, 2023(6): 28-32.
- [24] 阿斯曼. 文化记忆 [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50-180.
- [25] 陆嘉宁. 人类灵魂的数字编码: 科幻剧集中的“上载智能”叙事探析 [J]. 中国电视, 2023(9): 101-109.
- [26] 黎坤, 张毅, 吴新. 重构现实, 数字孪生下的镜像世界 [N]. 电脑报, 2024-12-09(3).
- [27] 何源堃. 《上载新生》: 关于数字化未来的反乌托邦话语 [J]. 艺苑, 2020(5): 38-39.
- [28] 宋美杰, 曲美伊. 作为生存媒介的元宇宙: 意识上传、身体再造与数字永生 [J]. 东南学术, 2023(3): 206-216.
- [29] 李晓明. 海德格尔的死亡问题研究 [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6.
- [30] 刘琴. 生死叠合: 离场记忆的情感仿真、拟化同在与数字永生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9): 33-42.
- [31] 陈元翔. 逝者犹可追: 基于数字媒介的持续联结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22.
- [32] 陈刚, 李沁柯. 穿梭时空的对话: 作为媒介“安魂曲”的数字遗产 [J]. 新闻记者, 2022(11): 31-42.
- [33] 李伟, 卫子昊. 从“缺场共在”到“虚实共生”: 元宇宙时代身体-技术的关系变迁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3, 45(8): 48-55.
- [34] 普金娜, 保虎. 数字时代个人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与破解路径 [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1): 55-61.
- [35] 王雅文, 谷秀洁. “数字永生”及其伦理问题初探 [J]. 新媒体研究, 2024, 10(22): 7-12.
- [36] 张爱军, 蒋玉. AI“复活”逝者: 技术幻影下的数字永生及伦理考量 [J]. 江汉学术, 2024, 43(5): 63-71.

From Digital Mourning to Digital Immortality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Luo Youmou, Sun Yuhang, Wu Mengf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digital media has reconstructed the media ecology of "dialogu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and has evolved into a "spiritual medium" for emotional interaction. Thus mourning ceremoni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offline to online. The emergence of the meta-verse has deconstructed humanity's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death, paving the way for digital immortality through its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With the advent of this "singularity", human beings must maintain a sober ethical consciousness when embracing the existential revolution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ical immortality. When digital replication technology tries to simulate the biological reality of emotions, and when algorithm-generated virtual personalities become substitutes for grief and sustenance, are those "emotional prostheses" suspended in the data cloud dissol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human mourning behavior? Is this 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ed picture of immortality a poetic extens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 or an emotional illusion woven by technical reason? In the issue of technical possibilities and ethical justification, we need to always guard the warmth and awe of human nature that cannot be digitized.

Keywords: intelligent media; digital mourning; digital immortality;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拟剧理论视域下青少年网络社交的 数字身份建构与伦理挑战

张丽丽^{1, 2}

(1. 青岛滨海学院 教育学部, 山东 青岛 266555; 2.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虚拟的社交舞台为青少年提供了开放互动的空间,塑造了他们在数字时代的社交和文化认同。青少年群体通过积极的内容创作和个性化表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构自己的数字身份并塑造自身“人设”,推动着网络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动态创新。同时,网络社交也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出现人格异化、人际情感危机、网络非理性表达等伦理困境。要想实现促进青少年在数字时代健康发展的目标,需要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响应青少年的现实诉求并强化平台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拟剧理论;青少年;网络社交;数字身份;伦理挑战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12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个性的表达形式和互动方式,拓展了青少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和信息获取渠道,对其身心健康、社交关系和身份认同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用户规模突破11亿,其中10—19岁青少年用户占比达13.0%^[1]。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连接青少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媒介、桥梁,其开放互动的网络交流空间成为青少年自我表达和社交互动的重要窗口。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从“镜中我”的社会学理论出发提出了拟剧理论,强调在社交互动中如何表演和展现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一理论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作为演出者的社会成员在舞台上关注自己所呈现出的形象,并通过模塑和修改使表演与它所面对的社会理解和期望相符合。”^[2]²⁹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积极参与内容的创作与传播,在社交互动中建构自身的角色认同,呈现出不同话语

体系相互碰撞的多元话语结构。这种网络话语表达不仅展现了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拟剧理论为研究青少年的网络社交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通过对青少年数字世界的社交表达模式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网络对其心理、行为及社交的影响;同时,有必要通过对青少年群体自身网络行为的科学规范与引导,以帮助青少年建构符合大众社会期待的角色形象,培养其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一、从现实到虚拟:数字时代 青少年社交模式的转型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型,以血缘、地缘及社会习俗维系的家族、社群模式逐渐向“原子化生存”模式转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自

收稿日期:2025-03-14

基金项目:青岛滨海学院专项研究项目“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角色定位重塑研究”(2022ZY01)

作者简介:张丽丽(1985—),女,山东东营人,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理论与管理、媒介与文化传播。

由与独立,追求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目标^[3]。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虚拟世界的互动逐渐取代现实中面对面的交流,在促进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语境。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的用户,青少年群体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在虚拟空间里建构自我身份,表达观点,与他人建立联系,也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

戈夫曼在其著名的社会学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从表演、剧班、区域与区域行为、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印象管理等六个方面对拟剧理论进行了诠释,将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或交往视为演员按照编制的剧本所进行的戏剧表演,个体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自身行为进行设计或表现进行个体的“印象管理”,以此来塑造他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以实现社会互动中的自我形象塑造^{[2]179}。青少年群体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积极参与内容的生产创作,在符号信息的生产传播中有意识地塑造和展示符合自我预期及社会认知的个体形象,在满足自我认同需求的同时增强自身的社会存在感。

在社会语境变迁的时代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为青少年群体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社交中加深了自己在社会事件中的参与度,输出自身的现实诉求、文化心态与价值理念,同时在内容创作表达中提升了自身社会效能感与社会认同度。然而,伴随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网络的虚拟化、匿名性和碎片化等特征在丰富了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和信息渠道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负面效应。如部分青少年沉迷在虚拟世界中构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而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的结构异化;碎片化的信息对青少年的注意力集中和深度思考能力形成冲击;网络成瘾、隐私泄露等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趋于消解,个体在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和选择的同时,也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孤独、焦虑及身份认同的困惑^[4]。青少年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养成的关键阶段,对社会归属感及自我认同的探索更为迫切,为其提供稳定有效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社会联系和健全的自我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人设的自我塑造： 青少年数字身份的建构

戈夫曼将个体的自我呈现表述为人们通过修饰真实的自我而向观众呈现经过剧本设置演绎后的角色自我,以使观众感知到个体所期望呈现的理想形象^{[2]61}。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由多元主体生产并传播,为青少年的社会角色呈现提供了一个虚拟舞台,他们通过积极的内容创作和个性化表达建构自己的数字身份,促进内容的生成与传播。在所呈现的网络表达中,从话题选择到内容生成再到传播分享,青少年通过加强“表演”形式、细节、风格等各环节的设计以塑造自身“人设”,增强社会影响力和社交媒体存在感。

(一)个性化内容生成:数字身份建构的多元化表达

良好的形象管理是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性和说服力的传播符号,可有效影响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在复媒体环境下,青少年群体针对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理念、性质和特点等,有针对性地打造人设以建构个体的多元化数字身份^[5],个体的自我呈现变得更为复杂。多元化的形象管理为青少年带来自主性的表达空间,其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情感,以独特的主题、个性化的呈现方式、真实的情感表达和积极的社交互动建构自己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独特角色,满足其在不同社交圈的认同需求。

在内容生成层面,青少年群体倾向于选择与个人兴趣相关性高的主题进行创作,通过分享个性化观点、展现创意形式、融入个性化元素、与粉丝积极互动等方式创新性地参与社交,与他人产生共鸣,塑造个人形象。以B站为例,作为最受欢迎的二次元文化和视频分享平台,B站拥有庞大的青少年用户群体,其弹幕文化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群体独特的个性化内容表达,他们在其中通过二次元、鬼畜文化等富有个性化的方式交流与互动,在内容的解构与重构中与其他用户建立深刻连接。

(二)融媒体化传播范式:数字身份建构的多维路径

“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是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信息接收者在对信息解码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个

体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等的不同会使信息的解码出现差异性^[6]。因此,当提供的信息越趋于直观时,越能减少信息接收者的解码差异性。社交媒体信息的传播方式呈现出融媒体化趋势,内容生产者将抽象的文字、数据等信息符号通过图片、视频、动画、图表、VR等形式呈现出来,使呈现的信息更直观、生动、易懂。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青少年群体积极融合多种媒体元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造出诸多富有创意和表现力的内容,在社交互动、娱乐和文化领域中积极探索数字时代的表达形式。

在社交媒体时代,青少年群体表现出卓越的学习能力,通过对音视频编辑软件、图像处理软件、AI软件等熟练应用,创作出系列创意作品。如在B站平台将不同音频和视频片段混合剪辑创造出滑稽的鬼畜视频效果;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使用特定的音乐剪辑营造特定氛围以分享个人故事;借助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创作有趣的自拍照片或视频;在直播互动中使用数字人化身、虚拟表情符号等。青少年通过对多种媒体形式的整合,个性化、富有创意地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些创意表达也进一步塑造了数字时代的网络文化和社交风貌。

(三)符号化语言表达:数字身份建构的意象塑造

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改变了传统的个体间的互动交流方式,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为个体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提供了更多机会。拟剧理论提出,表演者自我呈现的行为具有特定的符号意义,用户依据自己的认知对表演者的行为符号赋予特定的价值解读^{[2]47}。青少年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倾向于借助特定的符号表达个人内心观点、塑造自身角色。“爷青回”“破防了”“awsl”“yyds”等系列符号化表达,不仅丰富了社交媒体的内容形式,而且强化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表情符号、网络用语、GIF动图等一系列形式增加了信息传播的趣味性、情感性和创意性,共同构建了充满创意和情感的多元社交媒体环境。

伴随青少年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对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成为年轻一代新的诉求。B站因其平台属性和文化属性与青少年高度契合,成为国内年轻用户群体聚集的视频内容平台。在2023年B站百大UP主的评选中,知识区以23位上榜创作者位列第一。“罗翔说刑法”“影视飓风”等一批

内容创作者,通过优质内容的输出吸引了大批年轻群体的关注,推动了B站知识区的传播热度。B站用户群体借助表情包、创意文字评论等系列功能性视觉符号,通过弹幕实时参与互动,不仅增强了观看的趣味性,也促进了视频内容的社交分享和口碑传播。

符号化的话语表达是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社交中表达情感、态度和身份的独特方式,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手段,而且深刻影响着网络文化的形态和发展。青少年群体通过共享和使用特定的文化符号,在网络社交中寻找和建立归属感,在网络互动中构建社会关系,并在话语符号的创造、传播和解读过程中赋予其新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年轻一代对于网络与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态度,还展现了他们在网络文化领域的积极创造和参与能力,为网络文化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价值观隐忧:

青少年网络社交的伦理挑战

社交网络应用、在线游戏、虚拟聊天工具等社交媒体工具打破了人际交往的时空界限,为青少年的社交和网络表达提供了更广泛的渠道,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虚拟的社交舞台,不仅为青少年表达自己、塑造角色和展现自我形象提供了机会,还通过社交反馈、信息过滤等方式影响着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养成。过分沉溺及不恰当地使用社交媒体,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养成产生负面影响。

(一)“认同”的盲目追求:人格异化的隐忧

认同(identity)源自拉丁词“idem”,指个体对于自我所属的群体、社会、文化或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和评价^[7]。青少年正处于心智发展、自我意识觉醒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思维活跃,对自我角色认同有较强的探索欲,由于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判断力,面对复杂的信息和多元的价值观观念时往往难以作出独立的判断。这种不确定性容易导致部分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错误地估计自身的能力,盲目地追求虚拟的身份认同,从而造成青少年个人信仰的迷失和价值观的扭曲。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即时反馈性等特征,部分青少年在追

求认同的过程中体验到力量与能力的虚幻膨胀,而当回到现实时则可能遭遇自我认知的剧烈冲突。由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身份错位,导致个体自我认知的撕裂,从而陷入人格异化的困境。这种现象目前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引起了较大关注,它不仅影响到青少年的日常行为和社会互动模式,也关系到青少年内心世界的健康发展。

伴随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近些年青少年亚文化现象如“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网红文化”等现象层出不穷^[8]。这些亚文化为青少年表达自我、寻求归属感提供了平台,但不加引导也可能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误导。如部分青少年为寻求网络共情,盲目地追求消极、颓废、悲观的网络话语表达或盲目地跟风网红,以求在互联网社群中赢得伙伴对自己的身份与价值观的认同^[9]。“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努力,你努力还有什么用”“咸鱼总有翻身的一天,但翻身后还是咸鱼”等以颓废、悲观、焦虑为主题的网络话语充斥社交平台。正处于价值观养成期的青少年如果长时间受与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相悖的价值观影响,就会对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观认同产生困惑。

(二)过度媒介依赖:现实人际情感危机的隐忧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强调人们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看法和体验,是人们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10],主要包括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总体认知和生活中的情绪体验两个维度。较强的主观幸福感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个人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有助于青少年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更加积极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

伴随青少年社交的数字化转型,现实人际社交频率降低。Just So Soul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社交趋势洞察报告》中显示线上已成为年轻一代构建社交关系的重要渠道,“零糖”社交成趋势^[11]。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也提到,个体在社交网络中重新定义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但在网络中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时,却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孤独^[12]。社交网络给青少年提供了短暂逃离现实的可能及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人生的体验,然而网络空间的数字交往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中的具身交往,相反长时间沉溺于网络社交会进一步加深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拉大现实中个体间的情感距离,进而降低个体的主观

幸福感,甚至带来人际情感危机。

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和桑德拉·鲍尔-洛基奇指出,个体对媒介依赖的强度越大,所投入的个体注意力和情感越多^[13],一旦失去它或者减少使用时间,则会变得焦虑不安。由于媒介素养的相对缺乏,部分青少年长时间沉溺于网络社交导致产生“媒介依赖”现象,过度媒介依赖进一步加深青少年对现实生活的疏离感,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的结构异化。此外,互联网基于算法的精准推荐进一步窄化了青少年的信息获取面,使得年轻受众长时期接受同质化信息而形成信息孤岛,加剧网络“巴尔干化”^[14]。对于个人价值观及判断力尚处于形成期的青少年来说,简单粗暴的算法推荐可能会进一步局限个人发展、淡化社会黏性,不利于青少年形成全面、客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自我表达狂欢:网络非理性表达的隐忧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认为,狂欢般的生活是在官方世界的另一边建立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它打破日常的等级秩序,破坏严肃统一的话语体系,瓦解官方和民间的界限^[15]。狂欢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通过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威结构,允许个体暂时逃离社会规范的束缚,表达真实的自我和欲望。在网络社交平台中,传统内容生产的绝对流程被打破,每个个体可以自由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重构了网络时代的话语秩序。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其虚拟性、游戏化、草根性、匿名性等特点与狂欢的精神不谋而合^[16]。在网络“狂欢化”的心态作用下,调侃、戏谑、卖萌等形式的网络话语表达经过互联网的传播进一步放大,个体追求情绪的宣泄和满足,盲目的跟风与低级的戏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蔓延。界面上倾泻而出的弹幕对原有的视频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微博上“饭圈文化”“梗文化”的盛行、直播间的疯狂刷屏等,如同一场游戏与对话的狂欢。在网络狂欢的话语背景下,个体感受到的更强的群体支持感与网络匿名性的保护使其在进行网络话语表达时,更容易放大情绪反应,话语更易冲动、激进,缺乏理性思考和客观判断,从而产生更多的非理性表达。

社交媒体作为多元的交流平台,为个体提供了表达自我和寻求认同的舞台。网络的狂欢在一定形式上缓和了个体的焦虑,获得暂时的归属感和社交满足,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个体内心的焦虑,网络喧嚣之后更凸显了个体在现实中情感的

孤独与淡漠。此外,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长时期接触非理性的网络话语会导致个体认知偏差,影响其判断力和决策力,并可能导致部分青少年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脱嵌。

四、走向价值意义:积极应对 青少年网络社交伦理挑战

依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在日常生活中,个体通过语言或非言语行为(如姿态、手势等)塑造符合其期望的社会形象。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表演,日常生活中的公开表演不仅反映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主动塑造自我形象的意愿,也体现了社会规范和角色期望在社会秩序维护中的重要作用,只有社会中的成员呈现出与其角色相适应的行为模式,社会系统的运行才能有序和规范^[17]。

在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当代青少年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社交网络的普及构建了虚拟的互动空间,为青少年个性化观点的输出和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便利,促进了青少年创新思维的发展。然而,伴随网络社交的兴起,网络成瘾、社交焦虑、网络狂欢、价值观迷失等系列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的社会问题。如部分青少年沉迷于社交媒体的虚拟世界,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部分青少年面对海量的信息和多元观点,难以分辨是非而迷失自我。对青少年的网络话语表达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对于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自我提升,深化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

数字媒介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信息来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甚至构建社会身份的主要方式。物理阻断青少年与网络的接触不是有效的干预手段。青少年群体在数字媒介的环境中成长,面临着识别信息真伪、保护个人隐私、理解媒介内容背后的价值逻辑等系列复杂问题。提升青少年在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并促进其自我发展。

媒介素养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理解并适应媒介逻辑的能力、把握媒介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

的意识及利用媒介技术开展实践的能力等^[18]。伴随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素养的内涵也在不断升级,由关注原有的信息获取处理能力等实践技能层面逐渐转向关注更深层次的媒介批判及反思能力。对青少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包括帮助其建构对媒介技术本质的理性认知,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信息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提升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同时在媒介化交往中塑造健全人格,以避免出现价值观偏离。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单向度传播模式,专业知识生产的“中心化”格局被打破^[19],信息变得多元而复杂。青少年沉溺于繁杂的信息流中,如果缺乏较高的媒介信息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则可能随波逐流而失去自身的独立判断。此外,基于算法的精准推荐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孤岛现象,长期浸润于同质化的信息流中不仅可能限制个体视野的发展,而且可能导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削弱,加剧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当前部分青少年在网络社交中所呈现出的网络话语的非理性表达等行为,也暴露出部分青少年在自身媒介素养、独立思考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深化数字时代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合力,共同促进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如政府通过政策推广、资源支持等方式,营造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氛围;学校作为青少年学习和成长的主要场所,在人才培养中应注重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力;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应关注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同时,青少年自身应了解网络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提升应对复杂信息的甄别与反思能力,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运用理性思维辩证性地看待问题。

(二)构建全社会支持体系,响应青少年现实诉求和情感需要

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快速变迁,青少年在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多元价值理念的碰撞,学业和就业压力、代际观念冲突、人际关系压力等影响着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和心理发展。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当代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和社会参与,受到网络环境的显著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青少年在网络社交中呈现出的网络表达行为偏差或失范

行为,可以说是其成长过程中对社会角色预期与现状差异之间的一种自我调适反应。

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通常指个体从其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上的帮助和资源,它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也涵盖了情感支持、建议指导、心理慰藉等精神层面的支持^[20]。社会支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个体应对压力和挑战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时有助于促进其社会互动模式的优化。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不仅有助于青少年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而且为青少年成长提供必要的心理安全保障,为他们积极探索自我、建立自尊自信提供支持性的环境。

当前社会支持体系在响应青少年的现实诉求方面仍旧存在不足之处,如资源分配不均、包容性不足、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青少年的现实生活体验,也促使他们转而向网络寻求满足与认同。如部分青少年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时,由于缺乏现实中的干预和支持体系而转向网络发泄情绪,从而出现不当的网络话语表达,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和有效监管的不完善等也可能使一些不当的网络行为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指数高的个体大都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21]。构建全社会支持体系响应青少年的现实诉求,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协同合作。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应通过有效的亲子沟通 and 家庭教育为青少年成长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和安全的成长环境;学校承担着促进青少年掌握知识技能和养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职责,应通过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和丰富的课外活动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社会机构和民间组织可以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资源和服务等方式,如文化活动、职业指导和心理健康支持等以满足青少年的多元化需求。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构建全社会支持体系应重视青少年的现实诉求,构建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推动青少年的全面健康发展。

(三)优化社交媒体生态,强化平台责任意识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话语即权利”的理论中提出,话语不仅是表达和沟通的手段,同时是行使权利和构建社会秩序的关键^[22]。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是信息

传播的工具,更承担着塑造和引导公众话语的重要职责。强化社交媒体平台的伦理责任与价值导向,也是在数字空间中对话语权利规范的重要体现。

当前社交媒体生态复杂而多元,给青少年的网络社交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匿名性与低门槛性等特征导致网络上的负面信息和不当言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处理。平台如果缺乏必要的内容审核与监管机制,那么这些不当信息的传播会影响到青少年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其次,由于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不足和网络隐私意识薄弱,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容易成为隐私泄露的受害者。平台如果缺乏对青少年隐私数据的安全保护措施可能会导致他们的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滥用。最后,从平台运营模式层面看,社交媒体平台间存在着内容及用户的竞争,受商业化和利益的驱使可能会陷入流量竞争的怪圈。如果不对平台加以相应的约束,则会加剧用户的认知偏差,并引发相应的伦理和法律危机。

优化社交媒体生态,需强化平台的社会责任意识。平台自身可通过制定明确的社区规则和反馈机制,加强内容审核与监管,以有效减少网络不良行为的发生,为青少年的网络社交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同时,平台的算法推荐和内容审核机制在无形中决定了哪些内容能够被呈现。因此,社交媒体平台应加强其价值导向功能,通过推广积极的社会议题、鼓励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新表达等方式,推动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网络行为习惯和社会责任感。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互动空间,需进一步强化自身责任意识,提升平台公共价值,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合作,共同推进社交媒体生态的规范化发展。

结 语

青少年的网络社交文化不仅关乎个体的自我认同和发展,同时折射出在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社会心理的变迁,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社交媒体平台是青少年展示自我、表达个性的重要舞台,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在为青少年的话语表达提供便利渠道的同时,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养成。在多元价值观念不断碰撞的当下,青少

年尤其需要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建构积极的社会和身份认同。理性看待青少年网络社交文化所蕴含的意义困境,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优质、安全的媒介生态环境,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的实现不仅需要青少年自身提升其媒介素养,而且需要构建全社会支持体系,优化社交媒体生态,响应青少年的现实诉求,共同促进他们在数字时代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5-01-17)[2025-02-20].<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 [2]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 孙寿涛,张晓芳.断裂与弥合:数智时代Z世代“轻社交”行为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3(11):15-22.
- [4] KRAUT R, PATTERSON M, LUNDMARK V, et al.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53(9): 1017-1031.
- [5] 赵娅维.社交媒体中“复数”人设现象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 2023, 14(12): 13-15.
- [6] 张雨轩,韩传喜.媒介融合时代网络文学的编码与解码[J].当代作家评论,2021(1):39-43.
- [7] 燕道成,李菲.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3(3):46-54.
- [8] 杨军,叶林.“饭圈文化”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化解[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5):45-51.
- [9] 雷冰洁.关系的时间向度:当代青年人际交往价值观研究[J].青年探索,2024(3):70-79.
- [10]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3): 542-575.
- [11] Just So Soul 研究院.2024年社交趋势洞察报告[EB/OL].(2023-12-27)[2025-02-20].https://official-cdn.soulapp.cn/uploads/2024_a1aeb4c771.pdf.
- [12] 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涛,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82.
- [13] 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M].杜力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351.
- [14] 唐云锋,刘涛,王艳艳.网络圈层化、微博舆情传播与虚拟场域群体极化[J].浙江社会科学,2022(7):78-84.
- [15]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317.
- [16] 李红革,黄家康.弹幕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挑战及其应对策略[J].湖南社会科学,2022(6):52-57.
- [17] LAPINSKI M K, RIMAL R N. An explication of social norms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5, 15(2): 127-147.
- [18] 王珏.公共事件中青年媒介素养的典型表现与形成机制[J].未来传播,2021,28(3):21-26.
- [19] 沈雪,李欣.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权力的隐忧与反思[J].未来传播,2022,29(4):19-25.
- [20] BUUNK B P, HOORENS V. Social support and stress: the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exchange processes [J].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92, 31(4): 445-457.
- [21] 郭小弦,芦强,王建.互联网使用与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基于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6):5-12.
- [22] 朱振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9):32-37.

The Digit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Challenges of Adolescents'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turgical Theory

Zhang Lili^{1,2}

(1. Faculty of Education,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266555,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00, China)

Abstract: As virtual social stage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rovide open and interactive spaces for adolescents, shaping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digital age. The youth group constructs their digital identities and shapes their own persona through active content creation and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promoting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novation of online culture. However,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may lead to ethical dilemmas, such as personality alienation,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crisis, and irrational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ir media literacy, respond to their real demands, and strengthen the platform'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adolescents'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ramaturgical theory; adolescents;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digital identity; ethical challenges

古代大陈岛垦荒活动述论

安贵臣

(台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大陈岛垦荒活动早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存在,与中国大陆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从垦荒主体看,古代大陈岛垦荒经历了从越族人到汉族人转变的过程。古代大陈岛垦荒活动大多是民众求生存的自发行为,政府鲜有开发大陈岛的积极举措。清乾隆年间,中央政权才开始在大陈岛实行保甲制,将大陈岛纳入中央政权的行政管理体系。从垦荒内容看,古代大陈岛垦荒经历了从传统的渔农业、盐业向渔农业、畜牧业、盐业、商业和贸易等多业并举的转变。从垦荒过程看,古代大陈岛垦荒活动常与动荡相伴,兵匪矢乱对大陈岛来说是一种常态,严重迟滞了大陈岛垦荒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古代;大陈岛;垦荒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13

论述古代大陈岛垦荒的历史首先要明确大陈岛垦荒的范畴。大陈岛垦荒不仅指以海洋渔业等为主的经济垦荒,还包括大陈岛的政治、文化等所有的人类活动。也就是说,大陈岛垦荒史就是历史上大陈岛及其海域人类所有社会活动的历史。大陈岛垦荒活动早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存在,且与中国大陆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一、古代大陈岛垦荒主体及变化

《汉书·地理志》记录,最早生活在浙江地域的是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古越人,称“百越”^[1]。台州地处浙江东南部,也是古越族的栖息地。关于台州古越族的来源应该从台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去探求。台州有仙居下汤、玉环三合潭、大陈岛浪通门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文化特征与浙江其他区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极为相似,证明在台州最早的原始先民就是“百越”的一支。从现存的仙居下汤遗址、大陈岛浪通门遗址和玉环三合潭文化遗址中可以得出结论:最早生活在

台州大地上原始先民应于是越人。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在秦以前并没有人口迁入台州的记录。因此,可以断定于越人便是开发大陈岛的原始先民。

越国灭亡至秦汉,于越人的后裔复建东瓯与闽越二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秦已并天下,皆废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2]2973}。在秦末反秦斗争中,因东瓯无诸、摇领越人佐汉有功被立为东海王,都东瓯,“春秋时越国,秦属闽中郡。后越王无疆七代孙闽中摇,率越人佐汉伐秦,惠帝录其功,封姚(摇)为东越王(东海王),都东瓯”^{[3]780-781}。以上文献资料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于越的后裔东瓯族在秦汉时仍活动于浙江台州、温州等地。后来,东瓯在吴、楚七国叛乱后,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内迁去江淮,“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3]781}。一部分未迁去江淮的逃入深山,三国时被称为“山越”;另一部分或散居于江海之上。这些于越人与后迁入的汉族逐渐融合,成为台州文化发展的主体。自此,大陈岛垦荒主体开始转变为以汉族人为主。

收稿日期:2025-04-18

基金项目: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第六批立项课题“大陈岛垦荒史”(20WH60063ZD)

作者简介:安贵臣(1966—),男,吉林白城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地方文化。

二、大陈岛垦荒活动的初兴与沉沦

(一)先秦至五代十国大陈岛垦荒活动的初兴

于越人在台州及大陈岛地域的垦荒活动,《逸周书·王会解》说,周成王年间于越民以海蛤、文蜃及鱼皮之鞞、吴鲙之酱、蛟鼈利剑等进贡周王室,“越人献舟”^[4]。他们喜食海产,善于葛麻织品、铸造青铜器、造船与水战等。正如《越绝书》所云:“越人水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则飘风,去则难从。”^{[5]15}可见,先秦时代的于越人已经能够建造船只、使用青铜器和纺织品,大陈岛地域于越人的经济垦荒成就已经很高。同时,先秦时代大陈岛的于越人也有自己的文化系统:一是有自己的文字。光绪《仙居县志·地理志》云:“县西南四十五里,险绝不可升,有石壁刊字如蝌蚪。”清代学者王寿衍认为蝌蚪文即夏朝时越人之峒嵎文,“丹崖古篆百余字,奇奇怪怪同石鼓,仙潭山水自清幽,何必寻碑到峒嵎”^[6]。二是体现在大陈人的信仰上。台州民众有信仰鬼巫的习俗。台州学院高飞教授指出:瓯越人是台州的原住民,而瓯越始终有“信鬼神,好淫寺”的传统。这种传统并未因瓯越人的外迁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至唐时达到极盛,史称淫寺“烂漫于宇宙间”。至唐中叶狄仁杰巡抚江南“毁淫寺至千七百”,鬼巫之风才稍有收敛,但仍相当兴盛。以至到南宋嘉定年间仍呈现出“州之神祠,错峙纷出,以其牖一时之民,而庙千里之食,岂日无之,亦有空山断蹊,踵讹沿谬,而风靡波荡,遂赘其间,岂其乐,鬼重巫,越之遗风固尔耶”^[7]。大陈亦是如此,至今在大陈岛仍散处着十几座不明来历的寺庙。

秦汉至两晋南北朝是台州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期。那时的台州章安不仅是浙闽的海上门户,也是中原封建王朝借以管理和开发整个东南沿海的政治军事重镇,管辖着今浙江的台州、温州、丽水和福建的建瓯、福州等五个地区,被称为“东南一尉,声震海内”^[8]。此时,大陈岛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最早记载大陈岛的南朝宋孙洗的《临海记》说“海东有东镇山”。其所说的东镇山即指大陈岛。又言“洋山东百里,有东镇大山,去岸二百七十里,生昆布,海藻、甲香、矾等物。又有金漆,木用涂器物,与黄金不殊”^[9]。说明此时的大陈岛已经能够生产昆布、海藻、甲香等海产品,而且通过对外

贸易获得矾、金漆、木用涂器物等,证明大陈岛的垦荒已经小有成就。

隋唐至五代十国是台州海上“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时期。台州同日本、朝鲜的贸易最为频繁。在对日本的贸易中除朝贡贸易外,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在日本仁明朝年间(834—847),中日间私人商船的往来非常频繁。如中国商人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人,都自建海舶以船主身份多次往来于日本和台州、温州和明州之间^[10]。另外,此间台州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盛唐时期,日本统治者认定“大唐国者,珍国也”,把优秀的中华文明作为日本发展图强的学习榜样^[11]。因此,日本在公元630—893年的260余年间,先后任命19次遣唐使来中国。同时,鉴真和尚也东渡日本,大力弘扬天台宗教义,开辟了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天台山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南方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不仅带动了台州海上航运的发展,也让大陈岛在海上航运中的价值彰显在世人面前。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记载:“县东南280里有东镇山(大陈岛),自此山下望海中,突出一石,舟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12]213}这反映了当时大陈岛在台州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大陈岛已是当时南北海上航运的重要标识。

大陈岛丰富的海洋资源和重要的海上航运地位,使大陈岛即使在晋、唐300年海乱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农民、渔民、盐民起义和政权跌宕中,仍吸引了大量的流民聚集,从事各种垦荒活动,彻底完成了大陈岛垦荒主体由古越人向汉族人的转变,使大陈岛垦荒到五代十国时期取得了初步成就。据《嘉定赤城志》载,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僧人悟空在大陈岛建悟空院。悟空院有田84亩、地6亩、山18亩,总面积是108亩^{[12]272}。特别是在钱氏王朝统治台州的72年间,楼祖民先生指出,钱氏政权能够奉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兴修水利,奖励农桑,繁荣商业,使包括台州在内的吴越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超北方,致使台州海上丝路十分繁忙,高丽(今朝鲜)、新罗(今韩国)商人经常来台州经商,海船皆以大陈岛为指示标识或在大陈港停泊^{[13]24},对大陈岛的垦荒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宋元时期大陈岛垦荒活动的中兴

北宋政权在统一浙江过程中,未经历战争,使浙江的社会经济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杭州、明州、台州、温州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重镇,“夫浙连闽广,环海千里,蛮夷诸岛,交舶万艘”^[14]。就台州而言,当时台州的很多产品都畅销国内外,如茶叶、甘蔗、乳柑、金漆等。由于台州地处山区,陆路交通不便,所以这些产品的外销大多走海路,使海上航运的船只增加,这样就为大陈岛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条件。

两宋发达的造船业是台州海上贸易发展的前提。唐朝时,台州临海就是国内著名的造船场。一直到南宋,台州造船业都比较发达,且已经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且种类繁多,“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15]。先进的造船业和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忙,带来了台州社会的全面进步,促使大陈岛走向繁荣,“南宋时期,台州人口剧增,各行各业复兴,大陈岛人烟渐渐稠密,已蔚成海上集市”^{[13]30}。

元朝时期,大陈岛仍然是海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元政权于1283年在今台州椒江区设温台海运千户所,专管水上粮食转运和进出口货物。台州海运漕粮以章安为始发港,经大陈洋与日本、高丽等国进行海上贸易往来。但是,到元朝末期,由于蒙古统治集团贪腐成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再加上灾害频繁,导致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掀起反元斗争。至正中年间,方国珍与二哥国璋、四弟国瑛、五弟国珉率佃户渔民起义,并进驻大陈岛,把大陈岛作为抗元根据地。在此,反元义军梗阻海道,劫掠元王朝海运粮船等,沉重打击了元庭在浙东南的统治,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楼祖民先生评价方国珍:“自1355年到1367年12月归降朱元璋,方国珍管理着浙东三路六州十一县之民。在这段时间里,方国珍实施‘保境安民’政策,使辖境之民免受战乱之苦。除此之外,方国珍还修建城墙,防止入侵;修筑堤塘,兴修水利,鼓励农业生产;建办市舶司,开展对朝鲜、日本等海上贸易。”^{[13]34}这使大陈岛成为元末乱局中的方外之地,对于促进当时大陈岛的垦荒活动,维护大陈岛的海外贸易中转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明清时期大陈岛垦荒活动的沉沦与复苏

明代的大陈岛属台州府黄岩县管辖。明政权建立之初,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凋敝,南方反明势

力如张士诚、陈友谅残部退至海上,不断骚扰沿海地区。为此,朱元璋一方面积极加强海防建设,实行军卫制度;另一方面采取消极的海禁政策,以阻绝内外勾结的通道。1388年,明朝实施废县徙民政策,将浙江昌国(今舟山)废县徙民,并把徙民范围扩大到浙南凤凰山(今大陈岛)及南田、玉环、高不、南麂、东洛诸岛,迁走了大部分岛上居民,致使大陈岛垦荒活动陷入停滞。于是,荒芜的大陈岛便成为倭寇劫掠浙江沿海的栖息之地,“山岙阔大,外海别无岛屿,明初以来倭俱假此栖泊”^{[13]42}。

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勘合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各自方物来华,明朝廷收贡品、购方物后,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物品。各国贡期或3年、或5年。对日本则规定10年一贡。贡舶必须持有明廷事先所颁“勘合”(执照签证)。这种“勘合贸易”远远不能满足中日两国的需求。于是,日本海盗商人与中国沿海的一些势家、奸商勾结起来,组织武装集团,深入内地劫掠,遂使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当时,台州沿海防务十分空虚,“行伍空虚为极,武备废弛为甚,室庐不蔽风雨,人心无恒,号令寸步难行”^[16],导致倭寇入侵台州,如入无人之境。故台州自倭患以来,屡遭侵扰,而大陈岛恰恰是倭患侵扰台州的海上基地。戚继光等台州抗倭时,时任台州知府谭纶等在大陈岛擒获倭酋林碧川等84人、毙38人,并在上大陈岛风门岭修建墩台,设兵卒4名,配有旗锣、烟筒等。1571年,戚继光荡平台州倭寇后,朝廷派兵驻守大陈岛,此为大陈有可考官治之始。

总之,明代的大陈岛因倭患、海盗肆虐、走私猖獗,数度成为倭寇、海盗的根据地。时局不稳,使大陈岛民间的经济垦荒活动踟蹰前行。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在其著作《明季北略》中说:“臣细访闽船之为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府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一曰钓带鱼船,台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院山等处,出产带鱼,犹闽之莆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官军不敢问。此二项船,皆与贼通,贼先匿大陈山等处山中为巢穴,伪立头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为输银之多寡,或五十两,或

三十、二十两不等,货未发,结票谓之报水。货卖完,纳银谓之交票。毫厘不少,时日不爽。”^[17]细读可知,大陈岛的钓带是此时由福建传入,且大陈岛鱼货等交易亦大量存在。但这是在倭患背景下的贸易活动,足见此时大陈岛经济垦荒活动之艰难。

清代伊始,由于反清势力在与大清王朝的斗争中失去陆地根基转而从海上斗争,使得大陈岛在大清王朝与反清势力的斗争中地位比较突出。如1646年8月,清兵南下台州围剿明右金都御史张煌言部,张煌言仅以数骑突围,之后便以大陈岛为基地,秘密联络海门、天台等地反清力量,开展反清斗争。特别是1655年8月,郑成功以张明振为帅,陈辉、洪旭、陈六御副之,自福建北上抗清,与张煌言合兵一处进驻大陈山、玉环山、牛头门等处操练水师,袭扰温台各地。在1658年和1659年,郑成功和张煌言又两度北伐。此时,清政权已经稳定,郑成功和张煌言的两度北伐皆以失败告终,不得不退走台湾,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

1661年10月,清廷以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为由,派工部尚书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至海门,实施“禁海迁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18],令宁波、温州、台州三府沿海居民内徙,以绝海盗之患;并将大陈岛、玉环岛等居民全部内迁,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大陈岛也因此成了一座孤荒之岛,民众散亡殆尽。一直到1684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康熙大帝完成两岸统一,清政府才撤销“禁海迁界”令,并先后在大陈岛设立红美汛、凤尾汛,派官员驻守,检查进出船舶。由此,大陈岛垦荒活动逐渐复苏。

在乾隆年间(1736—1796),台州、温州和大量福建的渔、农民携家迁居大陈岛,致使大陈岛人口越来越多。1793年,浙江巡抚罗长麟以大陈山各岛居民甚多、制度废弛为名,派员整顿。《乾隆实录》载:“(辛卯)浙江巡抚觉罗长麟奏大陈山沿海一带各岛因居民众多,向设保甲。然奉行未能尽善,现飭员确查。并出示晓谕,令其每一岛屿,设耆长一人。每居民十家设甲长一人,每十甲设总甲一人。先令各出保结,如该甲内有通盗之人,据实禀报,容隐者治罪。再查海洋内渔户看网诸人,皆非安分之徒,盗匪行藏。伊等必知详细,现雇觅多人优给盘费,并悬重赏派委勇敢将备等,暗藏兵械,分投带往。并令改装易服。前赴远山穷

谷密访确查。仍派文武多员,于各海口堵截拏获。得旨、览奏俱悉。”^[19]这样,清政府在大陈岛设立了汛官统领军政渔务,彻底将大陈岛纳入政府管理体制内。

此后,自道光十年(1830)始,受殖民者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影响,台州成为鸦片生产、贩卖、吸食的重灾区。1839年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奏折中说:“查浙省乍浦、宁波,以及温、台滨海等处,均准外海商船往来贸易,其内河通海各小口,亦准采捕。各色小船挂验,出入其间,口岸错出,即难保奸商渔户不行贿兵役,潜运烟土入口。”^[20]由此可知,此时的大陈岛及大陈洋面,在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走私贩运已经非常严重。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浙江巡抚奉旨查禁台州、温州鸦片,但由于鸦片战争爆发,浙江禁烟半途而废,大陈岛垦荒亦在动荡中进入近代史阶段,其后大陈岛的垦荒命运更为多舛。

三、古代大陈岛垦荒活动特点

纵观古代大陈岛的垦荒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从垦荒主体看

古代大陈岛垦荒经历了由“百越族”向汉族转变、个人自发行为向国家行为转变的过程。在先秦至汉武帝时期,生活在浙江沿海及岛屿的于越人成为大陈岛垦荒的先民。秦统一六国后,首先将于越人迁到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即今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地区。同时,“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5]18}。这是中原汉人首次大规模徙居越地。汉武帝在平定瓠越、闽越以后,把归顺的越人强行迁移到江淮地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2]3008}。此后,随着中原王朝的不断扩张及战乱频仍,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台州。大陈岛由于具备丰富的海洋资源和重要的海上航运地位,使其即使在晋、唐300年海乱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农民、渔民、盐民起义和政权跌宕中,仍吸引了大量的流民聚集,从事各种垦荒活动,汉族人完全填补了因越人北上南迁在浙东沿海留下的空白,彻底完成了大陈岛垦荒主体由越人向汉人的转变。另外,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陈岛垦

荒都是沿海居民为求生计的自发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史上大多数王朝统治者陆权观念极为严重,没有意识到海洋和海岛对国家的重要性,一直到明朝倭患之后才开始注重海防安全。一直到1571年明政权派兵驻守大陈岛,才开始了对大陈岛的管理。到康乾盛世时期,清政府在大陈岛驻军并推行番长制、保甲制等,初步建立起大陈岛的全面管理体制,改变了大陈岛自行发展的历史。

(二)从垦荒内容看

古代大陈岛垦荒经历了从传统的渔农业、盐业向渔农业、畜牧业、盐业、商业和贸易等多业并举的模式转变。由于我国古代生产力落后,人们对海洋和海岛的认识停留在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不可能充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大多数海岛的开发只能表现为简单的渔业、盐业等几种模式,一直到明中期以后才实现多业并举。南朝宋孙洗和宋陈耆卿所称之高丽头山,即今上大陈岛的高梨头礁,证明古代台州往朝鲜、日本的商贸船只皆取道该岛,并以高梨头礁为航海标识。可见,大陈岛早在两汉东吴时期就已经存在大量的商业贸易活动,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陈岛成为海外贸易的中转地。

(三)从垦荒过程看

古代大陈岛垦荒常与动荡相伴,兵匪矢乱对大陈岛来说是常态。从先秦时期到1840年间,在大陈岛及其附近海域和地区发生的战争和海乱不计其数、不胜枚举。大陈岛远离陆地,大陆政权统治力薄弱以及大陈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导致浙东各种势力都把其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甚至海盗和倭寇也把这里作为栖息之地,致使大陈岛垦荒过程充满了动荡和不安,严重迟滞了大陈岛垦荒的历史进程。

结 语

古代大陈岛垦荒经历了由“百越族”到汉族,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向渔农业、畜牧业、盐业、商

业和贸易等多业并举的转变。在古代,大陈岛由于其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的周边民众或寻求生计,或躲避战乱,使越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互相融合,共同蕴育了台州文化。古代大陈岛人以“山海铸魂”为底色的刚烈不屈、务实包容的精神特质,促成了台州人山海淬炼的生存哲学和“崇利养义”的商业传统,使台州逐渐形成包含方孝孺式的悲壮坚守、渔民商贾般的务实创新和儒释道智慧交融的精神复合体,成为今天台州文化认同的核心密码。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669.
- [2]司马迁.东越列传[M]//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30.
- [5]袁康.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6]叶哲明.台州历史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130.
- [7]高飞.台州区域文化传统特色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8(3):124-129.
- [8]叶哲明.古代椒北章安文明与台州的文化复兴[J].台州师专学报,2001,23(1):52-58.
- [9]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志》编纂委员会.大陈岛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70.
- [10]陈炎.古代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兼论浙江历代的海外丝绸贸易[J].杭州商学院学报,1982(4):46-53.
- [11]戴禾.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的生活、活动和学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111-124.
- [12]陈耆卿.嘉定赤城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 [13]楼祖民.大陈岛备忘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 [14]脱脱.宋史:卷97[M].北京:中华书局,1985:6.
- [15]吴自牧.梦梁录:卷12[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102.
- [16]高扬文,陶琦.戚少保年谱耑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256.
- [1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6:82.
- [18]夏琳.闽海纪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4.
- [19]中华书局.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431[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
-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5-196.

A Discussion on the Reclamation of Dacheng Island in Ancient Times

An Guichen

(School of Marxism,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clamation activities on Dacheng Island have existed since the Neolithic period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mainland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clamation subjects, the ancient reclamation activities on Dacheng Island 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the Yue people to the Han people. However, the reclamation activities on Dacheng Island in ancient times were mostly spontaneous survival behaviors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had few positive measures to develop Dacheng Isl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o establish the Baojia system on Dacheng Island, thus integrating Dacheng Island in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lamation content, the ancient reclamation activities on Dacheng Island 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traditional fishing and agriculture, and salt industry to multiple industries simultaneously with fishing and agriculture, livestock raising, salt industry, commerce and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clamation process, the reclamation activities on Dacheng Island were often accompanied by turmoil, and the invasion of bandits and robbers was a normal situation for Dacheng Island, seriously delay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acheng Island reclamation.

Keywords: ancient times; Dacheng Island; reclamation

(上接第62页)

Re-identification of "Jun Gui"

Liu Xinyu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ry of plants and trees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Chuci* (《楚辞》), a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fragrant grass beauty" has continu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is worthwhile and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plants in *Chuci*. In *Chuci*, "Gui" (桂) is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As early as the pre Qin period, "Gui" had already been recorded, which is actually the *Cinnamomum cassia* of the Lauraceae family, not the *Osmanthus fragrans* of today. On the basis of "Gui", there are more theories about "Jun Gui" (菌桂).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 form and discussing the part of speech of "Jun" (菌),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t has a modifying function.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discussion in the original sentences of "Miscellaneous Pepper and Jun Gui" (杂申椒与菌桂兮) and "Correcting Jun Gui to Thread Hui" (矫菌桂以纫蕙兮) in *Li Sao* (《离骚》), it is believed that "Jun" is a more fitting description of "Gui".

Keywords: *Chuci*; *Li Sao*; "Jun Gui"; "Jun"; "Gui"

大陈岛垦荒精神传承的价值意蕴 及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探析

张天华¹, 祝家欢²

(1. 台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2. 渤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台州的城市精神,是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与地方城市精神的结合。近年来,台州大力推进大陈岛垦荒精神物化、具体化,使其深度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挖掘并妥善利用大陈岛垦荒精神中蕴涵的红色文化资源,聚焦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建设中的制约因素,探析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路径,可以更好地传承大陈岛垦荒精神。

关键词:大陈岛垦荒精神;红色文化资源;路径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4.014

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在历史的长河中,包括大陈岛垦荒精神在内的红色文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大陈岛垦荒精神传承的价值意蕴

大陈岛垦荒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垦荒精神不老”^[2]。这种精神力量,蕴含着激励后人不断奋进的红色根脉和精神密码。习近平总书记用“一次登岛、两次回信”,体现了对大陈岛建设、发展的关心,赋予了大陈岛垦荒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途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对祖国的下一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寄予厚望:“要像爷爷奶奶一样,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做一个有学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

一代建设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3]

(一)增强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

1955年2月,大陈岛的国民党守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下撤退弃岛,制造了“大陈浩劫”,“把大陈岛上的居民14416人悉数押往台湾,岛上仅7人侥幸逃脱厄运。并在岛上大肆破坏”^[4],大陈岛由此成为一座死岛。1956年,来自温州、台州的400多名青年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大陈岛”的号召,先后组织了5批次垦荒队员赶赴大陈岛。垦荒队员们发挥艰苦创业的精神,短短几年内,使昔日的“死岛”变为干事创业的“活力之岛”。“大陈岛垦荒”的历史事件为大陈岛垦荒精神赋予了独有的历史形态,使其在浙江红色精神谱系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具备了独特的辨识度^[5]。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可以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树立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

1983年5月,31位志愿垦荒队老队员给时任

收稿日期:2025-06-01

基金项目:2022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地方创新实践”(22VSZ054)

作者简介:张天华(1967—),女,辽宁锦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祝家欢(2000—),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联名信,汇报队员们心怀理想信念,27年来重建大陈岛的成绩。胡耀邦同志看到联名信后作出批示:“要好好宣传一下这一类不畏艰苦的创业事迹,鼓舞人们特别是青年奋发图强。”^[6]胡耀邦同志用“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垦荒队员创业的艰辛、信念的坚定。列宁曾指出:“所谓的教育不问政治,教育的不谈政治,都是资产阶级虚伪的口号。”^[7]继承和发扬大陈岛垦荒精神,既有历史传承的要求,又有政治教育的要求,对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来赓续红色血脉是夯实广大人民群众理想信念的基础,能够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革命前辈学习,发挥榜样力量带动崇高理想信念的形成,进一步把大陈岛建设成为“小康的大陈”“现代化的大陈”。

(三)着力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大陈岛垦荒精神是早期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台州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这种贵和谐、尚中庸,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性,是我们民族所追寻的一种文化思想”^{[8]296}。正是这一独特的文化基因,构成了大陈岛垦荒者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的力量最终能够转变成有形的力量,而文化的柔性力量最终能够转变成经济的硬力量。”^{[8]294}为此,将大陈岛垦荒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中焕发勃勃生机。

二、大陈岛垦荒精神中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制约要素

大陈岛垦荒精神是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财富。近些年来,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制度的引领下,大陈岛的发展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稳步前进。同时,大陈岛的发展也有其内在矛盾。如何消除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何合理利用好现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更加美丽的大陈岛,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分析解决。

(一)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片面化,实践途径单一

目前,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方式、方法

不够,主要的活动形式还是参观纪念馆、革命遗址和红色教育基地等。这种传统的活动形式多由学校发起,组织学生前往实地体验和学习。虽然这样的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接近历史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对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效果并不明显。在这片土地上,红色故事如同繁星点点般数不胜数,却缺乏足够的文化内涵来充实和支撑它们的价值。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多重因素交织,参观者对于大陈岛以及岛上所孕育的垦荒精神了解甚少。因此,需要探索更多样化的红色文化实践途径,使之成为真正能够激发参观者情感共鸣、促进其全面发展的教育资源。

(二)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模式不足,品牌效应缺乏

大陈岛围绕打造“中国红色旅游第一岛”目标,深入挖掘和利用红色历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发展的各个环节,获得了一定的辨识度和知名度,但其红色文化项目的创新模式还有待加强。在众多的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中,大多数项目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单一解说模式上,这种形式往往缺乏新鲜感和互动性,让参观者难以真正融入其中。同时,在当前的市场营销环境下,红色文化的推广与传播并未被赋予足够的针对性。尽管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在红色文化与市场需求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和融合。这种脱节导致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背后蕴藏的历史底蕴未能得到充分传播,再加上没有稳固的大众口碑作为支撑,品牌建设无从谈起,爱国主义教育的效能也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创新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接受模式,通过改进营销策略、整合优势资源加强品牌建设,增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三)红色文化资源人才储备不足,难以承担重任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大陈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依赖精通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播技巧、拥有丰富历史知识和宣传经验的专业人才。专业人才是引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建设走向成功的关键力量,决定着如何有效地传承红色精神,弘扬革命传统,让宝贵的历史资源迸发出新的时代活力。在新

时代,扎根于大陈岛的红色文化工作者不仅要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和赓续工作,还要有过硬的思想作风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能够与当地群众建立和谐的关系,共同为大陈岛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大陈岛垦荒精神中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路径

在新时代背景下,利用大陈岛垦荒精神深入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将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传承弘扬与实践探索相结合。

(一)拓宽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渠道

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越来越呈现出网络化的趋势。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从单纯的信息载体进化为集知识传播、情感共鸣、价值塑造于一体的综合平台,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与教育方式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

首先,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辐射和传播范围。承载着红色文化资源和革命精神的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通常都坐落在偏僻的地方,需要采取措施,改善红色文化资源的交通不便、零散分布情况,以便能够更广泛地传播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让参观者能深刻体验到红色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起参观者对革命历史的尊重和热爱。其次,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与其他新兴科技,构建起一个以红色文化和历史资源为核心内容的数字化平台。这一平台包括红色网站、虚拟现实(VR)展览馆以及各种互动软件,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参观者提供全新的交互式教育体验。通过数字化平台,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革命历史,感受红色记忆。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使得红色文化教育更加生动、形象且富有感染力,可以有效地激发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和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最后,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历史重温,设置网上交流平台,开放留言、点赞等互动功能,分享所见所得,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二)建立红色文化资源综合开发模式

借助红色文化的历史底蕴,可以构建一个涵

盖红色文化资源的综合性共享平台。这个平台能为红旅研学活动注入鲜活的内容,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沃土,也能为地方文化的传播提供新的动力。通过这样的融合,红色文化将跨越地域的限制,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整合与开发,激发集群效应,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党性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方面协商共办,促进政府与地方在红色培训、课题研究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对已纳入全国、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的现场教学点、教学资源、师资课程实施共享,互利互惠。在红旅研学方面统筹共建,可通过多渠道、多途径,积极宣传推介大陈岛红色旅游,并串联起多条旅游线路,让更多人了解台州的地方旅游项目。此外,可以采取视觉艺术的形式,拍摄关于椒江海洋旅游专题风光片,生动展现这片海域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情;可以申报和筹备红色旅游的重大文化旅游活动,加快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与长三角“三省一市”红色旅游建立联系,达成多省份、多地区的旅游合作,建立新的发展模式,推动红色文旅项目高质量融合发展,有效扩大红色旅游资源的影响。

(三)培养红色文化资源传播专业人才

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是开展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重要主体,也是建设、传播、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的中坚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9]

针对当前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储备人才配备不足的现状,应着力培养专业人才,建立稳定高效的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队伍。

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当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环境,努力为其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地方政府需要在财政上提供有力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税收优惠政策、创新技术的资助等,这些都是推动文化资源建设不可或缺的要害。此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同样至关重要,地方政府需加大投入,通过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吸引并留住关键领域的优秀人才。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还应积极探索如何以高层次的研究型专家为核心,形成全方位的人才结构体系。同时,地方政府应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区域特色,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以促进大陈岛加快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确保红色

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当积极与台州学院、温州大学等省内外高等教育机构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学科、专业资源,将红色文化资源纳入高校的专业教育体系中。这不仅能够为高校师生提供更多学习和研究的机会,而且还能培养出一支具备深厚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借助他们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梳理、分析与整合,为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教学人员能够扩充知识库,深刻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独特魅力,从而在课堂上讲授得更具体和生动;学生也可以通过实际操作、讨论、互动等方式,增强对红色文化的体验和共情。这样,青年学子不仅能够学到历史知识,而且能将红色基因扎根于心灵深处,培养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红色文化跃动出更为蓬勃的时代生机,成为引领青年一代前行的不竭动力。

结 语

守好红色根脉,就是要守好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10]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入挖掘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红色文化资源价值,是对“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最好诠释,也是新时代激励人们奋勇前行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1.
- [2]段治文.弘扬“垦荒精神”培养时代新人[N].浙江日报,2019-07-03(8).
- [3]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永远的丰碑:大陈岛垦荒精神诵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8.
- [4]台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州地区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1050.
- [5]张杰.伟大建党精神与大陈岛垦荒精神的逻辑关系探赜[J].台州学院学报,2024,46(2):75-81.
- [6]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综合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304.
- [7]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2.
- [8]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5.
- [10]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5.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Inheriting Dachen Island Reclamation Spirit

Zhang Tianhua¹, Zhu Jiahu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0, China)

Abstract: Dachen Island reclamation spirit is Taizhou's urban spirit, and is also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local urban spirit. In recent years, Taizhou has vigorously advanced the materialization and concretization of Dachen Island reclamation spirit, deeply integrating it into all aspec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excavating and effectively leveraging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embedded in this spirit, addressing constrain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and exploring the path for their development, the legacy of Dachen Island reclamation spirit can be better preserved and passed on.

Keywords: Dachen Island reclamation spiri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path

台州学院商学院旅游管理硕士学位点

科研实践平台

学位点拥有台州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台州市民宿学院、文化旅游与大健康产业学院等教学、研究平台，以及台州市智慧文旅实验室、旅游元宇宙虚拟仿真实验室、旅游心理与行为实验室、旅游大数据分析中心、旅游技能实训室、ERP沙盘实验室、人才测评实验室等实验教学体系。

学位点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向雁荡山景区、横店影视城、天台山景区、神仙居景区、台州府城景区、华强方特（台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百花园林集团、台州喜柿山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首批共建单位授予“台州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实践基地”称号，建设高水平实践教学基地，为旅游管理硕士培养创造良好条件。



“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主题汇报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研究生奖助政策



商学院旅游大数据分析中心

学位点建立多元奖助体系。学校层面设立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三台奖学金和各类专项奖学金，实行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三助”岗位津贴、专项帮困补助等制度。学院层面设立专项奖学金和贫困生助学金，明确导师科研经费资助制度，配套助教、勤工助学等多种资助方式。

中国·台州

TAIZHOU CHINA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李钧敏

Editor-in-chief Li Junmi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Postcode 317000

网址

The URL <https://journal.tzc.edu.cn>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E-mail xbb@tzc.edu.cn

电话

Tel. 0576-85137169

双月刊

1979年创刊

第47卷 第4期

(总第252期) 2025年8月20日出版

Bimonthly Started in 1979

(Issue No. 252) Vol. 47 No. 4 Aug. 2025

封面题字: 沙孟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定价: 12.00元



ISSN 1672-3708



9 771672 370258